

怡和

世纪

YIHE SHIJI

14

凝集力量
推广文化

16

任人唯贤与精英治国
何以变调?

44

人口政策大辩论
牵动国人神经

以史为镜
长治久安



Two Championship Golf Courses

Bintang &

The Bukit

Starhill Golf Resort Berhad

6.5km Jalan Kg. Maju Jaya
Kempas Lama, 81330 Skudai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Tel : +607-5588111

Fax : +607-5567327

E-Mail : shccaccount@starhillcc.com

www.starhillgcc.com



怡和**点击**

- 03 • 以史为镜 长治久安 / 编委会

怡和**传承**

- 04 • 为了那消逝的记忆
从死难人民纪念碑列为国家古迹谈起 / 林清如
- 08 • 不居功 不争名
平生豪杰仗义的先贤黄奕欢 / 浩文
- 11 • 留取丹心照汗青
从薛有福到林谋盛 / 柯木林

专题**报道**

- 14 • 凝集力量 推广文化
怡和轩第五届华文书籍奖颁奖仪式报道 / 郑钧如

怡和**专题**

- 16 • 任人唯贤与精英治国何以变调?
专访郭建文、何光平 / 吴新慧 林琬绯
Falling out-of-tune? Meritocracy and Elitist Governance in Singapore
Interviews with Kwok Kian Woon and Ho Kwon Ping
- 28 • 换个角度谈精英治国 / 陆锦坤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Elitism
- 30 • 历史上的精英 / 许齐雄

怡和**风采**

- 32 • 新马与中国商贸回忆点滴
与李金源一席谈 / 王远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m Guan:
Early Tra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gapore and China
- 35 • 从风浪里走来
陈立发谈科艺发展经验 / 邹文学
The Life and Art of TCM Science
Science Arts co-founder Tan Leek Huak takes us through the
four decades of the local TCM powerhouse
- 38 • 热心公益的卓顺发
采访罗敏娜控股主席 / 周弘
Devoted To Giving
- 41 • 从“夕阳工业”到“绿色商机”
访友联钢铁控股董事经理洪友成 / 洪天发
Iron Men

怡和时评

- 44 • 议院内外
人口政策大辩论牵动国人神经 / 董南施
- 48 • 人口白皮书的讨论
突显寻求共识的困难 / 韩咏梅
- 50 • 中国新领导层的威信能维持多久? / 杜平
- 52 • 马来西亚大选掀“华人海啸”?
冲击城市选情但未改变格局 / 谢诗坚

怡和财经

- 57 • 从近期大型收购活动
看老牌企业的变迁 / 吴慧敏
- 60 • 亚洲股市跑输发达市场属暂时还是长期现象? / 浦永灏
- 62 • 租金飙升
中小企业何去何从 / 龚慧婷
- 64 • 劳力紧缩下的中小企业
浅谈本年度预算案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 郭庭水

怡和视角

- 66 • “以人为本”抑或“以数字为本” / 雨石
- 68 • 强人政治与强势政府 / 陆锦坤
- 70 • 艺术何价? / 谢声远
- 73 • 学前教育VS小学先修 / 许福吉
- 76 • 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浮沉 / 莊永康
- 78 • 社团的韧性与再造 / 谢燕燕
- 81 •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 柳舜

怡和天地

- 春风化语九十载 • 83
李文辉 / 笨珍培群独中扩建任重道远
- 陈伟玉 / 沙巴领土争议的历史背景 • 87
- 回顾雷曼兄弟 • 90
戴文雪 / 美国政府见死不救?
- 章良我 / 马绍尔与他的红色中国之行 • 92
- 朱崇科 / 广州鲁迅: 如何男女 • 94
- 邹文学 / 旅行了500年的哥伦布 • 96
- 苏笛 / 其实不远 • 98

怡和动态

- 何奕凯 / 陈嘉庚精神的时代意义 • 99
- 李秉萱 / 南侨机工纪念雕塑正式揭幕 • 100
- 郑钧如 / 《怡和世纪·感谢有你》联欢宴会 • 101
- 郑钧如 / 新年团拜 盛况非凡 • 102
- 欢迎新会员 • 103

本刊文章仅代表作者或论者个人观点

怡和世纪 Y I H E S H I J I

出版顾问 Advisors (Publication)

林清如 Lim Chin Joo
潘国驹 Prof Phua Kok Khoo

编辑顾问 Advisors (Editorial)

王如明 Ong Chu Meng
陆锦坤 Leck Kim Koon
许福吉 Prof Koh Hock Kiat

编务统筹

Chief Co-ordinator (Editorial)

谢声远 Seah Shin Wong

责任编辑 Executive Editor

郑钧如 Zheng Junru

编辑委员 Editors

李秉萱 Lee Peng Shu
陈立发 Tan Lee Huak
陶耀建 Tao Yeoh Chi
胡财辉 Aw Chye Wee
谢声群 Sam Cheah

设计 Design

Lab Creations

Unit of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Tel: 65-6466 5775
Fax: 65-6465 6732
Email: sales@labcreations.biz

出版 Publisher

怡和轩俱乐部

Ee Hoe Hean Club
43 Bukit Pasoh Road
Singapore 089856
Tel: 65-6224 2678
Fax: 65-6222 2745
Email: eeheohean@gmail.com
Website: www.eeheohean.org

印刷 Printer

Mainland Press Pte Ltd

No. 67 Tuas View Loop,
Singapore 637710
Tel: 65 6861-2971
Fax: 65 6861-2973
Email: mlpmktg@singnet.com.sg

2013年6-9月 Jun-Sep 201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MICA (P) 084/12/2012

非卖品

以史为镜 长治久安

纪念星华义勇军的形式和规格显然不能较英军或马来军团纪念碑逊色。谁来为星华义勇军立碑?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政府该做的事!

今年2月间“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被列为国家古迹,南侨机工纪念标志跟着于3月4日揭幕,人们想起了几被遗忘的星华义勇军,呼吁也应该为他们立碑。

远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的硝烟就已悄悄升起。然而,要到日本继续挥军南下,相隔逾10年后的1942年2月1日,英国驻新加坡总督汤姆斯才觉得殖民地臣民也该有武装自己的时候,出面恳求陈嘉庚,仓促把几千名未经训练的平民组成星华义勇军。义勇军在最后一道防线战斗惨烈,卧尸荒野,英气长存,虽未能阻遏新加坡的沦陷和被日军的蹂躏,却也用鲜血浇铸了新马人民不可侮、不可欺、不可杀的英雄气概,为后来抗日军和136部队的活动树立了光辉榜样。

就在星华义勇军与日本军作殊死战的时候,英军总司令却于2月13日解散星华义勇军,两天后举起白旗从福康宁出发,到武吉知马的福特车厂向山下奉文投降。13万守军(英、澳、印籍等非土著士兵)束手就擒,剩下正规军当中唯一的土著(马来族)兵团,在阿南少尉(Adnan Saidi 2 LT)领导下,在巴西班让战役中坚持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大英帝国二战后重返新马,迫不及待地在全岛各处竖立标志,表扬英军在战时的牺牲与英勇。南部圣淘沙建于19世纪的旧西罗梭炮台(Fort Siloso)被粉饰为英军当年抗敌的堡垒,北部位于格兰芝的阵亡英军纪念碑巍峨壮观,这都是为了重整殖民统治的权威与合法性。

星华义勇军的悲壮事迹令大英帝国尽失颜面,任何抢眼的纪念标志只有致大英帝国于尴尬境地,助长反殖民地主义的情绪。犹有进者,竟有流言把日军对华人的“检证”说成是针对星华义勇军英勇杀敌的报复!

1963年新加坡各处发现日治时期被日军杀害人士的遗骸,在中华总商会的努力下,政府拨地在美芝路建立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商会会长孙炳炎说,“这座碑是最适当的纪念物,它不仅是用砖和泥砌成的,而且是用爱和恨之真情融接起来的”。令人惋惜的是,星华义勇军的英雄事迹有意无意被忽略了。

新加坡于1993年成立国家文物局,要通过历史加强人民的国民意识。可是除了1995年在晋江会馆竖立一块牌匾纪念该处曾为星华义勇军的总部外,一直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当局2002年在巴西班让为马来军团设立塑像并开发纪念馆,2005年拨地在三巴旺军港为两艘被炸沉的英国军舰及遇难的海军官兵竖大型纪念碑,唯独星华义勇军的精神得不到应有的表扬。

2005年欧如柏撰文呼吁为星华义勇军立碑,社会上置若罔闻。即便是2012年新加坡有些社团举行新加坡沦陷70周年纪念会,近年引起热议的南侨机工历史似乎成了主题,做为新加坡沦陷史重要环节的星华义勇军故事反倒相形见绌,足见殖民地时代的治史态度在现代社会根深蒂固,遗毒既深又广。

建立南侨机工纪念碑可说是华社内部的事,华社不做,没有人会做。纪念标志今年顺利竖立,得力于中华总商会的迅速反应与宗乡联合总会的配合,利用了现有的晚晴园为址。否则,事情至今肯定还是夜长梦多。

纪念星华义勇军的形式和规格显然不能较英军或马来军团纪念碑逊色。谁来为星华义勇军立碑?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政府该做的事!尊重历史,以史为镜,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编委会

没有历史头脑的民族是健忘的民族,一觉醒来,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历史系戴安娜·诺维茨教授



为了那消逝的记忆

从死难人民纪念碑列为国家古迹谈起



文：林清如

今年2月15日，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部长黄循财宣布，矗立在美芝路近半个世纪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将被列为国家古迹，栖身碑底近半个世纪的无数忠魂，可望世代任人凭吊！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军从18日开始借“检证”之名对新加坡人民进行大肃清，成千上万平民被押上卡车或罗里，有些被载到海边集体枪杀后，尸体随海潮消失；有些却到偏僻地带集体枪杀或活埋。主导这场人神共愤大屠杀的日军司令山下奉文当年扬言，他要取半数新加坡人民的命！没有人计算得出，到底日军杀害了多少人。考古学者估计，遇难者有2万5千人左右，华人社会相信，牺牲的人数应有四万至五万人之众。

根据怡和轩先贤黄奕欢的回忆，陈嘉庚1950年5月返中国定居前夕，邀请他到怡和轩长谈，向他表达三个未竟的志愿。其一，收拾日治时期受难者尸骨，重葬一处；其二，为死难人民建立永久性纪念碑；其三，向日本追讨血债。1960年代，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会长高德根和孙炳炎相继领导下挺身而出，千辛万苦，总算完成了陈嘉庚的心愿。回忆孙炳炎在世时的平日言谈或翻阅他遗下的个人资料，不堪回首的往事历历在目。

1962年初，我国多处发现埋有日本时期惨被集体屠杀的枯骨。在高德根会长带动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1962年2月成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主任相继为黄奕欢（1962—1965）和周镇豪（1965—1967），

孙炳炎说，这座碑是最适当的纪念物，它不仅是用砖和泥砌成的，而且是用爱和恨之真情融接起来的。这座标志战争之残酷的碑石，庇护着碑下成千累万英灵的遗骨。

负责发掘遗骸与安葬等事宜。隔年商会又决定成立建立纪念碑委员会，进行募捐与筹建工作，主任相继为高德根（1963—1965）和孙炳炎（1965—1967），商会也同时与我国其他民族代表共同组织类似的各民族联合委员会。

1963年初新加坡政府应各界要求，于美芝路拨地以供建立纪念碑。建碑的费用45万元左右由各民族人民和政府对半分担，挖掘遗骸费6万元左右由商会负责筹募。

1963年六月十五日，李光耀总理为纪念碑举行动土仪式时说，这个纪念碑将永远纪念在新加坡沦陷时期蒙难的各种族、各宗教人民。希望不久的将来，日本政府能够采取适当的赎罪方式来消除我们人民的怨恨。我们不能够忘记过去的痛苦，也不能完全地宽恕。商会会长高德根说，商会接受人民的付托，毅然负起责任，进行为死难人民建筑纪念碑，同时发动要求日本赔偿血债，都是神圣的工作。一座庄严巍峨的纪念碑，将标志着先烈浩然之气长存，精神不朽，千秋万世，让人景仰纪念。

挖掘与安葬遗骨经过

商会从1963年3月14日开始进行挖掘遗骸的工作。挖出的骨骸支离破碎，不成人形。出土后，先行洗涤吹干，后盛入坛中，加以密封。直至是年12月底，在各地挖出的骨骸，计有153坛，暂寄潮洲殡仪馆。由于宗教原因，商会改变火化遗骸的计划，改为骨葬。政府拟议中的骨葬地点为蔡厝港一带，商会表示不能接受，认为骨藏地点应在纪念碑附近。骨葬地点的推敲进入僵局，惟恐遗骨久不入土难

以为安，挖掘工作只好暂停。事隔多年，政府最后同意把遗骨埋葬碑底。纪念碑图样因而修改，不设存放骨灰的地下瞻仰厅，在碑下开辟基台，用以储存遗骨。

在这期间，全岛各处陆续发现埋有遗骸。1966年2月重启挖掘工作，短短几个月再挖出450坛遗骨，连同早已出土的153坛，总共605坛。1966年10月26日，委员会把全部605坛遗骨移到纪念碑前的临时帆布棚下，供各宗教人士凭吊与拜祭，为期一周。11月2日各民族联合行动委员会、商会和各有关委员会委员，齐向遗骸敬献花圈、鞠躬、默哀，然后一一奉送骨坛至纪念碑基台，归土为安。

安葬于纪念碑下的遗骸是从全岛35个不同地方挖掘出来的，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惹兰培本山谷（今为淡边尼近四美地带），计有428坛，肯士路（南洋女子小学后面）和樟宜十英里半各有37坛，榜鹅海边、惹兰加由、武吉知马六英里各有20几坛。

众多死难者家属和公众人士在场目睹骨葬经过，触景伤情，声泪俱下，伤心惨目，有如是耶！

1967年纪念碑落成典礼

1967年2月15日，李光耀总理为已落成的纪念碑主持揭幕典礼时说，这一座纪念碑标志着沉痛的经验。这种经验虽然是苦痛惨忍的，但它却应在一个拥有来自不同源流的移民，年青而尚未充分发展起来的社会的建设事业中，起着积极的、催化的作用。

商会会长孙炳炎说，这座纪念碑之完成，一则以象征新加坡人民对死难者

致永恒的悼念；一则以宣示侵略战争之不足为训。冤不宜结，仇必须解。人类如要生存，国与国之间要互相尊重，大国强国必须尊重小国弱国，战争才得以永久消除。任何大欺小，强凌弱，众暴寡的行为，一定难逃历史的裁判与惩罚。

孙炳炎也在建碑纪念册献辞，他说，“这座碑是最适当的纪念物，它不仅是用砖和泥砌成的，而且是用爱和恨之真情融接起来的。这座标志战争之残酷的碑石，庇护着碑下成千累万英灵的遗骨。”

向日本追讨血债的经过

从1962年开始，商会就挺身而出，向日本政府追讨血债。1963年8月25日晚上7点，商会更联合各民族代表，在政府广场举行了历史性的追讨血债群总大会，超过十万人参加，群情激烈，并通过三项决议：1. 联合马来亚、沙巴、砂劳越各地人民采取共同步骤，向日本追讨血债；2. 血债不还，即发动人民实行对日本人不合作运动；3. 不达到目的，即要求政府停止准许日本人入境。



遠超十萬眾匯成海人 出席向日追討血債大會

情緒激昂態度堅決 通過三項決案

聯合馬砂共同追討血債 發動對日人不合作運動 要求政府不許日人入境

歷史性的日本追討血債大會，昨日下午七時在政府大禮堂開幕。到會者除來自全星各埠的十萬僑胞外，尚有來自日本各地的代表團。大會由李光耀總理主持，他致詞時，情緒激昂，態度堅決，並通過三項決案。大會由李光耀總理主持，他致詞時，情緒激昂，態度堅決，並通過三項決案。大會由李光耀總理主持，他致詞時，情緒激昂，態度堅決，並通過三項決案。

（一）聯合馬來亞、沙白、砂朥越各地人民，發動對日人不合作運動；（二）血債不歸日本人民償還，由日本政府負責；（三）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向日本移民入境。

大會由李光耀總理主持，他致詞時，情緒激昂，態度堅決，並通過三項決案。大會由李光耀總理主持，他致詞時，情緒激昂，態度堅決，並通過三項決案。大會由李光耀總理主持，他致詞時，情緒激昂，態度堅決，並通過三項決案。

正与马来西亚对抗，政治上他需要日本的支持。各商会深明大义，同意东姑待适合时机才向日本提出。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在一个新的局面，追讨血债的事增加了变数。商会新任会长孙炳炎虽曾多方积极行动，始终难见端倪。

1965年10月25日，日本外相来新访问，商会求见，希望能见机行事。不料就在同一天，两国外长就发表了联合公报，谓日本政府将“为新加坡共和国和人民，提供马币5千万元，其中2千5百万元为赠款，另外2千5百万元以贷款方式于特别条件下借予新加坡。”联合公报没有明确说明赠款与血债的关系；10月26日，日本大使馆致函商会，对无法安排商会与日本外长会面表示歉意，信里明确表示，“两国之间的所谓血债问题已经解决。”商会上下人人错愕，不过有碍是时政治现实，还是不敢轻举妄动。

10月28日，李光耀总理召见商会代表，对于新加坡政府与日本政府解决血债问题有所解释。10月31日，李总理致函孙炳炎会长，重申政府对解决血债问题的决定，“乃为我国经济发展之实际问题着想，并希望商会确保血债问题不再为日后之争端。”孙炳炎遵循商会董事部议决复函总理，表示商会了解政府为我国经济发展着想而采取的决定，不过有鉴于“这决定与1963年8月25日群众大会议决案未尽相符，商会实难向群众交待。”李总理复函表示，向人民解释政府所做的决定乃政府的责任，政府并非有意要商会代为向人民解释。政府过后邀各民族追讨血债联合委员会派代表与政府洽商赠款用途，追讨血债的问题就此骤然落幕！

作者为怡和轩主席

1963年9月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追讨血债于是牵涉到中央政府的外交问题，日本政府借故拖延谈判。1965年2月9日，首相东姑召见马华商联合会代表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面谈，透露日方答应赔偿，数目是2千5百万马币，惟东姑未予接受，因为他要先征求商联合会代表意见。东姑提议要求日本在檳城为马国建立一所大学，并负责维持5年

（约需3千5百万马币），以代替赔款。商会代表黄奕欢表示，日治时期新加坡人民受害最深，牺牲最多人，他无权代表商会赞成东姑的提议。东姑于是建议各州代表向各自商会报告经过，并总结报告交回他考虑。1965年4月1日马华商联合会召开各地商会代表开会，大会一致决定要求日本赔偿1亿5千万马币。东姑获悉后，颇感为难，时值印尼



不居功不争名

平生豪杰仗义的先贤黄奕欢

／文：浩文

黄奕欢于1908年出生于福建南安埔头乡，自幼好学，受教于南安名士黄紫霞，学习文艺。15岁（1923）步上人生征程，在新加坡和麻坡经营京果、磁器、树胶、椰干、豆蔻、酒类等生意。商而优则“社”，20岁出头，适逢1928年济南惨案，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挑起的“九一八事件”，他便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并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第一次和陈嘉庚会面，是在30年代初期一次黄河水灾募捐集会上。当时，黄奕欢是作为小坡区代表，出席在同济医院举行的集会。他在会上打破沉默，带头响应大会主席陈嘉庚的募捐号召。陈嘉庚赏识他的热情、辩才和胆识，而黄奕欢与陈嘉庚的忘年之交，从此把他引向一条豪杰仗义的人生道路。

从30年代初露头角，到1985年6月21日撒手人寰，黄奕欢的人生征程可粗略介绍如下：

星华、南侨筹赈会时期（1937-1941）

日本侵华战争的步步推进，在黄奕欢心中燃起爱国和社会责任的烈焰。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展开全面抗日战争之后，黄奕欢更以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和怡和轩成员的身份，全身心投入1937年成立的星华筹赈会和1938年成立的南侨筹赈总会工作，与侯西反、刘牡丹、周献瑞一道，成为陈嘉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得力助手。他们是时代造就的组织者、演说者和鼓动者，把抗日救亡意识和行动伸展到新马各区、镇、州，影响深广，收效巨大。1939年侯西反被英殖民当局遣返中国后，他肩负的任务更重了，但他始终任劳任怨，不辱使命。在杨进发博士笔下，黄奕欢“是陈嘉庚先生的追随者与战友，始终不渝”。

保卫团及流亡时期 (1942-1945)

1941年底日军兵临长堤彼岸，新加坡安全危如累卵，在英殖民当局的许可下，陈嘉庚于1941年12月31日出面领导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黄奕欢出任保卫团副主任一职，组织各区团员，负责区内治安、防空和救护等工作。由于英军防卫无力，新加坡防线很快就崩溃了。在黄奕欢和刘牡丹安排下，陈嘉庚和不少文化界名人得以退到苏门答腊。1942年2月4日，也就是新加坡沦陷前11天，黄奕欢和刘牡丹在陈贵贱处获得两艘小火轮，匆匆开往苏门答腊，在淡美兰上岸避难，日军以50万荷盾悬赏捕拿黄奕欢。据陈嘉庚长子陈国庆回忆，黄奕欢在苏岛为了逃避奸细和日军的搜捕，被迫撤至荒山野林，靠原始工具耕种和打猎，艰苦支撑了三年八个月。因长期缺乏营养，走出森林时，双目病重，幸得胡添福医生极力救治，右眼视力终于恢复，但左眼失明。然而，战后他在政治、教育、社会方面的热情和参与，依然不变。

拥陈时期 (1946-1950)

陈嘉庚战后重返新加坡，威望极高。1946年，中国爆发内战，陈嘉庚以南侨筹赈会主席的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参众两院议长、美驻华特使马歇尔和大使司徒雷登，要求美国立即从中国撤走军队，并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此事引起新加坡国民党和亲国民党人士的强烈反响，黄奕欢、李光前、刘牡丹、陈六使、高德根等中华总商会和怡和轩年轻会员，组织召开各侨团大会，黄奕欢任大会主席。大会全力支持陈嘉庚的立场，并议决派代表向陈嘉庚致敬。1948年，黄奕欢代表陈嘉庚，出席海员公会主持的侨团抗议大会，与会的中国民主同盟星洲支部、工人、海员、学生、妇女代表同声反对蒋介石继续出任民国总统一职。之后，英殖民

当局开始对拥陈力量采取镇压行动，继而陈嘉庚选择回中国定居，新马华社面对新的抉择。

本土意识及南洋大学创办时期 (1951-1956)

战后的政治现实，促使陈六使、黄奕欢等先贤人物，开始把目光转向新马社会。其实，按历史学者杨进发的看法“战后的黄奕欢先生已是华族社会中有影响力的后起之秀。他除了支持陈嘉庚的政治思想与行动外，往往亦能独当一面地领导华族社会。1949年5月，他在中华总商会临时董事会议上发言，力促华族注意推动参加立法议院的选举。当时，争取华族公民权、参政权和实现立法院四种语文政策的活动，都离不开黄奕欢的身影。他一度参与的民主党，在1955年败给马绍尔领导的劳工阵线。虽说无果而终，但结合创办南洋大学时他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可以看出黄奕欢的本土意识日益增强。1953年1月陈六使登高一呼，掀起了创办南洋大学的波浪壮阔的运动。在这之前，黄奕欢参与福建会馆的购地工作。据他回忆，为了物色南洋大学校址，福建会馆最先花费600万元，购买甘榜爪哇一块地皮，因不适合又在武吉知马找到一块地，还是嫌小，最后在裕廊以200余万元标购一块近一千依格的土地。原先有一华人和一印度商人参加竞购，但陈六使、柯进来和黄奕欢以福建会馆以购买该地段作为闽人义山为由，劝阻竞争对手。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宣布创办南洋大学计划时，便是以这块地皮作为建校基础。

黄奕欢不仅购地有功，而且在创办之初，与连瀛洲等先贤，多次前往全马及砂婆等地，奔走鼓吹，形成万众一心、出钱出力的创校热潮。南大出身的郑奋兴教授在《南大功臣黄奕欢》一文中写道：“南大校友们喜欢称黄奕欢与潘受两位尊长为六使伯二使……大家

都认可这个历史事实：若不是黄奕欢与潘受两位尊长勇往直前，全心全意地协助六使及其他创办人克服种种艰难，南洋大学极可能胎死腹中。”

亚洲保险有限公司与黄奕欢 (30年代-80年代)

亚洲保险有限公司于1923年由闽粤两帮人士创办，30年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黄奕欢于1934年加入该公司，任经理侯西反的助手，1939年侯西反被殖民地政府解递出国，黄奕欢以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杰出的组织能力，接替侯西反出任经理。在他的主持下，战后亚洲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蒸蒸日上，1948年创立姐妹公司“亚洲人寿保险公司”。1955年落成，矗立在珊顿道附近的亚洲保险大厦，楼高18层，为东南亚之最。1971年，这两家公司置于新成立的“亚洲联合企业有限公司”旗下，黄奕欢身兼三职：既为亚洲联合企业董事主席，复任亚洲保险和亚洲人寿保险董事经理，直至1985年。

纵观黄奕欢先生一生，从26岁起历任南安会馆、福建会馆、孔教会、佛教总会、中华总商会、星华、南侨筹赈会、抗敌动员总会、华侨中学董事会、南洋大学理事会、弥陀小学董事会等要职，为反抗邪恶势力、为扩大华社影响、为推动民族教育做出艰辛的努力。诚如前南洋大学秘书长潘受在《悼黄奕欢先生》中所说的：“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为人群社会服务，任劳任怨，不居功，不争名……凡事只要对社会有益，对大家有利，不论是为教育、为慈善、为故乡、为国家社会的任何事情，只要他看得到，做得到，或是大家向他提出意见，他就毫不犹豫切实去做，没有一件事情不尽心尽力做到彻底圆满。这是最令人钦佩的认真、负责、大公无私的服务精神”——已故弥陀小学创办人广洽法师则喻之为“豪杰精神”。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夏日

杨绍军油画展

新加坡艺术节
 坡百利东
 路兴艺宫
 44方楼
 388号
 艺术中心



SUMMER

1 Jun 2013 Sat –
 12 Jun 2013 Wed



诱惑
 SEDUCTION

高玉金油画展

新加坡艺术节
 坡百利东
 路兴艺宫
 44方楼
 388号
 艺术中心

6 Jul 2013 Sat –
 16 Jul 2013 Tue



Heng Artland Co Pte Ltd
 290 Orchard Road #04-08 Paragon Singapore 238859
 Tel: (65)6738 4380 • Email: arts@hengartland.com.sg
 www.hengartland.com

留取丹心照汗青

从薛有福到林谋盛



林谋盛烈士



文：柯木林

一般人读新加坡历史，总以为为国捐驱的英雄人物，多是受华文教育的，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本文谈的两位英雄人物，都是受英文教育的，而且出身富有人家。他们都为民族与国家牺牲了：一个身为清朝海军军官，在中法海战中牺牲；一个作为抗日战士，为占领新马的日本侵略军杀害，后被追认为陆军少将。

更巧合的是：两人殉国的时间相距60年，正好是中国的一个甲子纪年。他们都有纪念建筑物存世，一个是纪念祠堂，一个是纪念碑；纪念建筑物一个在福州，一个在新加坡。

写作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借他们的事迹，重新引发人们对这两位英雄人物的缅怀。他们是：薛有福（1862—1884）与林谋盛（1909—1944）。林谋盛或许人们比较熟悉，但知道薛有福的人可能不多。

薛有福（1862—1884）是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岬芭。他出身显赫家族，祖籍福建省漳州东山上营（今漳州石榴东山村上营），与新加坡渊源极深。祖父薛佛记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父亲薛荣樾（1826—1884）长期往返新（加坡）厦（门）间从事船务生意，是新加坡一名殷商，参与萃英书院的创办。中岬鲁的Eng Watt Street（永发街，实乃荣樾之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薛有福的哥哥薛有礼（1851—1906）是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首家华文日报《叻报》的创办人。他的侄子薛中华（1886—1940）于1920年代领导福建帮，为著名华社领袖，曾任中华总商会与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等职。

年幼官派赴美留学

1874年，12岁的薛有福作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计划成员，被清政府派往美国学习。留美幼童计划为中国近代首位留美学生容闳（Yung Wing 1828—1912）的倡议，由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和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联合奏准，于1872—1875年选派10—15岁幼童官费赴美，每年30名，四年120名，分批前往美国留学。赴美留学期限长达15年，期满后分批回国，听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朝的外交部）量才聘用。

留美幼童选拔条件极其严格，报名者亦少。当年许多家庭都不愿意把儿子送到既陌生又遥远的美国。由于薛有福自幼就随父亲在厦门生活，他的父亲乃毅然送薛有福报名参选。《东山薛氏家谱》对薛有福一生行事，有清楚的记录。

薛有福曾居住在麻省的霍利约克（Holyoke）的小镇，后考入“波士顿大书院”（即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缩写：MIT）。学成回国后，与詹天佑等16位留美幼童进入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后学堂，组成第八届驾驶班这个特殊群体，补习海军知识[见林萱治主编，《福州马尾港图志》（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出版，1984年），页111]。1883年第八届驾驶班学生毕业，薛有福与容尚谦、吴其藻、杨兆楠、黄季良等6名留美幼童继续留在福建海军，服役于福州船政二级巡洋舰“扬武号”。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1236-1283）的千古绝句，与明代名臣于谦（1398-1457）的“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有异曲同工之处。反映在薛有福、林谋盛两人的光辉事迹上，说明了那个时代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操，为大我牺牲小我。回首今朝，是否有点感慨？

当时的情况是：法国以越南为基地侵略中国，引发中法战争。1884年8月，法国联合舰队司令孤拔（Admiral 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 1827-1885）将十几艘军舰驶入马江，而福建海军也把各处的船政轮船调回闽江下游的马江（又称马尾），形成对峙局面。

中法海战中殉难

1884年8月23日下午1点56分，法国舰队首先向船政军舰开火，中法马江海战于是爆发。法国舰队第46号杆雷艇一颗鱼雷击中“扬武号”左舷。薛有福是“扬武号”的枪炮官，而专司燃放的是杨兆楠。几乎在“扬武号”被击中的瞬间，“扬武号”的尾炮也进行反击，向法国旗舰“窝尔达”（Far East Squadron）连放三次，第一颗炮弹击中“窝尔达”号的船桥，击毙引水员和5个法国人。但由于“扬武号”左舷中鱼雷受重伤，管带张成弃舰而逃，舰上官兵虽顽强抵抗，无奈“扬武号”已逐渐沉没，驶至近岸搁浅，不久就被浓烟烈火所吞没，黄季良、薛有福、杨兆楠三名留美幼童随舰殉国。

马江海战持续三十分钟，到下午2时25分，海战结束，中国海军将士阵亡700余人，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也在海战中被击伤，后死于台湾。

薛有福是此次海战中殉国的唯一与新加坡有渊源的清朝海军军官。一百年后的今天，在福州马尾昭忠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736名阵亡官兵的姓名，其中就有：“扬武”舰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的刻字，永垂青史！

薛有福留美期间，与美国女朋友凯蒂有一段深刻的友情。他们之间有书信来往。一封写于1881年9月1日（于旧金山）另一封写于1882年1月10日（于厦门）。第二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亲爱的朋友凯蒂，你的信在11月8日寄到我家，等转到我手上时已12月2日，当时我在马尾，我的家人以为我会很快回去，故没有转来，很高兴我终于收到了！”

…真抱歉，邮寄你的礼物竟然遗忘了，我想，我们班上仍然每月聚会两次，夏天全班一定还是去诺塔克山区度假一天吧？我把你的问候告诉我的妹妹，她向我打听你的情形，并且很高兴能知道你。我期望我仍在美国，可与好友相聚。我把我的地址用中文写给你，你可以把它贴在信封上，来信寄厦门我的家即可。

希望你一切都好，并且生活愉快，我静候你的回音。

你的挚友，薛有福敬上”

若干年后，80多岁的凯蒂将薛有福写给她的两封信捐赠给霍利约克博物馆，让这段尘封已久的感情故事永远被铭记。凯蒂说：“薛是我特殊的朋友”！

真是“一生知己是蛾眉”！

薛有福牺牲整整一个甲子，1944年6月29日，又有一位受英文教育的新加坡人，在和平前夕被日本人杀害。就是我们熟悉的林谋盛烈士。

林谋盛祖籍福建省南安县美林镇满山红村后埔自然村。他的父亲林路（Lim Loh，亦作林志义1851-1929）是新加坡著名的建筑商，位于皇后坊（Empress Place）的维多利亚纪念堂（Victoria Memorial Hall）即为他所建。林谋盛是林路第11子。

由于林路拥有许多房产，至今在他的故里，人们还流行这样的一句话：“有林路的富，没有林路的厝”。为撰写此文，2012年11月初，我还特地到林路的故居考察。林路故居在当地俗称“林路大厝”，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这是由多座建筑合成一整体的建筑群，据说共有大小房间99间。建筑墙面为花岗岩和红砖结构，梁柱有钢筋水泥与木构混合，硬山式与歇山式屋顶，穿斗式木构架，地面铺饰进口花砖，装饰富丽堂皇，具中西结合的风格。2006年9月18日泉州市人民政府将“林路大厝”列为“泉州市十佳古民居”。

投身抗日事业

1925年，16岁的林谋盛来新加坡与父亲团聚，并进入莱佛士书院学习。毕业后，前往香港大学攻读商科。在香港学习两年后，父亲逝世，林谋盛返回新加坡处理后事并承继父业。经过数年经营，拥有地产、福安有限公司、福安砖厂等实业。除从事商业活动外，林谋盛还参与社会活动，曾任新加坡建筑

公会会长、新加坡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等职务，是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年轻的领袖人物。

然而，最使林谋盛名留青史的是他的抗日事业。林谋盛目睹日本侵略中国，便积极投身抗日活动，先后参与发动侨界抵制日货、筹集赈款等活动，支持中国抗战，策划在新马地区日本人开设的铁矿和橡胶园的罢工活动。

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军南侵，林谋盛出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委兼劳工服务团主任，号召劳工支援对日作战，并组织华侨抗日义勇军，林谋盛因此被日本视为“危险人物”。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前夕，林谋盛辗转到印度，又从印度飞抵重庆，在重庆待了两个多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咨议及福建省临时参议员。

1942年6月，林谋盛在印度加尔各答，将流落那里的2000多名华人海员组织为“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主持训练工作。1943年，在他的建议下，中英双方合作开展收复新马的敌后工作，林谋盛奉命驻印与英军联络，参与

组织136部队，被授上校军衔，并任马来亚华人区区长。1943年10月，林谋盛潜入马来亚，在敌后开展工作。1944年5月27日，林谋盛被捕，同年6月29日牺牲，年仅35岁。

被迫认为陆军少将

新加坡光复后，林谋盛遗骸运返新加坡。1946年1月13日，英殖民地政府在政府大厦前举行公祭，中国国民政府也派代表参加，追认林谋盛为陆军少将，以军礼安葬其遗骸于麦里芝蓄水池（MacRitchie Reservoir）畔，碑刻“陆军少将林谋盛之墓”。1954年又于伊丽莎白女皇道（Queen Elizabeth Walk今改称海滨公园 Esplanade Park）旁建烈士纪念碑。奠基仪式由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Malcolm MacDonald）主持，同年的揭幕典礼则由英国驻远东陆军总司令查尔斯·洛温爵士（Sir Charles Loewen）主持，规格之隆重，可见一斑。今天连接惠德里路（Whitley Road）的谋盛道（Bo Seng Aveune）就是纪念他的。

林谋盛烈士为支援抗日作战，捍卫新马社会献出生命，他在给家属的遗嘱中也体现了烈士的高尚人格：

“望汝勿为予悲，且当以予之为国牺牲而引以为荣，并抚养儿辈长成。当告儿辈以予之遭遇，指导彼等善继予志，勿隳家声。最切要者，儿辈学业应中英并重。予曾计划彼等将来之学业，拟在国内大学毕业之后，然后使之出洋留学。呜呼！此种梦想，在予生前已无由实现矣，然予信汝必能为彼辈处理完善也！”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1236-1283）的千古绝句，与明代名臣于谦（1398-1457）的“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有异曲同工之处。反映在薛有福、林谋盛两人的光辉事迹上，说明了那个时代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操，为大我牺牲小我。回首今朝，是否有点感慨？”

作者为本地历史学者



福州马尾昭忠祠内“碧血春秋”厅的石碑上，刻有：“扬武舰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的字样，永垂青史。



林谋盛纪念碑（新加坡Esplanade Park）



／文：郑钧如

沈颖高级政务次长呼吁： 凝集力量 推广文化

怡和轩第五届华文书籍奖颁奖仪式报道

2 013年5月5日，怡和轩于会所大堂举行第五届华文书籍奖颁奖仪式，主宾为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女士。除了11位得奖者及其家属，出席观礼者有怡和轩董事部同仁和会员，各校师生，盛况一番。

怡和轩华文书籍奖始创于2008年，旨在配合政府政策，培养双语人才，书籍奖得奖者为每一年11所特选中学成绩最优的学生。怡和轩主席林清如感激沈颖高级政务次长前来颁奖，他在致辞时也对得奖的同学说，“对你们来说，这个奖是社会对于你们优秀表现的一种肯定，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你们当然不会欠缺这区区的壹千块钱，重要的是，你们认同怡和轩颁发这个奖的意义，或者说，你们认可怡和轩这个品牌，这令我们感到欣慰。”

林主席也说，“作为特选中学的学生，你们是国家与社会重点培养的学生，你们都将可能



成为国家的精英。希望你们要紧紧记住，之所以能成为精英分子，你们的天分和努力固然重要，但是国家与社会为你们提供特别条件，使你们的天分和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那是更为重要的。希望他日有了成就，应该懂得如何回馈社会，那才是名符其实的国家精英。”

沈颖：推广文教事业 社团可扮演重要角色

主宾沈颖在致词时说，我们在怡和轩见证了許多为新加坡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先驱人物，他们都是家喻户晓的华人先贤。他们在教育事业上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为新加坡的教育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和教育事业，不是一、两代人的事，而是关乎国家兴衰的大事。文化和教育事业非立竿见影之事，怡和轩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在推广文教事业方面始终扮演重要的角色。她呼吁我国各社团组织更好地相互配合，凝聚力量，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沈颖也肯定怡和轩和其他本地社团在文化和历史整理方面所付出的心血，努力帮助年轻一代了解自己的根。她说，“在当年的殖民地时代，先辈们要糊口不是问题，但要争取更好的生活素质和保障只能靠自己，因此当年很多华人先贤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边讨生活，一边建设社会。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刻划了我们华人南洋社会很重要的特色。这种特色并没有因为新加坡获得了独立而改变，仍是我们社会非常可贵的一种特质。”

沈颖特别向获奖学生强调，书籍奖的价值并不在于其金钱的价值，而在于社团对该奖项的奉献及对学生的期许，鼓励学生他日要饮水思源、身体力行，继续发扬先贤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精神。

华侨中学的曾靖杰与圣尼各拉女校的李凯钰分别代表得奖同学致词，感谢怡和轩对推广文化和双语教育所作的贡献。

2013年第五届怡和轩华文书籍奖学生名单

南华中学	梅家豪 Boey Jia Hao Jaryl
公教中学	陈宇凡 Levinson Tan Yu Fan
华侨中学	曾靖杰 Chan Chin Kiat
中正中学	陈思心 Tan Si Xin Adorablelle
南洋女中	林缙 Lim Tze Etsuko
圣公会中学	林安仪 Lam Onn Yi Alina
海星中学	郭骏 Guo Jun
立化中学	吴倩煊 Goh Qian Xuan
德明政府中学	饶明颖 Ngeow Ming Ying Joelle
圣尼各拉女校	李凯钰 Lee Kai Yi
南侨中学	张智宇 Teo Zhi Yi

作者为怡和轩执行编辑



／ 文图：吴新慧
林琬绯

by Goh Sin Hwee
Lim Woan Fei

任人唯贤与精英治国 何以变调？

专访郭建文、何光平

被定型、定调，或自己去给别人定型定调，这在新加坡已经是个很方便，甚至是惯有的思辩和与人相处的生活方式。近年来在网上和民间舆论热议的任人唯贤和精英治国制度，似乎是在2011年那场被政界形容为分水岭的全国大选前后，不断升温就没有停下来过。之后的民选总统选举、相继因意外状况而需要举行的后港补选和榜鹅东补选，任人唯贤和精英课题再高受非议，有些人甚至认为两个补选结果就是选民对执政党多年奉行的这两个机制给予严判。判词是制度已出偏差，许多政策在落实上已跟社会脱节，引致社会不公和收入差距鸿沟不断扩大。

本期《怡和世纪》专题设法探讨这议题的根本，问题的症结，从也很容易被新加坡社会定型定调的学者和商界精英的看法及自身经验，找回新加坡建国时的理念。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者郭建文，悦榕庄集团董事长何光平相继于2013年3月底接受专访，话题打开，新加坡还是应相信和庆幸，这个社会还是有不愿被定型定调的有志之士。因为拒绝被定型，也不主观看待问题及别人，所以开拓自己，也开拓社会。这也是这个专题的导向，不是为结论。

Falling out-of-tune? Meritocracy and Elitist Governance in Singapore

Interviews with Kwok Kian Woon and Ho Kwon Ping

Yihe Shiji joins the recent hot debate on meritocracy and elite government, engaging eminent sociologist Kwok Kian Woon and Ho Kwon Ping, 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Banyan Tree Holdings in conversation on the issue in late March 2013. Below are the excerpts of their respective interviews.



关于郭建文

英文源流背景出身的社会学家，却也同时关心华社发展，对华社的历史、现状与演变有着深入研究与体认。活跃于华文知识界，常参与艺文界或媒体主办的大小华文论坛，曾与华文公民组织圆切线合作交流，积极开拓跨越语言界线的第三空间。

郭建文副教授现任南洋理工大学学生生活副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同时活跃于公共领域及公民组织，曾任国家档案馆荣誉主席，国家文物局、新

加坡美术馆董事会成员、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会长。

研究专长是现代社会转型与变革，范围涵盖社会与政治理论、社会记忆、文化政策、新加坡研究，对新加坡政治社会局势常有精辟分析。今年三月《联合早报》人口白皮书对话会上，郭教授对新加坡式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作了诠释，谓信约确立了“不分种族、言语、宗教”的崇高理想，反倒使人民在现实生活中对

这些课题异常敏感，更倾向于把人按“种族、言语、宗教”刻板归类：先是把新加坡视为由几个特定种族构成的社会，再把“本地人”统归于一个大盒子，外来移民是大盒子之外的众多小盒子。他主张新加坡急需在官方论述及反官方论述之外开辟另一个思考空间，除了multiculturalism，更需要“交互文化主义”（inter-culturalism）和“跨文化主义”（cross-culturalism）。

多了自我，少了社会担当

郭建文谈新加坡式精英与任人唯贤

约 郭建文谈当下热议的新加坡任人唯贤与新加坡精英制度，典型的学者画面出现眼前：一桌子的参考书目，访谈前也还在翻阅着，思考着。好几本厚重的书，是跟社会正义有关，仿佛已经为这话题定调，或者至少这是他对任人唯贤与精英制度的一种价值观认同及期许。

这不是个新议题，但每一在社会里谈开，情绪和焦虑很容易凝聚，这当中有对政府栽培精英和完全奉行精英治国这一体制的质疑，也有对近五六年来新加坡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断加

深扩大的不满，认为许多民生问题未能改进，民意未能听进，都跟政治和行政体制里的精英越来越脱离群众有关。

精英，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否只有负面形象——高高在上，不知民间疾苦，也垄断了许多资源和机会？何以有这样的形象和印象，又是怎么不断加深的？

作为严谨的学者，郭建文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收集资料和数据来说明人们所非议的精英制度和形象，不过，他也深知各种有关任人唯贤与精英制度出现偏差的批评，并非就全是以此传讹、强加给体制的莫须有罪名。

公正、平等，这个新加坡自建国就立下的信念，近年正面临严峻考验，也被视为是民怨积累的根本。诵念着新加坡《信约》里的一段：誓言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郭建文指出新加坡在独立后迅速推展教育，也建立任人唯贤机制，秉持的正是建立公正平等社会的理念。

“只是这些年在迅速发展经济、推广和提升教育时，可能模糊了焦点，偏离了这理想。那下来要问的是，我们是否能还原，是否应回到当初办教育、奠立任人唯贤机制的根本上来？”

要寻回的根本，其实与这两大机制所预设的社会功能及责任分不开。教育和任人唯贤都有它们的社会面，这些社会面也为它们所孕育的无数精英赋予了人本和社会价值。

“新加坡独立前后出现的领袖，都是学有所成，受过良好教育，无论是不是来自上流社会，他们都有很强的回馈社会的意识，一种在民族主义下油然而生的回馈社会意识，相信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价值观。以John Rawl和David Miller等为代表的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在美国及以外都有一定认可。郭建文说，这些论述相信，要建立公正或正义的社会，无论是个人才华与造化，或后天环境的造就栽培，有所成就了也必须也要造福人群。

在他看来，这应该也是任人唯贤机制里应有的社会面：建立正义，促进平等。

“也就是说，在新加坡奉行多年的这个机制是否也包含了道德因素这一层面。如果缺失了，就必须有，使之完整。我们的整个体系，从论功行赏，个人才华到后天栽培，都必须有一定的社会担当，成己也成人。”

目前正在全国召开的“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会，以及政府宣布将为学前教育投入更多资源，协助较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也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前进，是在设法寻回教育的本质和价值，而这个拉回正轨的检视，对当前已诟病的教育与精英体系是个重要的新的起点。

郭建文说，教育在许多社会里扶贫脱贫的一大基石，而与教育息息相关的新加坡任人唯贤机制，本在促进更多社会流动性，创造更多有助人们向上的机会和条件，然而近年来广大社会的感受却恰恰相反，觉得国家的资源是不断流向培养和留住精英，导致落在后头的社群一直未能迎头赶上。

“这是个吊诡现象，今天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所关心的社会不公和不和谐现象，正是当初新加坡建国时极力要避免的，必须正视这些年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不断循环着的单一成功方式

在郭建文看来，过于侧重学业成绩和过于吹捧自我的成功与价值，却忽略了教育的全面性和任人唯贤造就下的精英所附带的社会责任，是当今社会矛盾的一大症结。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不断，但整个体系和社会氛围，仍是文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前途和机遇，这是个人的结，也是社会的结。许多家庭因而拨出更多时间和资源确保孩子的学业成绩能留在主流，对补习和学前教育的需求有增无减。

“我们的社会不断循环着一种衡量个人成就的方式：学业成绩决定了个人的机遇，机遇决定了个人的职业和事

Excessive Individualism, Absence of Social Accountability Kwok Kian Woon on Elitism and Meritocracy in Singapore

Has elitism been given a bad name in our society? Are elites part of the privileged but clueless class who, while monopolising precious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sadly remain cut off from 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the everyday man? How have they come to acquire such a negative image and impression? How has this perception deepened?

Kwok Kian Woon, a scholar who has done rigorous sociological studies, believes that we must gather more facts and statistics to dwell into the real issue of elitism that many people are critical of. However, he is also well aware of the fact that the criticism against meritocracy and elitism today, though skew, have not entirely been misguided and baseless.

Justice and equality, the core values of Singapore's nation building, have been put

under the stress test of late. Ironically, these core values have become the centre of public disgruntlement and dissension. Citing the Singapore national pledge "..... pledged one united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and religion,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based on justice and equality", Kwok indicates that it was for that exact belief of building a democratic and just society that had prompted Singapore to swiftly push education and build a meritocratic social system after the country had gained independence.

"So, along the way, we might have lost that idealism, in the midst of our fast-paced growth and economic expansion. The next question is, can we come back to it? Perhaps we have to come back to the fundamentals."

The return to these fundamentals essentially involve reconnecting with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pre-determined by the two

core values. The social role of education and meritocracy is to accord the countless elites they have produced the sense of humanistic and social values. In order to build an equal and just society,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ose who eventually succeed, be it due to their natural talents or as a result of their nurturing, must give back and do good to society. Kwok believes this should be the social aspect of a meritocratic system: the building of justice and the promotion of equality.

The ongoing "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recent decision to put in more resources into pre-school education to elevate the children from lower-income family to the same starting points as their more fortunate peers, both point towards the efforts of bringing our education back to the fundamentals. Such rectification efforts would be critical to steering our currently

如果狭隘的看任人唯贤，或盲目奉行这个制度，那就是只认可有才华和优秀的人，无法有所表现的弱势群体如残疾、生产力低的人士，就理应被淘汰。但是现代社会的平等信念是，尊重和维护每个人的尊严。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检测一个社会的素质和涵养，必须衡量它怎么对待弱势群体。我们的社会愿景又是什么？

业发展，职业再决定个人的收入，收入再决定个人及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孩子的未来。”

这样的教育结果和狭隘的成功定义及成功之路，不仅困扰和局限了许多个人和家庭的出路，似乎也形成了个人过于追求自我的成功的风气。

“为何我们的社会缺乏企业精神？教育不也应该鼓励创意和企业精神吗？但在新加坡，我们经常说不会读书的才从商。而即使是成功企业家，我们经常也只是以财富来衡量，有钱有势就是大企业、才是成功的企业家。”

郭建文说，这样的风气与价值观，趋向于相信个人的才华与成功，是凭自己努力得来，与社会无关。而这正是当今新加坡社会对任人唯贤机制的思辩，为此，虽然精英或有才华的人也是任人唯贤下的产物，但只认自己努力及应得的，漠视了国家及社会所投入的资源，环境所造就的条件。这样的价值观，也很容易把他人视为是竞争者，而不是社会的共同体。

“要改变这种心态，我们的教育和对成功的衡量与认可，就必须能开拓更多成功的渠道，为论功行赏的机制

纳入更多考量因素，不仅是学业表现，还要包括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

现代社会精英：尊重尊严

然而所有种种有关任人唯贤及精英的讨论与批评，重点并不在于抑制学业优越和有才华的人。

“我们为何要抑制有才华的人？不是这样的，也不应该这么做。但整个讨论要问的是，我们是怎么鼓励和发展人才的？是否也奖励和认可在其他方面奋力向上、有卓越表现的人才，而不只是学业成绩？”

malignant educational and elitist system back on track, and hopefully heralding a new beginning.

In many societies, observes Kwok, education is still regarded "the great leveller" – the ticket out of poverty. The meritocratic system so inherent to Singapore's education was implemented to promote greater social mobility by creating more opportunities and favourable conditions to help its people move up the rungs of society. The general consensus, however, has been that it is doing the opposite. National resources seem to be pumped into nurturing and retaining the elites, while the less fortunate lots who have been left behind are having a hard time catching up. "We need to identify the weak link and figure out where and what have gone wrong."

The perpetual cycle of the single path to success

In Kwok's opinion, our social conflicts today largely stem from our education's over emphasis on academic results and the extolment of personal achievements and

values. As a result, our curriculum neglects the full spectrum of education and fails to impart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at should be intrinsic to the elites who have emerged from our meritocratic system.

Our nation could be pumping investment into education, but as long as the general system and milieu still stresse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degree in determining one's future and advancement, the individual as well as our society will remain trapped in the cycle of the paper chase. Many households invest greater time and resources to ensure that their children's school results keep them in the mainstream, resulting in growing demands for tuitions and pre-school education.

"Our society perpetuates a fixed mindset when it comes to gauging personal achievement: academic results determine one's opportunities in life, which dictate one's occupational status and career advancement. A person's occupation will determine personal income, which in turn has an effect on the person's and the family's social status and the children's future," Kwok remarks.

Such narrow definition and mapping of success not only greatly limits the prospects of the individuals and their family, but also appears to give rise to the self-serving individuals preoccupied with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personal achievements.

"It's very interesting that there is always this talk about, why is it that we don't have more entrepreneurship? Because there may be a more questionable link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But in Singapore, it's often the other way round. It's the school leftout that became entrepreneurs. And even so, the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are often judged by their wealth. An entrepreneur is never deemed successful unless he or she is rich and powerful," Kwok says.

Kwok remarks that such social climate and value system tends to conceptualise and to think of "merits" in meritocracy, as "individual" or even "individualised", believing that an individual's talent and succes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ociety but is the result of one's

我并不抗拒精英，也经常会问学生：精英指的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为社会做了什么？有许多人从社会得益，但很有意识地保持低调，做自己要做、该做的事，时时心向社会。

这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还应该怎么做来推动和鼓励更多人成功？无论他们是来自什么背景，有怎样的学历，让他们在所处的领域能发挥所长，追求卓越，而社会也予以奖励和肯定。另外是，无论你凭着怎样的才华和表现取得成功，是否也应把自己的成就视为国家的共同资源与资产，可以协助谋求共同福利，也就是公共利益 (common good, 也称共善)？”

这也回到怎么组织社会，怎么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的问题。郭建文说，任人唯贤如果能成为现代社会所推崇的正义及平等的核心，是非常有意义的，也会对公共政策及社会所谋求的公共福利起关键性作用。

“现代社会相信和设立平等价值的基础，就是致力维护每一个人的尊严。这是非常有力量的社会信念。这不

只关系到怎么对待穷人，还包括残疾人、智障人士等等。”

为此，他认为，在找回及检视新加坡办教育，推行任人唯贤制度的根本时，需要问的是我们还应该做什么？我们的社会愿景是什么？

“我们的《信约》又应该有怎样的愿景？除了不分种族、言语、宗教，是否也能说无论社会环境与背景？其实是有背于我们一直相信和所公认的，那就是：尽管新加坡经常高举社群主义或儒家思想，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来抗衡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我们的任人唯贤制度和教育所产生的精英，是非常个人主义的。”

新加坡的奖励或论功行赏作为一种制度，是鼓励和追求卓越，“但卓越的价值里是否也应包含道德？卓越与品德，应该是一体的。”



own hard work. "So this kind of discourse of meritocracy is highly individualised, as opposed to being social or relational."

Such phenomenon is Singapore society's current criticism against its meritocratic system. Although meritocracy has spawned a pool of elites and talented individuals, these select group would only attribute success to their own hard work, glossing over the resources that the country has granted them, and overlooking the opportunities that their environment has offered them. Such personal values breed constant competitiveness. Everyone else would be regarded as a competitor, not our fellow man.

"In order to change this mindset, our edu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success have got to broaden to incorporate more avenues of success, while our meritocratic system goes beyond academic performance to include consideration of the individual'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Modern meritocracy: virtue and dignity

Kwok emphasized that, the whole point of all our discussion and criticism of meritocracy and elitism is neither to suppress academic excellence nor to stifle the people with talents. What we seek to understand is: "How do we encourage and develop talents? Do we reward and acknowledge talents who strive hard and excel in other areas other than academic performance?"

We should address the questions on two levels: "One: what more can we do, to have more people developing excellence in areas they can realise their potential? And two, for those who succeed, from whatever background, should it be regarded as a common asset that can enhance the common good?"

And such argument brings us back to the topic of social organisation, and how we can build a better society. Kwok believes that meritocracy would only be meaningful and significant to

our public policy on common welfare when it truly becomes the core value of the justice and equality that our country so uphold.

"Modern society believes that the value and basis of equality lies within the commitment of the idea of each and every human being as having dignity. To me, this is a very powerful idea. It's not just how the poor would be regarded. What about the disabled? What about the mentally ill?" Kwok asserts.

"If we want to have a completely meritocratic society, in which the race must go to the talented, the successful and the productive, then one logical conclusion is that we must eliminate the disabled, or people who are considered as unproductive. But the modern concept of equality is about individuals being treated with dignity. So there is this very common statement, that the test of a society, or the quality of a society, is measured in how we treat the vulnerables." Kwok says.

跨越与并存：心向社会的第三空间

新加坡的强势政府和其政治精英的影响力，经常让好些国人觉得剥夺了公民社会和知识分子的空间和作用。郭建文则喜欢把知识分子，或政治与市场力量以外的空间归为第三空间。

“论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作用，我比较喜欢用第三空间。因为知识分子应该是广义的，不是只有学术界，或者只在大学里。”

他提醒，新加坡的艺术圈也有知识分子，在外国，知识分子和精英更有来自创意和媒体等领域的有志之士，只是在新加坡经常看到的只有两大力量，一是体制，一是市场。

“体制里的政治关乎政权，市场关乎金钱。因此，无论是政治精英或是商界精英，都不能少了品德；一旦缺少监督或道德论述，体制和市场两大力量

恐怕就会只朝权力和金钱发展。这也是为什么第三空间那么重要。”

至于新加坡的第三空间有多大、力量又有多大，这对郭建文并非是最至关重要的，他更关注的是第三空间的独立性，必须不受权力和金钱的左右与诱惑。必须处在政治之外，尤其是政党政治与市场之外。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或隶属第三空间的成员一旦进入体制内服务，就必定被收编而缺乏独立性。郭建文认为不应这么主观判断，作为社会和国家的一员，每个人可以有多重角色，也可以跨越领域和空间。

“可以是在某个时间点里在体制内工作，但其他时间点同样可以在体制外发表自己的看法，两者之间是不必互相排斥的。很多知识分子可能已被纳入体制内，但不代表他们不能继续在

体制外发表看法。在政府部门和机构，都可以保有独立性，发挥公民社会或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体制外发挥作用。”

台湾是个很好的例证，有很强的公民社会，公民意识也很强，人与人之间，各领域间都受到尊重。“在新加坡，可能我们更多是把对方当竞争对手，竞争我们的空间、资源和机会等等。”

为此，郭建文认为应保有第三空间的开放度，“谁都可以进来，年轻人，贫穷的人也可以”。而这个空间是可以跨越和并存的，“有时一脚在这个，有时在那个空间”。

至于自己是不是精英，他坦言，并不抗拒精英，但更在乎的是，如何避免体现精英的负面形象。重要的是，精英怎么来，为社会做了什么。“有许多人从社会得益，但很有意识的保持低调，做他们要做的事，该做的事，心向社会。”

To traverse and co-exist: the socially responsible third space

The power and control of Singapore's authoritative government as well as its political elites has often made the people feel that their civil society and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robbed of their rightful space and functions. Kwok prefers to refer to the realm inhabited by intellectuals or all the people outside the political and market system as "the third space". He points out that outside of Singapore, the intellectuals and elites would consist of passionate individuals within the creative fields and media industry, but in Singapore, we almost only see two major controlling forces, predominantly from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Elites are not just the political elites, there's also the monied elites. And if you want to talk about party politics,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attaining power. You want to talk about market, there is the question of money. So we

believe that no politician should be without virtue, and no businessman should be without ethics. But if you leave them on their own without any moral discourse, the tendency will be towards power and money. And that's why the third space is so precious." Kwok says.

The magnitude and sphere of influence of Singapore's third space is not as important to Kwok as its independence. The third space must not be swayed or enticed by power and money; it must steer clear of politics, especially partisan politics and market forces.

Having said that, it does not imply that once an intellectual or a member from the third space enters the system to offer their service, they would automatically be fully co-opted and lose their sense of independence. Kwok cautions against such subjective judgement, and asserts that as a member of society and the nation, one should be allowed to play several roles, freely moving in and out of multiple realms and spaces.

Kwok considers Taiwan a strong civil society where its citizens have a strong sense of civility, and there is mutual respect between people and its diverse communities. "Whereas in Singapore, perhaps we tend to regard each other as competitors vying for our precious space,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Kwok considers. As a result, he regards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our third space open, "so that anyone can freely come in, be they young or poor people." The all-inclusiveness and openness of this space would allow someone to both traverse and co-exist in it. "Sometimes you are one leg in this space, one leg in the other," Kwok adds.

Asked if he sees himself as elite, Kwok replied, what is more important to him is, he would always strive to avoid acting out the negative connotation of elitism, or to be elitist.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have benefitted from the system, and who have kept a low profile, doing what they want to do and what they must do, being socially responsible," Kwok says.



关于何光平

西方媒体称他为“出身牢房的富豪”，妻子形容他是“资本主义于财、社会主义于心”。而他则总以“人本主义者”自居，立志当学者，任降于身被迫弃文从商，而后成为新加坡海内外备受推崇的企业家。

何光平1952年生于香港，在泰国长大受教育，而后负笈台湾东海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少年立志“改变世界”当选学生领袖，进而在第三世界革命浪潮兴起时参与学运反对越战，遭斯坦福大学开除。

回新后担任财经记者7年，因文章引起争议被捕，禁闭三个月。获释后在新加坡大学完成学士课程，主修经济与历史。

1981年家中生变，以长子身份继承父业，在成败浮沉间摸索出自己的一套经商模式。1994年，机缘巧合下成功将普吉岛废弃锡矿改造成亚洲第一个综合度假胜地，“悦榕”品牌从此确立，20年内发展为全球顶尖度假村、酒店、SPA、公寓住宅的跨国营运开发商。凭其独到的经商模式与创新战略思维，

先后获颁美国、英国、中国、新加坡企业成就奖。

叱咤商场之余，在海内外多个组织机构担当重责，包括新加坡管理大学执行主席、新传媒董事主席、旅游局董事主席、伦敦商学院亚洲区域顾问委员会成员，亚洲协会国际理事会成员。2009年获颁国庆卓越功绩服务勋章，2011年获雅虎新加坡网站评为最有影响力的思想领袖之一。

拒绝被定型的精英

何光平志当思想领袖

“我 显然是精英的一份子，说不是的话就装假了。”

身处于一个近乎“仇视精英”的社会现状，当社会为“精英”扣上的标签从极度崇高沦为极度负面，本地知名企业家、悦榕集团创办人何光平，对于自己的“精英”身份却直认不讳，不感到丝毫愧疚或不自在，而是坦然众。

但他对身为“精英”有着一番自我诠释与要求：“真要说怎么看自己……我不是个知识分子。我比较倾向于用另一种说法……这也是我真心希望更多亚洲商界精英也能做到的一点，那就是：成

为超越商界的思想领袖。”

让他有感而发的是，许多成功企业家，谈起商务课题各有见地，就是鲜少针对扶贫济困、教育、政治等课题提出看法。大家似乎都有所顾忌：既然让外界定位为“富商”、“大亨”，即使出席与商务无关的社会活动或公共场合，也碍于“商人”身份而不敢多说，唯恐“越界”，或自觉无论说什么都会被认定是出自商业考量。

“商人自然都得赚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对人口、社会、教育、政治、文化艺术等其他方面发表观点。

大家都是社会的一份子……为什么要认定商界精英就必定只能以商人的眼光看待一切？所有观点都必定是从大亨的角度出发？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拒绝定型，拒绝被社会定型。”

拒绝定型，是避免自设框架束缚自己，也是突破社会在分层分工过程中，为不同领域的精英套上的隐形界线、框框、局限。他吁请商界精英更完整全面地看待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培养社会意识与责任感，不光足以在商界领导思潮，更要成为全面的思想领袖，有能力发挥精英的作用、造福社会。

精英本无罪

在何光平看来，精英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提倡“任人唯贤”理念的社会必然会有结果。“因为所谓‘任人唯贤’，就意味着有人凭着一些社会既定的条件特质往上升，而一旦有人往上升，不再是人人地位相等，精英就必然产生。”

哪怕是古代封建制社会，甚至部落族群，都必然有人脱颖而出成为社会领袖或精英。差别只在于这些精英怎么产生，是通过家族背景、封建体制、族人推选、或者凭才能胜出。

而精英，既是任何社会的必然产物，这个词本身其实不含贬义。“只有当‘精英’发展成‘主义’，形成以精英至上而忽略社会其他社群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有了所谓的‘精英主义’，这才成了负面现象。”

跳脱情绪面、回归学术面来谈“任人唯贤”和“精英”，何光平列举了“任人唯贤”体制几个关键因素：“精英”怎么定义？“精英”如何产生？精英产生过程的流动性有多大？最后是，社会认可的精英只能有一种，还是趋向多元？

请他把所提的这种种理论置于新加坡的框架下检视，他说，新加坡社会的任人唯贤结构是毋庸置疑的，甚至比很多其他社会都完善公平。“但是矛盾吊诡的是，这么一个坚实完善的‘任人唯贤’结构，却始终无法达致‘任人唯贤’的效果；非但无法做到公平竞争，反而让社会的种种不平等日益扩大。这个矛盾的根源，我们必须厘清。”

他一再强调，精英或任人唯贤都没有原罪，症结还在于贯彻理念时，如何为任人唯贤的‘贤’字定义，有多少通往成功之路，又有多少制造精英的渠道？

“在新加坡，制造精英的管道似乎只有一个，就是教育；或者更具体说，是学历与文凭。而学历和收入之间有其内在联系，而这重关系又跟社会流动密切相关。于是，往上升的阶梯，变得越来越狭隘。”

既然教育与学历是往上升的唯一管道，学历又理所当然带来高收入，哪怕原本同处一个公平的起跑点，脱颖而出的佼佼者，普遍上说，也更有能力培养下一代成为这个体制的胜利者。于是，医生的子女继续成为医生，富商的子女也多半成为富商。

再是，我们的社会对“精英”的定义也相对狭隘，真正受认可的其实只有政界和商界的精英。何光平以其他社会为例说，在美国，运动员、时尚达人，都可成为百万富翁；即便是台湾、中国、日本等其他亚洲社会，艺术家和文人也都

I Would Like To Be A Thought Leader Ho Kwon Ping, An Elite Who Defies Typecasting

"Clearly, I am a member of the elites. it would be false to say otherwise," Ho Kwon Ping proclaims.

In this day and age when the general public view "the elite class" not with the expected high regard, but rather, with somewhat of an animosity and all-around negativity, it takes a great deal of self-awareness and confidence for Ho, eminent entrepreneur and the founder of Banyan Tree Holdings to make the above admission.

Ho Kwon Ping has no qualms about being an elite because he has a personal take and high standards on what it takes to be his kind of elites.

"I am not an intellectual. I think that is sort of too grandiose for me. I think if I have to

say how i would like to see myself, I would be inclined to use another word – something I truly hope a lot more business leaders in Asia can also be – that is to be a thought leader," Ho says.

It impresses upon Ho that many successful business owners have a lot to say about running businesses, but somehow run out of views and insights when it comes to topics about helping the poor and needy, education, and politics. They seem to be concerned that because others see them as "businessmen" and "tycoons", even when they are at social events and public setting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business, they feel that it is not in their place to engage in social discussion about general issues of society. "Somehow they feel that they cannot say anything, because if they

say anything, people will see that they are just saying it for themselves, for the benefits of their businesses," Ho remarks.

"We are businessmen, of course we have to make money. But we also should have views on our population, society, education, politics, the arts and culture. We are all members of this society... must we presume that a business elite could only share his or her insights as a business person? Or that if you are a tycoon, every views you have is a tycoon's view? Life is not like that. I don't want to typecast. I also don't want to be typecast by society," he elaborates.

For Ho, the refusal for typecasting is the rejection for restrictive parameters, and his way of breaking free from the invisible

被奉为国宝。新加坡纵使每年颁发文化奖，但文化精英的地位“明显地远远不及其他社会”。

“在这里，社会地位最终只取决于两个因素：政治地位、财富。”

结果只能是：同一类型精英不断地自我巩固自我“繁殖”，致使社会种种失衡悬殊状态持续加剧，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这就造成民怨日益高涨，进而演变为唾弃任人唯贤体制、仇视精英的社会氛围。

认可各类型精英

这个盘根错节的恶性循环状态要重新解开，并不容易。当政者显然也看出问题所在，正设法重新建立“任人唯贤”应有的价值，把执行面导回正轨：从根本上扩大“精英”的定义，让社会流动的管道、通往成功之路，都更趋多元化。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必须能认可更多不同类型的‘精英’，让不同领域的精英也有机会参与社会建设。”

何光平举例说明，在美国，因为政治体制有其特殊性，内阁成员非民选议员，而是由总统从各界委任的能人智者。比如前国务卿舒尔茨、基辛格，都是学者出身。“决策团队就未必只有政治人物，而是从各个领域吸纳最强的思想领袖组织而成。这么一来，思想学术界与决策圈的交流非常蓬勃，不同类型的智库也能发挥不同功效。这就使整个政治过程有了更多不同角色参与，而非只有选举产生出来的政治人物。”

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因为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无法让政治精英听见，所以社会急切需要更多思想领袖。”令人欣喜的是，如今中国年轻一代的商界精英与上一代不同，更愿意超越私利与商业范畴，关心国家社会的发展。

但中国还得面对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社会资源不断被中共党内政治精英汲取，未必是为中饱私囊，而是为了制造更多党内政治精英，致使党内政治精英不断繁殖，中共政权不断巩固。

何光平强调，毕竟新加坡无论体制上国情上都与中美各异，他并不认为把美国模式搬到新加坡来是个实际可行的方案，也未明说中国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哪些借鉴。

不过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新加坡能让更多不同领域的思想领袖也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我想应该是好事。这个情况如今也确实发生在发生，看看白皮书所引起的反应，大家都那么踊跃地提出各自的看法。”

忽地，语调一转，他半调侃半肯定地说：“新加坡是进步了……从我坐牢到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变。”

boundaries, frameworks and limitations that society imposes on elites from every field, in the process of classifying and placing people. Ho urges businessmen like himself to see themselves in more holistic ways. He hope that they can cultivate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instead of limiting themselves to the business world, to become all-rounded thought leaders who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our society, as elites are meant to do.

"Elites" is not a dirty word

As Ho sees it, the elites are the intrinsic products of a society that champions meritocracy. "Because meritocracy implies that by merit, you rise to the top. The idea that you rise to the top, rather than everybody being equal, already implies that there is some kind of elitism," Ho says.

The concept of "the elites" has always existed, even in tribal societies. Someone would emerge from the mass and rise to the top to become the leader or elite of the community. The whole question about elites as well as

meritocracy is: how are the elites created? Is it through inheritance and family connections? Is it through the feudal system? Are the elites elected by the community? Or had they won the roles through meritocracy?

Since "the elites" are natural products of any society, it should not be a bad word bogged down by negative connotations. "It is only bad if you talk about 'elitism', when it has become a social ideology which favours and caters predominantly to the elites above all else in society. That is when the elites get a bad name," Ho says.

Removing the emotional part of the argument, and addressing the elite from an academic perspective, Ho highlights the few crucial factors of a meritocratic system: How do we define an elite? How is an elite created? How fluid is the elite creation? Finally, how many types of elites exist in the system? Should a society have only one type or a diversity of elites?

When asked how his theory would fare in Singapore, Ho says that the country

undoubtedly works on a truly meritocratic structure, one that is more thoroughly conceived and fairer than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but yet it is not achieving the outcome of a more egalitarian society. "The dilemma we have in Singapore is that, we have a very meritocratic structure, but the outcome is obviously an increasing inequality and a widening gap in our society. So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and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source of that contradiction," Ho says.

Ho stresses that both the elites and meritocracy are not the source of the problem. The true challenge lies in the execution. How do we define the merit in meritocracy? How many paths within this meritocratic structure leads to success and how diverse are our elite creation channels?

"Right now, we only have one channel to elite creation, and that is through education. Maybe you should not even call it education. I call it academic qualification and grade. Additionally,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come and education, which is

精英是任何社会的必然产物，这个词本身其实不含贬义。只有当“精英”发展成“主义”，形成以精英至上而忽略社会其他社群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有了所谓的“精英主义”，这才成了负面现象。

透过悦榕重构任人唯贤

何光平刚在2011年获雅虎新加坡网站评为新加坡最有影响力的思想领袖之一，也在悦榕集团的业务之外，兼任多个海内外组织机构董事局要职，足见他正身体力行地在社会多方面发挥“思想领袖”的角色，履行自己对社会关怀与责任。

实际上，他对精英的自我诠释与要求，也反映在悦榕集团的品牌哲学上。访谈中，他不只一次强调，无法认同外

界以“奢华”来形容悦榕，因为任何产品一旦定位为“奢华”，必定也附带了“排他性”(exclusive)，把绝大部分人排除在外。

相反地，他希望建立的悦榕，是个具启发性，能激励人心的品牌 (aspirational)，价格定位不算大众化，却也不至于让人负担不起；重点在于让人付出一点代价，换取一次浪漫、私密、难忘的体验。

他以Prada、爱马仕和苹果为例来说明：“像爱马仕的铂金包，每一款全球只有3000个，每个售价三万元；或者你买Prada，因为你清楚知道，除了你和自己所处的上流社会之外，其他人不可能买得起。所以品牌基础其实不在于设计，更在于‘独有’和‘排他’。反观苹果，产品定价也许比其他同类品牌来得高，却也不见得贵得买不起，用户买苹果，不为展现‘唯我独有’的姿态，反倒是为

also closely tied to social mobility. As a result, the ladder leading upwards becomes even narrower," Ho adds.

Since education is clearly a means of upward mobility, and academic qualification plainly leads to high income, even though everyone were to start on an equal footing, it is ultimately the well-educated, namely the elites who have successfully emerged from the system, who would have all the means and the clear edge to nurture their children to do well in school and emerge victorious just as they had. As a result, a lot of the children of doctors become doctors, and children of wealthy businessmen are likely to also become rich entrepreneurs.

On top of that, Singapore's definition of "elites" is relatively narrow. They are basically business and political elites. Ho cites examples from other countries where the definition of elites are obviously wider and more diverse. In the US, athletes and fashion designers can become millionaires. Even in Taiwan, China, Japan and other Asian societies, artists

and cultural figures are valued as national treasures. Even though Singapore gives out the Cultural Medallion Award every year, what has it achieved for our arts scene? "Maybe the society is one which does not have a lot of culture. Cultural elites in Spore have hardly the same rank as you have in the West, or even in other parts of Asia," Ho observes, "We have an immigrant society where two things define success: political status and wealth."

The detrimental outcome of all these: the same elites are perpetuating themselves within the meritocratic system, further deepening the state of social imbalance and widening the income disparity. Such inequality would fuel discontent and dissidence already seething in the lower rungs of the social ladder, boiling over into resentment towards the meritocratic system and animosity towards the elites in our society.

Recognising that there are all kinds of elites

The existing situation has long become a vicious circle. It is certainly not easy to undo this Gordian knot. The powers that be have

clearly recognised the conundrum, and are working at rebuilding the true value of meritocracy in our society. In order to steer the meritocratic system back on track, they are fundamentally expanding the definition of elites, increasing the pathways to success, as well as diversifying the social mobility channels.

"Most importantly, our society must recognise that there are and will be different types of 'elites', and open up the doorway to allow more elites from different field to take part in our social development," Ho says.

Citing the US as an example, where due to its unique political system, its policy makers are not elected by the people but thought leaders handpicked by the President, Ho notes that George Schultz and Henry Kissinger, both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had all hailed from academia. "There is a lot of movement between academia and policy making. The power of decision-making lies not only in the hands of politicians, you se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dependent think tanks.

了融入全球500万人的苹果社群。苹果代表着某种生活态度、价值观、哲学，是个能激励人心的品牌。”

所以，悦榕选择走精品酒店路线，而非五星级豪华酒店，也从不砸大钱

请明星宣传，看到度假村有来自新加坡组屋宾客留下的赞语，会比大明星大富豪光临更让何光平心悅。

悦榕品牌的核心价值，也再一次印证了他对自己“精英”身份的要求：非

高不可攀、脱离群众，而是要做到平易近人，让人如沐春风，并在思想上对群众有所激励和启发。

重建“精英”形象之外，他也视推动真正的“任人唯贤”理念为己任。在

他看来，酒店业正是为各种背景甚至没受什么教育的人才制造机会，推动社会流动，实践“任人唯贤”理念的最佳平台。

“我要是经营电脑业，就不可能真正提倡任人唯贤，因为电脑是门很专的学问，你要嘛就是这方面的高材生，要嘛就是一窍不通。酒店业不一样，很多穷人家小孩进来，没读过什么书，但是聪颖热情，充满干劲，只要加以培训，他就有潜质在酒店业冒出头。”



何光平于2009年在上海获中国酒店投资峰会颁予“酒店业终身成就奖” 图 / 何光平

You have think tanks that are affiliated with conservative thinking or liberal thinking, and so on. So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players who contribute to the whole political process, who are not elected politicians,” Ho says.

Ho paints a different picture in China: “There is a real need for thought leaders, because the intellectuals are not getting heard by the political elites.” Fortunately, the tides of change are slowly washing over China, where the younger business leaders, ideolog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lder ones, are emerging. The younger business elites, besides having views of their own, are more socially conscious. They are willing to go beyond making money to caring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spite of that, Ho observes that the Middle Kingdom is plagued by another worrying situation. China is increasingly creating elites

where the country's resources are extracted for the creation of more elites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system has become so entrenched in the party that the elites are there just to perpetuate themselves, in order for it to strengthen and reinforce its ruling power.

Ho stresses that, in terms of structure and culture, Singapore is still different from the two superpowers he has cited. He neither thinks it is feasible for Singapore to import the American model, nor has he indicated the kind of lessons Singapore can learn from the China experience.

But this insight he does offer: “It would be a good thing for Singapore to allow thought leaders from various fields to take part in its policy making, and it is slowly and surely happening right now. Look at the public's response to the white paper, and how

enthusiastic everyone is giving their views and inputs to the debate.”

Ho adds, with a shift in tone that comes across as part affirmation and part jibe: “Singapore is improving... it has come a long way since I got out of jail.”

(Editorial note: In 1977, while working as a journalist for 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 was detained under Singapore's Internal Security Act for penning pro-Communist articles in the publication and put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for three months.)

Redefining meritocracy through Banyan Tree

Ho was recently named the “Top Thinker” in the 2011 Singapore Yahoo Awards. Besides being the chairman of Banyan Tree Holdings, he also holds key positions on many boards and councils in Singapore and overseas. All

在新加坡，制造精英的管道似乎只有一个，就是教育；或者更具体说，是学历与文凭。而学历和收入之间有其内在联系，而这重关系又跟社会流动密切相关。于是，往上升的阶梯，变得越来越狭隘。

悦榕业务基点，如泰国、印尼、中国等地，都是相对落后的社会，贫困社群较多，也因此有更大空间让何光平去推动社会流动。

集团在2008年成立了悦榕管理学院，为有潜质的人才提供培训，好让下层年轻人有机会升任管理职务。他说，通过训练学校推动社会流动，是他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困境

何光平当前的另一要职是新加坡管理大学主席。不过他坦言，相对于悦榕集团，自己在管理大学能做的非常有限。

“在管理大学，我们从收生阶段起就有一套严谨的标准和模式，绝不会因为你来自富裕家庭而特别优待，或者出身贫寒就受到歧视。但现实状况是，能通过入学笔试的学生大多来自中产或更高阶级家庭。我们总不能说：你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不录取你吧？”

对于付不起学费的贫寒子弟，校方自有各种援助方法。“但在新加坡，大学学费从来不是个问题！政府津贴高达80至90%，任何学生，哪怕住在组屋区，父亲是个小贩，也不会付不起学费。”

他指出，新加坡社会已到了发达阶段，各种不均不等再怎么扩大，落差始

终难及印尼等地的巨大鸿沟。要在这么一个发达社会里让任人唯贤发挥应有的功效，确实非常困难，任何人尝试改变都不容易。

但他强调，这不应当全是政府的责任，而是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共用担当解决的问题。唯有当社会上下都愿意重新定义“成功”，愿意接受出路不只一个，认可与尊重各种不同类型的精英或杰出人士，任人唯贤的真正价值才能重新建立起来。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these testify to his personal involvement in thought leadership on many levels, as well as his commitment and care towards society.

In fact, Ho's personal definition and standards for the elites are all written on Banyan Tree Holdings' brand ethos. During the interview, Ho more than once stresses that even though many people have described Banyan Tree as a "luxury" hotel group, he does not necessarily see it that way. He believes that once a product has been positioned as "luxury", it would inherently become "exclusive" which implies the exclusion of the majority of people.

His vision for Banyan Tree, on the contrary, is not exclusive but aspirational. It is a brand that inspires its users. Although its pricing is certainly not for everyone, but yet it is also not exactly unaffordable. In exchange for a little premium, Banyan Tree properties offer

its customers a romantic, intimate and and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n Ho's view, Banyan Tree is more Apple and less Prada and Hermes. "Hermes only makes 3000 of their Birkin bags, and each costs \$30,000. Or you buy Prada because you know everybody else cannot afford it, except you and your high society. So these brands are built not just on beauty, but more on exclusivity. I have it, you don't have it. You take Apple instead. Sure, Apple products are still probably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other brands, but not entirely unaffordable. For people who are Apple fans, they are really into Apple because they aspire to be a part of the community of 5 million global Apple users. The brand is aspirational, it is not exclusive. Apple represents a certain lifestyle, values, philosophy, way of doing things," Ho enthuses.

A Banyan Tree property is therefore branded as an exquisite boutique hotel and not five-star luxury hotel. Ho refuses to do any campaigns nor will he invite movie stars to stay to boost the hotel's celebrity status. Ho is happier to win over the heartlanders. "In fact, we try to create the value so that when we do have guests signed in our guestbook, many of them were from the HDB heartland," Ho affirms.

Banyan Tree's core brand values once again attest to the high standards that Ho Kwon Ping demands from himself. As an "elite", he does not pride himself in staying in the ivory tower of luxury elitism, far away from the crowd. Instead, he takes his brand to the people, creating aspirational as well as inspirational values for all in society.

换个角度谈精英治国

有关“精英”这一概念的精确含义，目前似乎还没有统一的看法。精英这概念可远溯至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及柏拉图，至后世的马基维里的一些类似的观念。

柏拉图认为政治控制权必须被置于少数哲学家手中，在哲学家（一种统治阶级）实行统治之前，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他认为这些哲学家们受过充分的教育和训练，只有他们才具有成熟的才能，按照“智慧的原则”协调生活的各个要素。

但最早提出“精英理论”的其实是两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学者莫斯卡（Gaetano Mosca）与柏雷图（Vilfredo Pareto）。莫斯卡指出，在一切政治体系内都存在着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即精英）与被统治阶级（普罗大众）。他所探讨之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政治精英的本质；另一个为精英如何维持其地位及为何被更换。而柏雷图治理精英（Governing elite）的理论，比莫斯卡的精致，意义更广，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任何团体或集团中，有少数的人比其余的大多数人更有能力来治理事务，这少数人即所谓“精英”。因此在任何行业，任何体系里都存有精英，同时社会的文明与演变是随精英之变动而更易。

政治人物不应塑造权威偶像

在前述之精英理论中，并没有强调“权威”之必需性。不过在我们的社会，有不少人认为，精英治国意味政府必须要有“权威”，而当政者也认同并表现出权威的气派，结果是忽略民意及人民的参与感。笔者认为，这种权威精英说法在政治学理论上是有待商榷的。事实上，现代进步国家民主制度里更有刻意防止塑造权威，以避免导致专制主义产生的宪法条文，以便彻底杜绝政治人物借其政权以塑造权威偶像。

对一般人而言，精英指的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及主

导能力的人。这些主导人物必须以他们的长期工作绩效超凡他人来服众，进而被公认为特定领域之佼佼者。但在我们社会里，常把一些未经在任何领域证明其实力超凡，只是以其学力（指考试成绩）而被预定为精英，然后刻意创造某些政策来培育这些“预定精英”。有时体制因为要达到其为自己锁定的治国效益，不惜将这些量身定制的“预定精英”空降到政府要职或政治职务的“快车道”，以便这些“预定精英”能够青云直上，快速上升至领导阶层，而他们往往也被委以与他们的专长领域截然不相称的岗位。这种精英治国模式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的，是不可忽视的。笔者试从纯政治学角度，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精英权威论和“预定精英”的治国模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所可能产生之影响：

不利创造独立思考的社会

- 在过度强调权威的政府之“精英”政策下，人民必定会过度依赖政府（不管是出自自愿或是无奈），结果社会必逐渐趋向政治冷漠及畸形发展，并导致专制主义出现。长期来看，政府可能因而失去效率，甚至滋生腐败。

- 现代政府机构随着每一种功能的增加而不断膨胀。政府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的进入社会每一个角落，以至必须由上层来订下过度详细的条规，来掌控各个机制的运作。结果运作过程中容易形成僵硬化、官僚化，以致效率不彰。基层执行者渐渐缺乏灵活应变能力，整个体制导致中央集权制度之出现。

- 由政府任命并领薪的人越来越多，政府对相关机构之职能和人事的控制权越来越集中。被任命者，因自身的权益所在，自然缺乏自主性，凡事怕做错，没有指令做不了事，这大大影响一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或习惯。这样的发展无助于创造一个独立思考，有创意的知识经济型社会。



文：陆锦坤

■ 政府行政权力无休止地膨胀，又只掌握于少数精英手中，人民由于缺少参与机会而导致缺乏实际经验和信息，同时政府信息管制，形成资讯流通越来越闭塞。由于缺乏所需资讯，结果可能造成民智不易开窍，政治知识低落，最终则无法做正确政治选择，行使监督行政之权力，一朝政权落入不良“精英”分子手中，国家便陷入危机。

党政界线应分明

■ 对解决社会问题，民众所提出的任何有创意性的意见，除非与官僚机构的观点与利益一致，否则可能不会被认真对待及考虑。

■ 随着政府权力的膨胀，越来越多自私而又有野心的人，开始靠拢、依附、并口是心非的附和政府或执政党，有意

无意之间可能形成党政难分的局面。如委任政府高官进入政联企业高层领导，或安排退休高官受聘于政联企业，随时都可能出现政商之间的利益冲突。

■ 政府在政策拟订时，虽然了解需听取人民意见，以集思广益方式来做决定。但往往因有“精英”的高傲心态从中作祟，有时又难免于急功近利，在还没有听取民意之前政策已定，无形中降低民主制度功效。

■ 政府所创立的政联公司或许已成精英治国的一环，但是对于民间企业而言，那可是对于他们有形或无形的挑战及排挤。长期而言，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不利。

■ 行政权影响力无孔不入地全面渗入社会事务，人民习惯于被管、被指

令。在人民心目中，政府变成一个令人生畏的管理机构，而其存在并不是为了保障“人民福利”和“社会的改革与进步”。

总而言之，在这世界上，任何事物，包括政治理念与制度，有利必有弊，尤其是时代、环境不断变迁，潮流更在巨变中，我们绝对无法寻得永恒完善的事物。因此任何事物，有“利”时则须防止“弊”之产生，在其展现正面效应时，则需更加谨慎思考产生负面之可能性，并及时加以防备及阻止。虽然现时我们有个好政府，但如果政府过度强调与执行“预定精英”之权威精英治国方式，便会造成民智不易开窍，未来依然让人忧心。

作者为怡和轩副主席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Elitism

The concept of the elite goes as far back to ancient Greece. It can be loosely attributed to Aristotle and Plato. Even Italian political philosopher Machiavelli, who came much later, had raised a similar notion. Plato believed that political control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hands of the select few philosophers.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could not be resolved until these philosophers, who belonged to a certain ruling class, had assumed governance. He believed that since these philosophers had undergone rigorou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y were fully equipped with the maturity and capability to coordinate the various aspect of the people's lives through the "principles of wisdom".

It was Gaetano Mosca and Vilfredo Pareto, two Italian scholars from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who had first come up with the theory of elitism. Mosca stated that two classes exist within all political system -- the ruling class (the elite) and the class being ruled (the masses). He particularly addressed two subjects: the essence of the political elite; how the elite maintains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how they get replaced. Pareto's pontification on the governing elite was more sophisticated and significant. He expounded that within any

society, organisation or group, there would always be a select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more capable of governing the rest. This small group is what we consider to be the elite. We can infer that an elite class can be found within any industry and social system. Ultimately, the civilisation and evolution of a society is pegged on the changes within these elite classes.

In the context of our society, where the elite run the country, it implies that the government must command significant authority, and when the powers that be subscribe to the same elitist principle, they would similarly adopt and project that position of authority. Such governing elitism has been challenged by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In fact, modern democracy has generally legislated against autocracy and the intentional cultivation of unchallenged authority.

The elite refers to those who are able to rise above the majority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specialisations and win the respect and recognition from the rest with their proven achievements and merits. Such a status ultimately elevates them to become the crème de la crème of their fields. Elitism, however, does not take that course in our society. We

often preselect a person to become an elite based on his academic merits, when in fact this person has not yet proven his capabilities in any fields. Our system intentionally creates conditions to train them to eventually become the elite. These "pre-determined elite" would be elevated to high positions in society and escorted through the ranks on "express lanes".

A ruling model that comprises such elitist authority and "elite preselection" is detrimental to the creation of citizens that are capable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Instead, it creates a nation that is overly reliant on the government, and ultimately leads the country down the twisted path of political apathy. The outcome of all these is the emergence of autocracy. As the government's inflated administrative power lies only in the hands of a select few, it would b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develop the mind of the people. In the end, when political literacy declines, the people would not be able to make the right political choices. Should political power wrongfully falls into the hands of "corrupt elite", it could only lead the nation into tumult and mayhem.

The above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an original article written by Leck Kim Koon in Chinese.

历史上的精英



黄宗羲

府选拔人才的努力息息相关。毕竟当时的社会精英“士”的培养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学校》篇之后最为关键的结论就是“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在健全的议会制度出现之前，帝制时期的中国也并不是完全简单的寡人独裁。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皇帝还是希望朝臣廷论，重要的人事布局需要廷推。古人也知道，很多时候，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公论的话，是无法取信于人的。只是黄宗羲《学校》篇中要求将非是在学校里讨

论，而不是庙堂之上，是有其深意和睿智的。

明朝覆灭之后，大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痛定思痛，将其反省与期望都写在《明夷待访录》之中。这本书的内容自然是作者带着一个明朝社会精英的经验与理想而建构的。但只要在阅读时注意到内容的特殊背景而专注于探究其精神的话，对读者来说还是会有所启发的。我最喜欢的一段话出自书中的《学校》篇。黄宗羲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当然，明朝人所讲的学校和我们今天的学校不同。现在的学校从学前启蒙教育开始，一般到大学或专科终结，而且注重的其实是知识和技术的传授。例如新加坡政府在2013财政年增加了教育预算，其中大专教育的增幅就几近两成。但是增加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高技能人才应付未来经济转型的需要。换言之，我们的学校是为了经济增长和个人生计服务的。明朝人则不同，学校和科举的关系密切，也就是说，学校和政

精英结构历代相异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精英结构是相异的。笼统地说，在先秦以前的精英中，世卿世禄，乃至天子和诸侯的爵位，是为各个贵族家族的长子嫡孙预留的。但其他子弟作为“士”，也同样享有参政的权力和机会。除此之外，这些贵族子弟也同时是各种知识的继承者，一般人并没有太多接受教育的机会。精英们对天下事的考虑最终都无法脱离他们所属的阶层背景和知识体系。所以即便是孔子，虽然思想中闪烁着智者的高尚人格，一生中追求着人性的完美，但政治上却始终以恢复和重构礼乐为念。

到了汉唐时期，在和平年代主导政治领域的主要是世家大族。在重视门阀的社会中，世家大族虽然同样把持着子弟参政的权力，但是



文：许齐雄

历史上的精英都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他们因为阶层和背景的不同，所代表的利益也各异。不是所有的精英都真诚地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操，即便是，他对于如何才是经世济民的最有效政策和最佳结果都会受限于他的时代。

和先秦贵族又有所差异。在先秦封建制度下，贵族权力的继承主要是通过合法的政统传承，也就是天子和诸侯的爵位的延续来呈现。而在汉唐时期的士族政治中，皇帝宝座的更替是一回事，世家大族持续把持参政权和延续其社会地位是另外一回事。在太平盛世时期，进入政府的精英主要还是世家大族的子弟，而这些大族彼此之间也普遍存在通婚的关系。虽然存在着各种荐举的政策，隋唐更见科举考试的开始，但始终都不是国家精英的主要来源。而在政权更替频密的动荡时代，任凭九鼎易主，只要不是和皇族的关系过于密切，世家大族在不同姓氏政权下依然是主要的政治力量。对于这个时期的精英，我们无法苛求他们考虑问题的视野能够不锁定在“国”和“家(族)”之上。

入宋以后，事情又有了本质上的改变。除了北宋初年开国功臣的子弟因为被礼遇而进入政府之外，有宋三百年间，参政的精英主要来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大唐王朝崩溃前后的百年动荡，基本上摧毁了原有的精英阶层。宋朝政府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然而我们经常将之浪漫化的十年寒窗苦读，金榜题名后娶公主、当驸马，从此飞黄腾达；或者以此光宗耀祖，慰藉年迈双亲，和糟糠之妻幸福美满地生活的大团圆结局等，其实都不是常态。要接受经典教育，而且达到可以层层过关斩将的水平，是需要投入大量的经济资源的。至少，该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承受放弃一个成年男子的劳动力和收入的压力。于是，越到后面，我们就越清楚地看到，许多通过

科举考试的士人其实都来自有着一定功名历史的士大夫家族。这些家族能为族内子弟提供教育的机会以及考试的费用。或者子侄之间在职业上进行分工，各别从事商业活动和应付科举，如此则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源都可以两全。长期下来，这些积累又反过来保证了家族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这些宋代以降的精英的参政权来自他们参与科举考试而获得的功名和身分，而不是简单地来自于属于某一个家族的血缘关系，所以其本质和汉唐时期的世家大族不同。与此同时，无论某一个时代的官僚体制多么臃肿，政府所需要的官员人数毕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加入到科举考试的竞争中的士大夫却有增无减。如此则进入到政府中的社会精英只会是其整个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其余的该怎么办呢？从南宋以后，我们看到了地方精英的兴起。好些社会精英只通过了初级或者中级的科举考试，始终没有入仕当官；也有一部分是退休或者离职的官员。这些人物在自己的家乡开始经营各种教育、慈善、公益事业。于是宗族、书院、社仓、乡约等组织便开始涌现。这些组织属于民间自发、自愿性事业，形成了国家机器以外的一个空间。当然，他们和现当代的公民社会也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无论如何，南宋以来的精英就开始扮演两种经营角色，即社会、国家的，以及地方的领导者。而这些角色往往又有重叠或交汇的地方。

精英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

然而，这个时候的精英，毕竟和现实政治权利的关系过于密切了。无论是

高坐庙堂之上运筹帷幄国事，或是身处江湖之中侃侃而谈乡里，都和与国家与地方社会中的权利息息相关。如此则所谓公论，也极有可能是某些利益集团或者地方大族主导舆论的结果，如何保障其公允无私呢？所以如果将天下的非是在天下读书人聚集的学校中讨论会不会比较理想呢？这些读书人一方面自然是当代的精英人物，另一方面这些尚未进入政府的精英和现实权利又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此则可以不受利益集团的操控或者一己之私的左右。进而才可能做到以天下之公为原则，以百姓之愿为圭臬。

只是，在民主制度成为不少人追求的目标的当代社会，精英的意见无法自然地获得任何合法性或者正当性。虽然民主制度有其缺点，但显然是在需要进行政权更替或者政策调整时，人们付出代价最小的制度。历史上的精英都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他们因为阶层和背景的不同，所代表的利益也各异。不是所有的精英都真诚地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操，即便是，他对于如何才是经世济民的最有效政策和最佳结果都会受限于他的时代。脱离政治权利而让精英公论天下非是，这不失为帝制时期最理想的诉求之一。只不过圣君贤相或者贤人政治始终无法保障真正的公论，进而完成民意的表达。但换一个角度思考，在国是日非，朝野离德，民心思变，社会浮躁的时代，学校里的精英群体作为一种学术良知的呈现，提供专业的意见，倒也不会是一件坏事。

作者现为国大中文系副教授

新马与中国商贸回忆点滴

与李金源一席谈

／文：王 远

与南洋大学第一届经济系毕业生、中国商会前会长、怡和轩会员李金源的一席谈，带出了新马商家与早期红色中国打交道的点点滴滴。这些商家在中国遭受禁运、外汇短缺、文革政治动荡和“摸石子过河”改革开放时期，锲而不舍，对两地的经济交往，作出各自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殖民地政府对新马商家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持消极态度。当时新马贸易公司如成丰（土产食品）、一丰（水仙牌罐头）、森林（五羊牌洋灰）、上海书局（图书文房用品等）、林信发（百货）、侨兴（纺织品）等，都得通过香港与大陆做生意。李金源说：“50年代与大陆做生意的新马商家，应该说都有强烈的中国情结。”1957年，中国对外贸易有了里程碑式的转变，那便是在广州举办的一年两度的交易会：中国出口商品春季交易会和秋季交易会。由于新马商家在本地开不了信用证，在颇长一段时期只能通过香港开证，本地森林公司在港设立的光华行就扮演过这样的角色。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在香港设立的华润公司，积极寻求渠道，与外商建立联系，扩大出口，以争取亟需的外汇。

经营五金行业凡数十年

60年代初，由于南洋大学毕业生加入就业市场，大大推进了新马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李金源本人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踏入中国五金代理行业。他原籍槟城，1960年南大毕业后，先到吉隆坡万茂公司当调研员，后加入在新加坡创立的五金行——金源五金私人有限公司。他说，“万茂和金源，都是一个名叫林楷的商人倡议成立的。那时，经营中国五金的商家，以个体为主，规模小。林楷集合一些主要商家，如森林、四海源、大伟（后易名经纬）、南成行等，组成联营公司，原本取名五金联营，因商

号惹人注目，就改用我的名字，没想到一用就是半个多世纪。”

金源是一间代理中国五金产品，为新马商家订货需求而成立的代理公司。后来按产品性质，又分设金工（小五金、工具）、光源（摄影器材等）、华源（印刷机械）、马来西亚嘉源（机床、马达）等不同公司，由一批南大毕业生主理，金源则集中于钢材方面。

他又说：“与金源有生意往来的公司，有些发展壮大，甚至在本地上市，它们大都囤存现货，卖给船厂、建筑公司等。金源作为代理公司，虽说股东组成屡有变化，但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至今。改革开放后，出口渠道多元化，当初相关的公司如金工、光源、东风、丰年、立新，相继关闭。尽管如此，它们都曾为中国外贸的发展尽过绵力。”

广州交易会的作用

金源与中国的生意往来，主要是通过在广州举办的春秋两季交易会。1957年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召开。此后广交会便成为中国一个著名品牌，吸引着包括新马商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商人。但是，对新马商家而言，通往中国的经商之道布满荆棘。开始阶段，香港，特别是华润公司，对两地贸易往来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李金源说，60年代末，他随马来西亚贸易代表团首次前往广州，参加交易会。“代表团由东姑拉沙里率领，有官员，有商家。每天都得向团里的政治部人员报告。后来，官员在楼上喝酒，就吩咐我们上去报告。因为是大马公民，后来多从吉隆坡出发，每次回到大马，还要接受政治部问话，到了新加坡，又得问话，话题从开幕到升旗礼，从对升旗礼的感想，到广交会期间见到什么等等。80年代他取得新加坡公民权后就不走大马那条路线了。”



他说，改革开放前交易会对新马商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时的广交会，可以说是与中国做贸易的唯一窗口，下单签约基本上都是在交易会上完成的”。为了方便商家赴华，新加坡做中国生意的商家于1970年成立“中国商品进出口商会”，1993年易名为“中国商会”，代会员及赴会商人申请请柬、

订机票、火车票、酒店等，后来更担负起全面的新中贸易促进工作。

他回忆新中贸易曾面对两度危机：其一是70年代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面临关闭之际，据说中国曾恫言切断两国贸易关系；其二是新加坡有意竖立一道无形的墙，两地贸易只能通过 Intraco 进

行，但因中国产品太多，难以实施，便规定商家必须向 Intraco 申请准字，批准后方可开信用证，Intraco收取半巴仙费用，这项规定实施几年后也已取消了。

尽管如此，李金源在与中国经商的路上，也不乏赏心悦事，如在改革开放之前，参加交易会的商家，主办方划分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m Guan: Early Tra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gapore and China

Lee Kum Guan was among the first batch of graduate from Nanyang University. Upon graduation, he joined the workforce, and throughout his career, ha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Malaya and China. A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had not viewed direct trading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favourable light, Malayan merchants had to resort to trading with China via Hong Kong. Malayan traders had to obtain the Letters of Credit, which they were

unable to locally, in Hong Kong. The Kwong Wah Company was specifically set up in Hong Kong by Malayan forestry companies for such a reason. Similarly, the Chinese had set up the China Resources Company in Hong Kong as a conduit to connect with foreign traders and to export Chinese goods to the world.

Lee Kum Guan worked in Kum Guan Metals Pte Ltd, a joint-venture enterprise spearheaded by Lim Kai. The company imported Chinese metal products in large quantities and distributed them to local shipyards, construction

companies, etc. The constant changes of its shareholders had not affected Kim Guan, the company weathered the test of time and hung on till today.

1957 marked the watershed year for China's trading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when it set up two trade fairs annually in Guangzhou for its export goods, one in Spring and another in Fall. The fairs were to facilitate the placing of orders and signing of contract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s Lee recalls, before China opened its door to the world, these trade fairs were

为一办、二办和三办，新加坡商家被列入一办，可住如东方宾馆这类五星级饭店，地位超越二办的日本，其商人只能住广州酒店一类四星级旅馆，等而下之的则是列为三办的港澳侨胞。又如，当初来广州参加交易会，一住就是一个月，参展之余还可以欣赏广交会提供的娱兴节目，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

前辈林楷是富商郭鹤年“好伙伴”

在谈话过程中，李金源一再强调林楷的角色。他说：林楷是新加坡早期著名建筑商林路的长孙，他的叔叔是遭日军杀害的林谋盛烈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林楷在中国学习美术。上海失守前夕，林楷跟随一大批文化人撤退到重庆。战后，他往返新加坡与香港之间，与华润公司过从甚密，为新马商家通向红色中国，尽心尽力。除了在新马两地推动商家合组公司外，如果联、茶联、金源、金工、光源、丰年、立成、立新工艺品公司、百货（从友谊园演变为友谊百货）外，林楷也是最早结识马来西亚富商郭鹤年、并引荐他投资中国的重要人物。

据李金源透露，60年代初，林楷创办立成公司，代理中国砂糖的出口，与

代理印度糖的郭鹤年有过生意上的碰撞。后来，林楷与郭鹤年达成默契，两人此后一直保持密切关系。

1973年4月，自言受母亲影响“永不忘本”的郭鹤年，为缺糖、缺外汇的中国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当时中国迫切需要30万吨白糖，但此事又不能张扬，否则糖价必会飙升，因此须通过可靠的国外友人代办，他们选中了郭鹤年。满怀赤诚的他，把自己的户口冻结起来，专注地、无私地挑起这个绝对机密的重任。他派人到巴西不动声色地签订大量购货合约，自己则前往日内瓦出席一项国际糖业大会，以转移业界的视线。他的机警和努力，终于为中国低价买到30万吨白糖和白糖期货。等到信息公开出来，白糖价格猛涨，他一路脱售手中期货，为中国赚取了约450万美元，存入中国银行伦敦分行。郭鹤年的高风亮节，不仅为新马商家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也为他个人后来在中国大展拳脚奠定良好的开端。

通过李金源的介绍，我们还知道了被郭鹤年称为“好伙伴”的林楷，于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争取到郭鹤年在北京投下巨款，打造一座位于北京东三环美仑美奂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简称国贸中心）。作出投资决定前，郭鹤年从林楷那里获知这个项目只有美国大通银行和日本政府的兴业银行感兴趣，他受了很大的刺激，说道：“今天的中国还要依靠这些国家来帮吗？楷哥，我们要争气，不要给外面的人看不起我们华人。”就这样，一座耗资5.1亿美元，建筑面积达42万平方米的国贸中心，终于在1990年8月30日落成开业，连1989年六四事件在西方世界引起的轩然大波，也阻挡不了郭鹤年的决心。新马商家通往红色中国之路，竟是如此一往无前，又是如此惊心动魄！

这是默默耕耘的李金源和许多经营中国货的新马商家未曾料到的。今天，一切都改观了。聚沙成塔，岂能忘却不求闻达的“楷哥”和谦虚低调的“糖王”？

李金源最后说，林楷于90年代在新加坡逝世，他的好友郭鹤年专程从香港赶至丧居吊唁，与加拿大奔丧而来的林楷女儿抱头痛哭。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practically the only windows for Malayan traders to do business with China. In 1970, to better promote commerce with China, a group of merchants set up the Singapore-China Import and Export Business Association. The organisation was renamed Singapore-China Business Association in 1993 and was solely in charge of promoting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ies.

The Singapore-China commerce was not exactly smooth-sailing. Lee particularly recalls two major crisis. In the Seventies, when the Singapore branch of the Bank of China was in danger of being closed down by the Singapore goverment, China had reportedly threatened

to sever trade ties with Singapore. The second setback came when Singapore erected an invisible wall which required the trading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be conducted over Intraco. China's inventory, however, proved much too vast for this system to work.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then specified that the merchants had to apply for permits with Intraco and that no Letter of Credit could be issued without prior government consent. The cumbersome rule was phased out a few years la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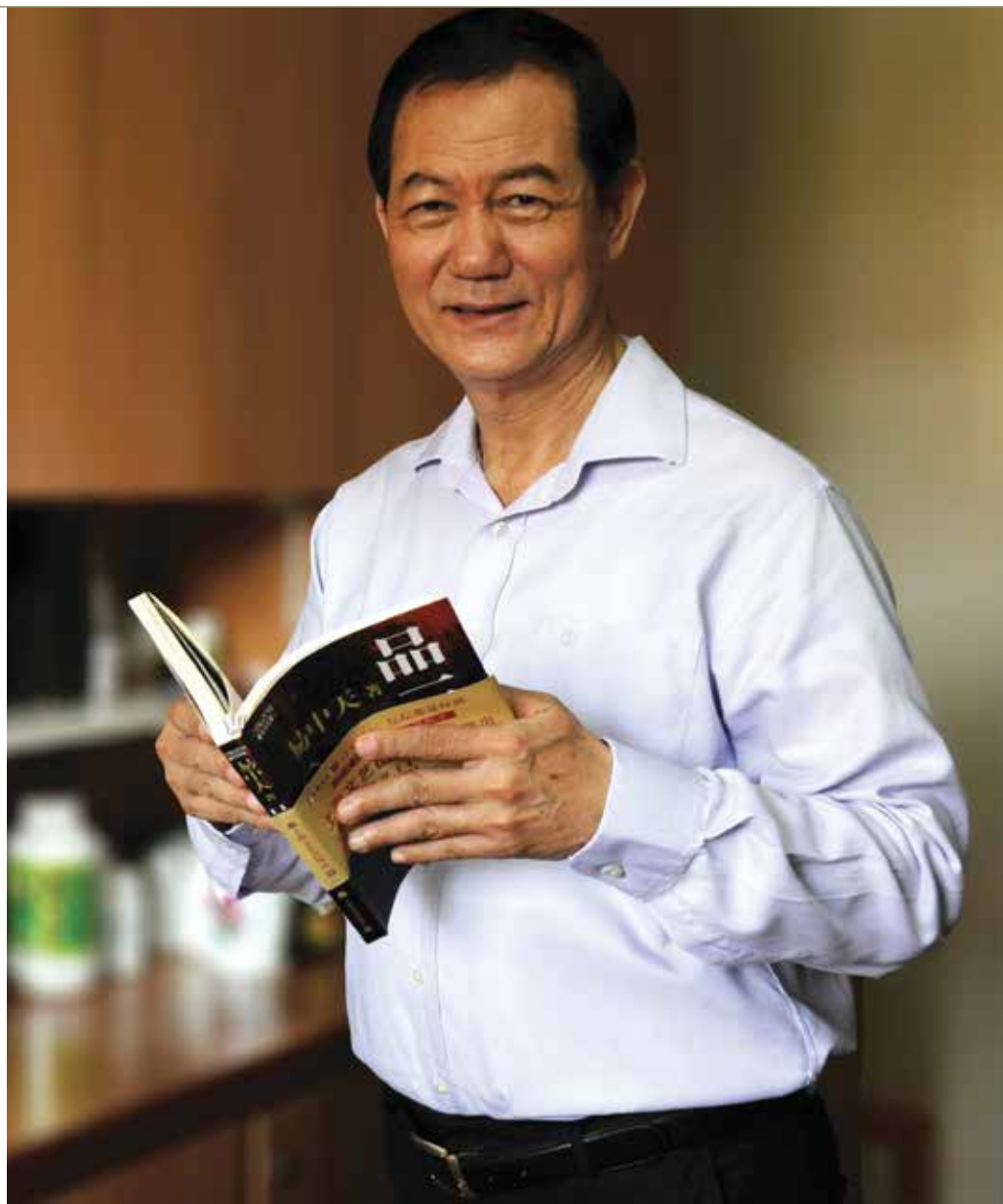
Lee Kum Guan credits Lim Kai for playing the vital role in the Singapore-China trade relations. Lim was the eldest grandson of Lim

Loh, an eminent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pioneer in Singapore. His uncle was Lim Bo Sheng, a resistance fighter and a World War II hero who had died at the hands of the Japanese Army. In the early days, Lim had made numerous trips betwee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to foster close ties with the China Resources Company. He had dedicated himself to opening doors to China for Malayan merchants. Lim Kai was also one of the earliest to have befriended Malaysian tycoon Robert Kuok Hock Nien and was pivotal in recommending Kuok to invest in China.

The above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an original article written by Wang Yuan in Chinese.

从风浪里走来

陈立发谈科艺发展经验



文：邹文学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著名消炎、消肿、解毒的名药片仔癀疗效显著，在新加坡及印尼市场很受欢迎，药行经常卖到断货。于是，港澳便有缺德商家，不择手段生产假货以牟取暴利。

科艺私人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立发回忆说，当年不乏有人上门推销伪劣假冒的片仔癀和六神丸。大吹销售正庄的片子癀只有2%的蝇头小利，而充货利润高达100%以上，“做生意就是要懂得赚快钱才能飞黄腾达，所谓马无 野草不肥，你们忠忠直直、成为天字第一号傻瓜！”

“不义之财足以丧德毁誉”，陈立发冷静地告诉对方：“每家企业都有自己旗帜鲜明的经商宗旨，片子癀是治疗危重病人的救命圣药，卖充货，人命关天，再好赚的钱我们也不干。”

陈先生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他的人生信念。他也为科艺人制定了经商之道的训约：“诚以待人，严以律己，努力开拓，稳健踏实”。他补充说：“我始终认为做人做生意、诚信和始终不渝是核心价值观。我们除了专注于自己的业务，也要关注市场变化的脉搏，更要坚持商道，企业才能树立正面的口碑和拥有持续的发展空间。”

置之死地而后生

陈立发离开华中时，正值社会处在多事之秋的历史阶段，前途渺茫。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文具公司跑外勤，这家公司同时兼代理一些中国成药，他除了走访学校，还需要向各中药行推销中药，他也由此与中药行业结下不解之缘。

人毕竟对社会要有承担和贡献，什么时候能潇洒卸下重担，恐怕还需有机缘和更高的智慧，盼望高人来指点迷津。

科艺是60年代末由六七名志同道合的学友合创的小公司，主要售卖医用药水瓶、医用敷料、医疗针灸器材，偶尔也兼售一些中成药及保健产品。陈立发知道有一名学长准备退股并提议他入股，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就毅然地把股份顶下来。从此成为科艺的一员，一晃眼走过了科艺波涛起伏四十年的艰巨发展历程。

他指出，创业之初，赤手空拳，一来没有靠山背景、二来缺乏经商经验，三来资金不足，时刻捉襟见肘，能否越过创业求存初期的各种急流险滩，实在是个未知数。他说，当时公司销售的产品都是跟本地批发商进货，再转送到中西诊所或中药行，赚取2%至5%的蝇头小利。只有卖得多，周转得快，才有足够收入来支付我和两名职员的薪金与租金的开销。

“那时科艺刚从巴耶利峇的林德武路搬迁到芽笼24巷，远在林厝港的药房客户来电，急用两卷脱脂药棉，我二话不说骑了摩托车从芽笼就飞车送去；

杨厝港的药房急着要一箱药水瓶，虽然价值不高又是下班后的时间，我还是马不离蹄地赶送。”他说，公司初创时基础薄弱，如何争取机会拉近客户距离，建立善缘，以确保企业的生存空间，对他来说那是一道现实的经商生死门。

“做业务一定要从实际与‘三度思维服务’着手，第一是服务的速度，第二是服务的细度，第三是工作态度。三度思维做到位，你已经比行业的竞争对手占尽优势，客户会从此记住你的存在和价值。”陈先生说，华校生当年所受的煎熬促使他对创业求存有强烈的干劲。他自己就以身作则，常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和拼搏精神，落实企业的发展。

中医草药救命

陈立发说，他能全身心投入科艺的业务，少年时期的经历和体验让其毕生难忘，是民间祖传草药的神奇功效引领他步入中药领域的殿堂。

在六十年代初期，陈立发经常带着两条忠实的爱犬，在沼泽地里捕捉螃蟹和四脚蛇。有一天，爱犬突然和剧毒的眼镜蛇短兵相接，他意识到出事了。果然，“黑嘴”足部迅速肿胀，身体不停抽搐，口吐白沫瘫倒在地。陈立发抱着它往家中奔跑，想起那瓶浸泡已久的穿心莲药酒。他拨开爱犬的嘴，徐徐地往它口中灌入半瓶穿心莲药酒，还在它的伤口周围淋上药酒。下半夜，黑嘴的眼睛已经可以转动，穿心莲的神奇功效已让它从鬼门关里走回来。

他指出，千百年来，祖辈从劳动生活中实践，验证与累积了朴实天然植物药材治病救人的奥秘。民间草药的神奇功效，永远让他虔诚地敬重和铭记。

紧跟时代步伐求商机

8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进展，以及当年中成药价廉物美，市场需求显著增加，科艺瞄准这个商机，直接与中国的口岸公司建立初步

The Life and Art of TCM Science

Science Arts co-founder Tan Leek Huak takes us through the four decades of the local TCM powerhouse

The Sixties was a tumultuous time for Singapore. When Tan Leek Huak left Hwa Chong Secondary School, the future was not looking too bright for him.

Tan got his first job as an errand man for a company that distribut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Small as it may seem, the job got him a head start in the trade, which were to become a lifelong career. In the Seventies,

seven or eight of his secondary classmates started a company, Science Arts company Ltd, to trade in a few Chinese proprietary medicines and pharmaceutical grade hygiene products. Opportunity came when one of the co-founders withdrew. Tan bought over his shares and officially became a partner. Like all start-up, there was not much of a capital, business network, and market to speak of.

What they did not lack was sheer grit and hard work. Tan, though not in the founding team, still devoted himself wholeheartedly to the start up due, in part, to his passion and faith in TCM.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the Eighties gave Science Arts its first major breakthrough, when they obtained the permits to import three Chinese proprietary medicines which

的业务往来。科艺直接进口产品的零突破，是获准进口吉林的参茸延龄片和脑灵素等产品。九十年代初期，他还亲自到广州参加春、秋两季的交易会，直接向口岸订货，建立起与中国厂家的联系。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科艺一步一个脚印，从二盘商逐渐提升为进口批发商，再批发给本地药店，更稳固地掌握公司业务的发展前景。他总结说，科艺如果不掌握机遇直接进口产品，最多只能原地踏步甚至很快就被淹没于竞争的大风浪里。此外，如果没有早期默默耕耘、十数年如一日的建立起良好的客户基础，即使直接进口产品却只依靠别人发行，显然也是像无根的浮萍而凶多吉少，不可能在市场上建立起自己牢固的商业网络和人脉。

狭路相逢勇者胜

陈立发强调，科艺一贯坚持产品的质量，一切都力求尽善尽美，为达到规定目标，不计成本，精益求精。

科艺另一重大的商业举措是在2004年与具有340多年历史的中国药界泰斗北京同仁堂，在新加坡成立合资公司，

实现双边业务拓展的策略，先后开创了五个中医专科门诊中心，其中三家中医专科中心设立在本地的医院。

为了推动中医药的长足发展，科艺医疗保健中心每月举办中医药普及教育讲座，每月也举行中医义诊。公司也于2008年创立“中医药研修学院”，目前主要是在中小学校与理工学院，举行各种认识中医学的文化教育推广活动。他说，自己还与多名企业家组成老板联谊会，定期在科艺礼堂召开讲座与研讨会。中小企业的老板们，能把管理经验和开拓市场的心得与更多人分享，也有助于更多企业持续取得增长，对新加坡经济实有裨益。

“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陈立发指出，当公司在发展的阶段中遇到老化或瓶颈，就必须集思广益，敢于推展脑力激荡和创新思维，注入新血，制定出一条新的生命之路。

积极培养接班人

谈到接班人，陈立发自谦地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我才疏学浅，经过四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以及团队勤奋拼

搏之后，公司已经建立了扎实的基础和塑造了企业知名度。但是，为了科艺的发展前程，我抱着终身学习精神提升自己，去年修读了清华大学高级总裁班的课程，目前还在继续攻读《资治通鉴》的课程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和领导力。”

他说，公司三位股东都已面对耳顺和不逾己之年，因此公司本着任人唯贤的定位标准，希望能不断培养和吸引人才，寻找能到能干可靠的接班人。

他透露年满百岁的母亲看到他业务繁忙，常劝他工作不要那么操劳，应该给自己留点时间安享清福。

陈立发说，科艺四十多年的努力耕耘，注入的心血和劳动结晶犹如他们的第二个生命，旗下的众多职员与数百位风雨同舟的客户，亟待优秀团队接力传承。

他总结说，人毕竟对社会要有承担和贡献，什么时候能潇洒卸下重担，恐怕还需有机缘和更高的智慧，盼望高人来指点迷津。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included Naolingsu, a medicine which promotes the healthy function of the brain. By the end of the Eighties, Tan would personally fly to Guangzhou to attend the annual Spring and Fall trade fairs and directly place their orders with the Chinese. Upon establishing close ties with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Science Arts business was on track and began to flourish. Had Science Arts not seized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to directly import from China, Tan believes the company would have remained where it was and be swiftly swept away by fierce competition.

From the Nineties to the new millennium, Science Arts continued to grow and evolve

in two major ways. It first established a joint venture with Beijing's 300 year-old TCM pharmacy Tong Ren Tang and set up TCM clinics in three Singapore government hospital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CM with modern health science. It subsequently gained the licence to develop and manufacture its own Chinese proprietary medicines. With hundreds of medicines under its name, Science Arts has steadfastly built a brand of trust and quality.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TCM, as well as to promote the TCM culture, Science Arts started its own TCM College at its headquarters. The college conducts and offers the public a wide variety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outreach programmes in the field of TCM with the strategic long-term aim of preserving and passing down the heritage and wisdo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thod of healing and wellness.

Tan credits Science Arts' ability to stay ahead of the increasingly stiff competitions to the management's lack of complacency. The company focuses on long-term results. Most importantly, its success lies in its fearlessness to take some risks and break out from its existing business model.

The above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an original article written by Zou Wen Xue in Chinese.

热心公益的卓顺发

／文：周 弘 采访罗敏娜控股主席

对很多人来说，卓顺发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年轻时候因家境贫寒而被迫辍学，21岁开始小本经营家具店，后来发展成为上市挂牌的罗敏娜家具公司。在事业进入顶峰时，他急流勇退，把全盘生意卖出去，投身公益。他的人生经历，在重利轻义的现实社会，不失为一则传奇。

对于这位年方壮年的怡和轩会友，带着些许的好奇与兴奋，我们造访了他在武吉巴督23街的办事处。

不一般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特别的办公室。

映入眼帘的是大小不同，造型各异的佛像，分布在课室般大的房间里，要不是靠窗边安置着他的办公桌，会叫人以为是步入一所小型的佛教博物馆。

寒暄过后，卓顺发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引领我们参观，还在神龛前上香。然后打开手机里的摄像，饶有兴致的述说他生命里见证的一些神迹。

今天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前一阵子他会见台湾证严上人时，就把他收藏多年的一尊2.2米高的宋代的木雕观音佛像，赠给了慈济基金会。他指着身边诸多的佛像，不无自豪地说：“这里很多是古董。”还带领我们看玻璃橱窗里一座唐代的佛祖铜塑，说：“但只是暂时收藏在我这里，遇上有缘人，我都会结善缘赠送出去。”

然而，一开始他却并非笃信佛教。他说，从小他跟着父母拜神，和许多新加坡人一样信仰道教。后来他的家具店开在罗敏娜教堂对面，天天面对慈悲的圣母，跟着许多人到教堂祈

祷，那时他成为一位天主教徒，店名也称为“罗敏娜”。机缘巧合，有一天一位神父请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当主宾，那天很多人在聚会上洗礼，他也跟着受洗，成了基督徒。他深信宗教都是引人向上向善，倡导感恩慈悲之心。

佛教的因缘却在十年前，狮子会的朋友向他订一张特大的床褥，一问之下，才知道是佛光山星云大师来了，他也就不收钱与大师结缘。再后来他和一位相识多年的善知识张仰兴先生一起主办“企业家净化人生交流座谈会”听星云大师讲经说法，觉得师父说的很有道理，从那时起，慢慢接近法师听佛法，在行佛中，领悟人生，深入佛法，成了虔诚的佛教徒。

回顾这段心路历程，他特别提起他的母亲。他认为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当我赚到钱时，我想搬离政府组屋，搬到洋楼或公寓。但我妈妈怎么都不去，她说我们这里有四户人，妈妈，哥哥和妹妹，她要陪哥哥妹妹在这里住。所以，为了陪妈妈，我也不搬，在组屋住了蛮久。妈妈六十多岁往生，使我觉得人生无常。我也很感恩，想报答，想做一些他人不想做的事情，他人退我进，有意义的事情。我告诉自己，如果我赚到一百万，要拿出一半与别人分享。”

慈善，是一种责任

在他的办公室里，还随处可见他从事社区服务以及他受表扬和领奖时的留影，或许这些就浓缩了他大半的人生。社会服务不落人后，国内以及国外的公益事业，经常可见到卓顺发活跃的身影。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发生汶川特大地震，他一获悉，立即发起让爱川流不息的赈灾活动，并很快在本地掀起浪潮，为地震孤

慈善，是一种责任，一种品格，一种价值观，一种文化修养。慈善作为一种思想观念、道德行为和社会事业，是人类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更是人类传递超越大爱的至善之举。



儿提供福利援助和教育补助筹款。在举行“温情无国界，让爱川流不息”的电视慈善义演中，短时间就筹到一千多万元善款。为了妥善管理这笔善款，新加坡迅速成立工作小组，卓顺发担任副主席。由新方组织工作小组建设了四所中新友谊小学，与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援建了另外三所小学。为了展开灾后重建，在此后的4年里，他连续多次回访灾区，看望灾区的孩子们。他的善举，让中新友谊之花，开放地更加灿烂。

我国的善济医社，成立于1901年，是由一批善心人士自发筹组的施医赠药的民间社团。经历了百年的沧桑巨变，至今依然以仁心仁术造福社会。从2008年开始至今，卓顺发接连担任多届董事会主席，与其他董事们一起，接下先贤创下的伟业，并将其发扬光大。在主席献词中，他动情地说：“慈善，是一种责任，一种品格，一种价值观，一种文化修养。慈善作为一种思想观念、道德行为和社会事业，是人类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更是人类传递超越大

爱的至善之举。”又说“多年来热心参与公益事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扶危济困，造福人类，广结善缘，在自己的经营过程中实现感恩理想。”

在从事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他也发现我国由于多年来经济蓬勃发展，造成物价高涨，使到许多平民跟不上。因此，他认为政府现在需要改变政策，把那些与民生相关的企业，影响人民日常生活的部分收归国营，不要私营，由此能把利润，把经济成果更多地与人民分享。

人生领悟尽在《感恩》中

卓顺发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壮年之期淡出商界，追求生命更大的意义。今天，他领导的罗敏娜基金，把主力放在慈善工作及投资项目上。

而他最关注的，始终在于慈善与社区服务。在采访过程中，他让我们看一份记录，就在今年初短短三个月里，他以公司和个人的名誉，已经捐出了20万元给各个社区公益组织。

用他的话说：“我辛苦赚来的钱，只有三分之一会留给孩子，三分之一捐给社会，另外一份留给自己。如果社会有需要，我也会拿出来。取之社会，用于社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众乐乐不

如天下乐，以完成捐出一半财产作慈善的宏愿。”

卓顺发显然是位好学的人，在谈话过程他滔滔不绝，举凡处世之道，人生哲理，他总是妙语如珠，很难相信他是个没念完初中三的人。最近他更出版了一本以《感恩》为题的书，收集了他多年来的肺腑之言，文字朴实、简洁，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方方面面的观察与感悟，兹摘其中一小则：

“今天早上赶约，在路途中，下着大雨，路上大堵车，我在车里听着音乐缓慢行驶中，心中埋怨地想着，又堵车了，又要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真无奈。忽然间，望着路上有很多很多来自

马来西亚骑着单车的劳工，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雨中行驶，赶着上班，这时候我心里，一瞬间，感到自己很幸运很幸福，心里很感恩，心想他们以巨大的付出换取微薄的收入，无怨无悔，养家糊口，为家庭奔波，付出，贡献，祝福他们一生平安，吉祥如意。”

话题转到怡和轩，他认为怡和轩有很大潜力，可以做很多慈善。不过他也了解，怡和轩会员多数有自己岗位，在不同的岗位贡献公益事业，怡和轩应该做的，是弘扬先贤乐善好施的精神，奉劝世人多行善，他衷心支持怡和轩目前的方向。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Devoted To Giving

For a man who gives so much back to society, Toh Soon Huat did not had much to begin with. He dropped out of Hwa Chong Secondary School at secondary three. In order to eke out a living for his family, he was working odd jobs in a farm and in a cinema. At some point, he was even a construction worker. At the age of 23, he started his own furniture shop, "Rong Chun Fa" with \$30,000. The modest shop grew to become Novena Holdings, and by the new millennium, the household furniture brand's turnover has reached over 10 million dollars. In 2007, Toh sold his furniture business to go into investment full time, as well as to dedicate his time to charity.

Today, Toh is a devout Buddhist. Not unlike his career path, his religious journey has evolved over time. He grew up praying to Taoist gods with his family. When he opened his shop at Novena, across from the Novena Church, having seen the benevolent face of the Holy Mother day in day out, he eventually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He was introduced to Buddhism about ten years ago, when he was invited with a group of business associates to a talk by the Buddhist Master Hsing Yun. Taken with the Master's teaching,

he began to seek out the meaning of life through Buddhism and eventually became a devout follower.

Toh's mother had exerted an enduring influence on his life. She was a great mother gone too soon. Toh was struck by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life when she had passed away at sixty something. He was grateful to her for raising him and was inspired by her to give back to the world. He told himself: If I could make a million dollar, I would share half of it with the world. And he did.

Toh has found solace in his faith, and his calling in life. At the height of his career, he bowed out of the business world, and dedicated himself to charity, serving the public and spreading love. He has taken on various roles in community services, and remains active in charitable works within and outside of Singapore.

When the deadly earthquake ravaged Sichuan on May 12, 2008, Toh helped put together a disaster relief event which ultimately raised more than 10.2 million dollars through the televised Sichuan Earthquake Charity Show.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promptly set up a working committee to properly safeguard

and manage the fund. Toh was appointed its deputy chairman. With the fund, the committee built four primary schools, and three more through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ichuan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His work did not end there. Upon completion of the schools, he has gone back numerous times to visit the children and ensure their welfare.

Sian Chay Medical Institu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01 to provide free medical consultations and treatments to those in need. Since 2008, Toh has served as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With his equally dedicated board members and committee, he took on the baton passed down by its founding fathers and further its philanthropic cause, serving those in need.

"Charity is a socia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It is a personal belief. It is a sign of a society's graciousness and refinement. Taken as a value, ethics and social undertaking, charitable acts are the products of mankind's personal growth and social progression. It is also the act of ultimate compassion, spreading Universal Love of mankind," Toh Choon avows.

The above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an original article written by Zhou Hong in Chinese.

从“夕阳工业” 到“绿色商机”

访友联钢铁控股董事经理洪友成



环保已成今日一个与大众民生、国家发展休戚相关的社会课题。为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们采取了各种行动。比如：地球一小时、低碳生活、绿色食品、资源的再循环……等等。无论国家、个人或企业，出于对共同家园——地球的呵护，都应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破铜烂铁”来出售，再重新循环使用时，他们其实也没想到环保这样崇高的使命，而单纯就是为了改善生活。

“当然，入这行多少受爸爸的影响，”接受采访时，作为友联钢铁控股董事经理的洪友成回忆，“我爸爸当年就在亲戚经营的一家钢铁厂打工。”

创业只为改善生活，填饱肚子

30年前，1984年的杨厝港，在一条叫“无线电路”的乡村里，当洪家几兄弟决定合伙收集

洪友成是传统的华校生，曾在实明工艺中学完成两年的高级中学课程。服完兵役出来后不久，就面对解决平时的一日三餐，以及将来的生活之路。



／ 文：洪天发

外劳收紧,企业会面对巨大挑战。至于提升或转型,谈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一直想到自动化,也逐步在努力,可是很多事情是不可能一蹴而得的。

“我们家有兄弟姐妹7人,4男3女,是当时村子里最穷的一两家人。可能小时候穷得发慌,不敢想有一日会有车驾,能当老板,那时只想怎样填饱肚子。”

他们向亲友借了几千元,加上母亲的一点积蓄,以少过一万元资金,设立有利成五金(Yew Lee Seng Hardware),跨出了艰辛创业的第一步。

“那时我们连厂房也没有,收来的废铁就置放在甘榜住家旁的空地。”说到这里,洪先生不禁莞尔:“在今天绝对不可能。”

当时正值本地建筑业蓬勃发展,对各种钢材的需求量大,几兄弟勤做苦拼,亲力亲为,使业务慢慢取得进展。在累积工作经验的同时,他们也逐渐找到自己的定位,转而成为钢铁材料供应商,为公司开拓日后的业务奠下基础。

“破铜烂铁” 焕发光彩

今天的友联钢铁集团,下设有五个子公司。核心业务包括收集、再循环和销售各级有色金属(或非铁金属)材料,以及买卖崭新与二手不锈钢圈、不锈钢盘、铜质电缆等。配合厂内装置的先进机器,公司能供应钢铁,并提供有色金属及废铁给熔炼厂,重新制作成产品。

拥有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经验,友联钢铁确立了自己在新加坡金属废料行业中的领先地位。2012年,通过收购福安金属脚手架有限公司,公司的钢铁事业,又拓展了新的服务领域。

进入新世纪,业务日趋成熟的友联钢铁集团及属下的子公司,分别获得多个奖项,2003和2004年获得50企业奖及增长速度最快50认证企业;在2004年获得排名居前的新加坡500家中小型企

业;此外也包括ISO 14001: 2004、ISO 9001: 2008; 2009年被评为新加坡1000年销售营业额增长优秀奖; 2010年获得了新加坡国际100强公司的地位。

大概许多人都没想到,这样一个被叫做“加隆牛尼”的,收买“破铜烂铁”的生意,竟能走出如此的辉煌!一度曾被人们视为“夕阳工业”,眼下却焕发出无限的“绿色商机”。

里程碑: 挂牌上市

2005年8月15日,对洪友成兄弟们来说,是一个具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友联钢铁集团以友联钢铁控股(Union Steel Holdings)为名,在新加坡股市交易所第一级股市挂牌上市。身为控股公司董事经理的洪友成先生透露,其实更早之前他们就有上市的打算,当然首先是要把公司做大做

Iron Men

It is a success story with a humble beginning. Ang Yu Seng was a typical Chinese-educated Singaporean. His highest education was a two-year advanced secondary course at the former Upper Aljunied Technical School. Further studies was a luxury he could not afford. After completing his national service, he had to make a living. Around 1984, he and his brothers pooled together a few thousand dollars and started their own business buying and trading scrap metals.

It was the boom time for local construction

trade, and demands for all kinds of steels were escalating. With hard work and will of steel, the very hands-on brothers slowly grew their modest business. As the brothers steadily accumulated industry experiences, they gradually found their footing and rose through the ranks to become steel suppliers, laying down the foundation which would ultimately become Union Steel Holdings Limited.

The Union Steel group today is made up of five subsidiary companies whose core businesses include recovering, recycling and trading of various grades of nonferrous metals as well as the buying and trading of new and

second-hand stainless steel rings, plates, copper cables, etc. Their advanced in-house machineries enable them to process both recovered ferrous metals like steels, as well as nonferrous metals and scrap metals in a high level before they are sold to melting mills to be recycled into useful metal products.

With more than a quarter of century of experience, Union Steel has secured its leadership position in the metal and scrap business in Singapore. The acquisition of Hock Ann Metal Scaffolding Pte Ltd in 2012 has further widened the company's scope within the industry.

强,同时也要使家族事业能持续发展。他希望公司的转型,能像公司的经营一样“ever green”。

虽然当时市场情绪低迷,许多新股首日交易便跌破发售价,致使一些有意上市的公司打退堂鼓。而友联钢铁控股却逆流而上,选择这时上市,洪友成表示,除了对自己的公司有信心,他也觉得做生意应该把眼光放远一些。就像他们从事的钢铁再循环一样,市场的走势也总是在转变,只要公司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就不必过于担心目前的走势,而应着眼于未来的发展。

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崛起,高速发展的经济对金属的需求与日俱增,而金属属于非再生的资源,因此,未来的经济将非常注重再循环。

今天集团有员工百余人,营业额包括出口业务,直接销往中国、印度、日本和东南亚等地。

“市场不大” “前途乐观”

尽管当年从事这个处理金属废料再循环的行业,纯属生活驱使,但积30余年的经验,洪友成先生对再循环事业有了另一番的认识。他说:“不论是

什么金属,几乎都可以再循环。如果人人都积极参与金属的再循环,这将对环境有很大的帮助。”

“很多人都听过‘再循环’这个词,但对于具体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并不是很清楚。就金属废料而言,我们将它们收集起来,剪碎压缩成块后,再运往海外的钢铁工厂熔化和加以炼制,最后做成成品。这样的过程可以一再重复。在保护环境的同时,钢铁的质量仍能保持不变。”

有资料显示,新加坡的人均固体废料数量居亚细安之冠,每年制造超过五百万吨固体垃圾,其中接近五分之一是金属废料。友联钢铁集团在大士的工厂的设备,就主要用于处理这些废料金属。

洪先生坦言,对再循环行业来说,产品的价格是个大挑战,如果出来的价格比用原料生产的还高,那就失去吸引力。因此,工艺技术是一个关键。他本人二、三十年前曾到日本考察,发觉生产流程都差不多,差别在于管理。

与欧美国家相比,新加坡人对于在循环的概念及认识还没那么成熟。只能说还处于萌芽阶段,甚至连基本的垃圾

分类都未能贯彻。因此,洪先生对每年举行的清洁与绿化周寄予厚望,希望向学生们灌输再循环对于环保的重要性,从小培养再循环的良好习惯。

谈到对本国这一行业的展望,大家说“前途乐观”,他加上一句“市场不大”,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谈到最近的热点话题,洪先生说,“外劳收紧,企业会面对巨大挑战。至于提升或转型,谈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一直想到自动化,也逐步在努力,可是很多事情是不可能一蹴而得的。”

洪先生有三个孩子,他并不要求孩子将来一定要继承自己的事业,主要看他们的才干和能力。他常常规劝和鼓励孩子:“努力不一定就带来成功,但不努力就没有成功的机会。”

作为一个上市的企业,友联钢铁集团也没有忽略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在残疾人协会、儿童癌症基金会、广惠肇医院、新加坡心理卫生协会……等多个慈善团体的筹款活动中,贡献了自己力量。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The new millennium brings Union Steel accolades and greater recognitions. It was awarded the Enterprise 50 Award organised by The Business Times and Accenture, and accredited as one of the 50 fastest growing enterprises in Singapore. In 2004, it achieved top ranking in the annual Singapore 500 SME Award. In 2009, Union Steel was presented the Singapore 1000 Award for its excellence in sales turnover growth. In 2010, it achieved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100 Company status. Such glowing achievements are no small feat for a few brothers who started out collecting and selling scrap metals.

Union Steel Holding Limited was listed on the Singapore Stock Exchange Mainboard on August 15, 2005. The group hires hundreds of workers, and deals in export business, shipping to direct buyers from China, India, Japan and all over Southeast Asia.

For a recycling business to survive, Mr Ang says that the pricing remains as a colossal challenge. His trade would lose its appeal if the price of manufacturing with new raw materials works out to be lower than using recycled ones. Technological skills and innovations therefore become most crucial for recycling business's survival. On a study

trip to Japan some twenty to thirty years ago, Ang had learned that the manufacturing procedures are generally similar within the industry. It is good management that truly sets the leaders apart from the pack.

"Tighter foreign labour rules pose greater challenge for enterprises like ours.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is often easier said than done. We have always strived for production automation, but such vision does not happen overnight. We are slowly but surely working towards that goal," Ang asserts.

The above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an original article written by Ang Tian Huat in Chinese.



议院内外

人口政策大辩论 牵动国人神经

／文：董南施



2013年5月1日摄于芳林公园 / 杨伟汉摄

1月26日榜鹅东部补选过后，李显龙总理坦承“政府缺乏全视野远见，2005年为赶搭经济快车大量欢迎外来人口，以致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人口与经济发展步伐，引发民怨。”

为避免历史重演，政府于1月29日公布《人口白皮书》，全面提出未来的人口政策规划。白皮书中说：到了2030年，新加坡总人口预计达到690万，公民人口

介于360万至380万，永久居民约50万至60万，其余为非居民。白皮书也预计，公民生育率要从低迷的1.2提升到1.5，长期的目标为2.1。每年引进1万5千至2万5千新公民，外籍员工的增长率保持在1%至2%，经济增长从目前至2020年保持3%到4%，但从2030年减少至2%到3%。

主管人口事务的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和六名部长一起会见记者，强调白皮书是由总理公署国家人口及人才署连同多个政府部门筹备了超过一年，收集了近2500个公众反馈后才拟定的，而2030年估计的650万至690万人口，是政府经过“层层叠叠的考量估算所得。”

岂料白皮书一公布，各界哗然。在第一时间接受媒体访问的公众人士，有六成以上表示无法接受把人口增加至690万。国会开始辩论前，相关的部长与总理立即相继声明：690万不是“人口预报或目标”，而是“最糟的情况”，是人口增长的上限。经过几天辩论后，国会最后通过的动议除去了“人口政策”的字眼，并写明2020年后的人口预测，只是为协助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并非人口增长目标，而政府将于2020年再做中期检讨。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接受修改后的动议，并表示它与政府的用意一致，有助明确政府的目标，并向新加坡人保证，有关人口政策的对话将持续进行。

事情一来一往，令人困惑。有人可以一厢情愿，认为政府开诚布公，顺从民意，及时调整步伐。也有人可以合理质疑，到底白皮书是否真的经过政府高层“层层叠叠的考量估算”才拟定，还是公务人员闭门造车的结果。诚然，正如执政党议员潘丽萍所说，“政府本来应该先征询公众人士对白皮书的意见，才把它公布，这是政治新常态下与民沟

通不足的尴尬。如果不是连荣华议员建议对白皮书的动议做出修改，一些人民行动党议员将会觉得难以对这项动议表示支持。”

一个家园VS一座酒店

国会辩论过程，国民融合的问题受到关注。

工人党开宗明义反对白皮书，并认为2030年的人口可以控制在590万人。秘书长刘程强认为，每一年引进跟新生儿近乎等量的新移民填补公民生育率的不足，无法有效促进新旧公民的融合。他表明不是要特意分别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公民和新公民，“我们应该对获得公民权的新移民一视同仁，至少他们愿意放弃原本的公民而成为新加坡公民。然而，应该记得的是，这些都是人，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生活习惯都因环境、国情和习俗的不同而有异，需要时间磨合，也需要适当的磨合环境。”尽管如此，工人党议员还是认为，新加坡每年还是可以引进一万名新公民。

官委议员连忠诚也说，“新加坡虽然是多元的移民国家，但建国历史不长，还在寻找身份认同，新加坡人若与太多过于不同的移民在一起，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将出现偏差。我们想建立的，是一个家园而不是一座酒店。酒店固然比家里更豪华，有更多服务，但在酒店长久居住是我们负担不起的。当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自豪的家园时，才能更欢迎外国客人留下来，或许也能感到更幸福，生育更多孩子。”

执政党议员殷吉星希望人民和政府能花更多时间打造一个令人们对未来有信心，让下一代看到希望和机遇。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无法让年轻人根植于新加坡，有强烈的身份认同和建立团结的国家。他主张延缓

事情一来一往，令人困惑。有人可以一厢情愿，认为政府开诚布公，顺从民意，及时调整步伐。也有人可以合理质疑，到底白皮书是否真的经过政府高层“层层叠叠的考量估算”才拟定，还是公务人员闭门造车的结果。

增加人口的计划，集中精力在国家建设上，在加强社会凝聚力和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取得平衡。

总理公署部长傅海燕（协助管理国家人口与人才）发言时强调，鼓励结婚生育始终是政府人口政策的中心，是加强新加坡人为社会核心的最重要途径。政府在这方面的计划务实，政府大胆地希望生育率可以提高到1.4至1.5，不过这是需要时间。在我们继续解决生育不足问题的当儿，我们的做法是通过更精准地调试，引进移民。

李显龙总理形容刘程强对国民核心的看法“消极和狭隘”，他引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明向各地招贤纳士的重要，但保证新移民的数量将受到“恰当的控制”，不会超过国家所能承受的能力。总理向国会保证：新加坡人利益永远摆第一位。“新加坡核心”的成员不一定只限于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它包括在本地成家和建立家园的人，这些人秉持新加坡人的价值观，与我们拥有共同的理想，在这里落地生根并效忠新加坡。当他们念信约，以及在国庆日看到直升机飞过，他们会觉得这是个特别的时候。

收紧外劳 VS 劳动力的增长

引进外劳的问题，也是国会辩论焦点。工人党认为应该先从本地居民中挖掘人手，通过提升薪水鼓励更多本地人就业，籍此实现1%居民劳动力年增长，若无法达到目标，才再引进外籍员工来补充。执政党议员认为工人党其实是主张对外籍员工采取“零增长”，是

不切实际的。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反驳说，新加坡已享有很高的劳动人口参与率，而且在持续进步与提高。

官委委员张松声代表企业界提出看法，“首先，白皮书所建议的1%至2%外籍员工增长不能再降低，否则企业无法生存；其次，在2020年至2030年保持2%至3%经济增长是商家的努力目标，如果达不到目标，新加坡经济将严重受损；第三，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雇主已经竭尽所能，聘请年长者和重回职场的妇女，但因种种原因，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官委连忠诚认为白皮书并没有体现任何重大的政策转变，就经济、劳动力、生产力增长的指标来说，白皮书基本上与2003年的经济检讨委员会和2010年的经济战略委员会所作的两份报告如出一辙。他建议放慢引进新移民的速度，并通过重组经济模式成为知识型经济体，同时妥善使用国家储备金，确保2030年人口即便是600万，经济依然保持活力。工人党也表示理解，要企业重组以减少依靠外籍员工必定相当沉重，他们赞同动用储备金协助企业重组。

总理公署部长林瑞生呼吁大家不分党派，在辩论中争取共识，共同克服新加坡面对的严峻的人口挑战。他认为，企业提升并不容易，操之过急会伤害企业，最终受伤害的还是工友。经济增长可以放慢，外劳增长可以放慢，不应该忘记的是，失业率不可提高，薪水不能够停滞。有工作压力大，没有工作，压力会更大。

国会于2月8日通过修改后的动议时，李显龙总理说，“白皮书课题涉及比较情绪化的问题，大家都有非常强烈的意见，我们必须顾虑到人民的情绪与感受。这也是很复杂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能仔细考虑议员们在国会里发表的种种意见，不但去了解政策的细节，也尝试明白政府的用意与目标。”

人口增长VS经济繁荣

国会外，学者多方面质疑白皮书的论据。

知名的投资管理总裁胡猛（新移民）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新加坡的持续繁荣有赖于稳定的人口增长的说法值得商榷。作为一个人口承载有限的城市经济体，并不需要“五脏俱全”的产业配备。这种经济体只能选择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不是人口密集型的产业。可以多发些工作签证，而无须增加PR或公民。至于人口老化，需要对传统经济学的定义修正，特别是关于老化的年龄和老人消费力的重新定义。当然前提是经济必须完全开放，并且选定几个可行的产业。我们可以创造新加坡模式，但这需要从经济学的源头思考而不要套用现存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大多是为大市场的经济体准备的，绝非为城市国家准备。”

接下来，前公务员严崇涛说，“在新加坡，我们必须从供应的角度去看待人力问题。只有在确保新加坡有足够高技能的人力资源，包括工程师和会计师等，并且在必要时引进外籍人士弥补不足，我们才能吸引到投资，我们是透过

这种方法把新加坡经济建立起来。我们的错误，是从80年代开始没有继续提升，反而引进大量外劳。这一来。雇主不愿提升，就只依赖低成本、低技能和低工资的外劳。雇主现在的投诉和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对人手不足的诸多埋怨没两样。”他希望政府领导人这回不会在压力下，再度放宽原来收紧的外劳政策。

新加坡经济学会副会长刘浩典、杨南强、陈金松与马努巴斯卡兰(Donald Low, Yeoh Lam Keong, Tan Kim Song, Manu Bhaskaran), 2月9日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专论, 认为有关人口的辩论正受某些谬论所主导。

谬论之一: 如果不大量引入外来劳动力, 商业成本将上升, 一些企业会倒闭或搬离新加坡, 国人将失业。他们认为这一切并非坏事, 在一个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里, 这是应该发生的。无法适应的企业应当也必当离开市场; 国家没有理由用更多的廉价外劳维持其生存。它们的离场将释放劳力和资本, 为那些有竞争力的企业所用。这种创造性破坏, 对于经济重组是必要的。至于被裁退却没有技能转行的工人, 经济上合理的答案是由国家直接帮助生计受影响的工人——通过失业救济金、更高的就业津贴、重新培训和一次性的社会保障金援助, 公共政策应当协助本地工人和企业应对经济重组。

谬论之二: 经济增长是零和游戏, 认为新加坡必须维持一定的增长率, 否则将会停滞不前并最终变得无关紧要。在亚洲这类高速增长且日益相互依赖的地区, 增长本身并非零和游戏。新加坡并不会因为其他城市的增长速度比较快而受损, 恰好相反, 区域里其他城市的增长, 更可能促进我们的增长。它们增长所形成的更大市场, 以及他们国民

收入的增加, 应该被当做是新加坡的机会而不是“竞争”的威胁。

谬论之三: 拥有众多人口的富裕城市, 享有经济学上所谓的“聚集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其实, 聚集效应只发生在个别产业, 即是那些需要拥有高技术与知识的员工的产业, 他们的聚集会催生创新。聚集效应的好处并不出现在廉价劳力密集的产业, 如建筑、清洁和保安服务。

谬论之四: 医疗和社会服务的支出都是成本, 必须用加税的方式支付, 因而拖累经济。其实, 与任何其他产业一样, 医疗和社会服务业同样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做出贡献。甲在医疗与社会服务的花费, 就是乙的收入。至于医疗和社会服务必须花纳税人的钱, 我们应该把它们视为有用的投资。增加医疗和社会服务支出不意味著一定要加税, 新加坡拥有庞大的预算盈余, 能够可持续的为这两类服务负担进行妥善规划的补充。

来自维也纳的国际知名人口统计学者鲁兹(Wolfgang Lutz)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讨会上说, 新加坡目前的人口生育率虽然低于2.1人口替代率, 但情况不应造成恐慌, 因为2.1这数字不应该被当做最佳基准, 而政府进行长期的人口规划时, 也不应该再使用人口替代率概念为依据的既有模式。他说, 教育越来越普及, 即使国家面对老龄化的趋势, 未来社会中的年长者因受过更高的教育, 生产力预料也将提高, 而若根据这一论述, 新加坡目前低于2.1人口替代率的生育率其实不算低。年长者普遍受过高等教育, 健康意识也会较高的, 而他们的工作期也将显著延长。白皮书规定的2.1人口替代率并没有将人民的教育水平、死亡率与移民的引进等因素纳入考量, 是一种高度“人工的概

念”。依据他与自己团队的计算, 新加坡长期的理想生育率是1.7, 远低于白皮书定下的2.1。

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

人口政策的辩论有情绪化的趋向, 模糊了这场辩论背后更大、更为基本的问题。到底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到底人民真正的诉求是什么, 政府与人民之间显然缺乏足够的沟通。

数十年的经济成长, 社会各领域并没有感到真正受惠。日趋表面化的贫富悬殊让很多人有种感觉, 经济的成长是不关切身的事。新广第8播道2013年2月22日的一项时事节目, 现场通过互联网向观众做调查, 在回应人士中, 有92.5%表示可以接受较低的经济成长率, 换取较少的外来人口。

丹麦人口老化生态统计专家詹姆士·沃佩尔教授(James W. Vanpel)最近提出, 人们应该年轻时少做一点, 但做到更老。我们每周应该只做25小时, 但要做到80岁。当你20岁时, 你应该与朋友多花些时间。到了35岁, 你需要花多点时间在孩子身上。可当你活到70岁, 你的时间又太多了一点。他认为, 做兼职的年老者比完全不做工的来得健康; 做工, 让年老者更健康, 不只对心理健康有好处, 作为社会的活跃份子, 让人自我感觉良好, 你会兼用大脑与肢体。他说, “最关键的是: 我们都付出了一定工时量, 但不一定要限制在个哪阶段。在20世纪, 我们重新分配财富。我相信在这个世纪, 我们会重新分配工时。”

新加坡人民殷切期望的, 无非是经济成果要能更为平均的分配, 生活的步伐才能适当调整, 尽管在这方面我们可能比北欧的丹麦迟了一个世纪才起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突显寻求共识

的困难

人口白皮书的讨论



文：韩咏梅

一年多前政府宣布将针对我国人口结构、未来经济发展、环境的宜居和可持续的生活等课题，展开“人口白皮书”讨论时，原意是希望能通过对未来挑战的认识与理解，为下来的发展方向以及人口政策拟定一个大家可以接受战略。在这个信息快速传播，言论空间在互联网讨论浪潮冲击下不断拓宽的环境里，让全民讨论这个关系国家未来的重大课题，是政府回应这个时代的一种方式。

公布690万人口这个预测数字，很多人认为是这次白皮书最大的败笔，但是能不公布吗？要是不提出这个白皮书，一切的未来规划会像空中楼阁一样。如果没有一个未来人口预测的参照点，就无法较准确地预计未来基础设施的开销，当需要到来时，建设可能就无法到位。而过去没有准确的规划，恰恰是我们现在面对交通拥挤、预购组屋迟迟等不到之类令人烦躁问题的根源。

以上谈的这些，都是政府假设全国人民都希望在新的加坡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区域中，能够继续生存并继续享受优越生活的基础上制

定出来的策略。用经济数字来说，就是让增长率至少能保持在3%。为了维持3%的增长，需要有足够的生产力和劳动力支持，而在人口渐渐老化甚至萎缩的社会，这个愿景如何实现？

鼓励生育看起来是治本的方法，但是生孩子不是生产绒毛玩具，要人们改变生活习惯、要求和心态去积极生孩子已经很难，孩子不是一出世就能进入职场工作，即使我们的生育率今年起就从1.2激增到2，这些婴儿长大、上学到能进入职场，也需要20年。

我也经常对都市的忙碌感到厌倦，向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希望我们的国家不那么拥挤，每天上班不必等几趟地铁，买车不必付相当于车价三四倍的拥车证，开车时不必白耗汽油在付费的高速公路上停停走走。可是，身为新闻工作者，我很幸运地多了解一些摆在我们眼前的选择，也很不幸地知道有些问题是这个小岛国难以跨越的天堑。所以，对于人口白皮书，我认为更值得思考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引起的讨论以及突显的问题。

2013年5月1日摄于芳林公园 / 杨伟汉摄

理性处理和感性解读

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说人口白皮书是“新加坡政治历史上获得最广泛辩论的白皮书”，这个形容是准确的。它不只是最广泛辩论的白皮书，甚至是最广泛讨论的课题，政坛、学术界和民间都组织了各种论坛讨论，其中2月16日，也是农历正月初七“人日”在芳林公园举行的反对人口白皮书集会，更是吸引了5000人冒雨到场。

我出席了一些学术讨论，也到芳林公园观察了集会，感受是又喜又忧。喜，是因为这个课题让学术界的一些讨论走入民间，一些学者的意见通过社交媒体如博客和面簿转帖后，受到更多人阅读。不论同不同意那些观点，他们的看法和论述能提高讨论的素质。忧，是因为一些论者过度政治化，凡政府建议必反，以为推翻了一切，新的、更好的就会自然形成，对于问题的实质以及为什么需要有这份白皮书，很多是没耐心去理解的。

感性的解读远比理性认知简单，76页的白皮书并不容易阅读，690万人这个数字容易体会得多。现在500多万人造成的拥挤已经那么难以负荷，690万人绝对是一个直接刺激神经的数字。

据知，在公布这份白皮书前，负责人口政策的部长们向国会议员们收集意见，熟悉和了解基层的不少议员都提醒，这个数字难以让人民接受，能不能不提这个数字。然而，政策制定者观点不同，他们相信这个数字是隐藏不住的，因为各个岗位的公务员在执行政策时，总要对未来的需要有一个参照，比如负责排水工程的工程师，他要知道未来的排水量和现在相比差距有多大，才能对未来的需求做好准备。即使白皮书不公布这个数字，或者干脆不要公布白

皮书，政府在为将来的建设申请拨款、公务员为未来的需要做规划时，就得凭想象做事。与其让人们猜测，还不如老老实实说出来好。

“诚实”当然不是坏事，但是诚实到忽略民间感受和想法，在政治上并不明智。

政治领导的任务是决定航行的方向，和人民沟通让大家大致接受这个方向，然后再由公务员根据这个大方向去制定政策。用西方谈沟通的语言来说，就是政府必须在“为什么必须做”（Why）方面与人民沟通，公务员的任务则是思考“做什么”（What）和“怎么做”（How）。

为什么必须有“人口白皮书”？我们面对的现状是什么？如果什么都不做我们会面对怎么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沟通显然不足。一方面，这类的说明很容易流于“说教”，人们不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在探讨眼前的问题时，难免会触及过去政策的偏差，我们是不是到了不带包袱检讨过去的境界？比如生育政策、组屋功能以及开放外劳市场等等，除了静静地修正，可以不存忌讳地坦诚讨论吗？如果我们对一些课题的公开讨论空间还存有疑虑，那就难怪情绪化的反应越来越有市场。

新移民问题再被挑起

任何讨论最怕就是情绪化，而在本地最容易把讨论变得情绪化的做法就是加入“新移民”三个字。

在任何社会，特别是现今这个人口流动很大的时代，移民政策总是最难让人理性思考的课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人口白皮书讨论引起东西方媒体极大的关注，他们想看看我们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因为他们的社会正面对类似的

问题。然而，新加坡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之处，我们虽然有许多尝试促进融合的组织，但是当新移民越来越多，要他们自然“融入”就越来越困难。如果移民人数不多，要本地人包容一些还可以，当人数相对大起来，要人们放弃一些舒适，和外来人“融合”，这有点违反人之本性。

在我们的社会，包容新移民向来被官方定义为“是”，排斥被认为“非”，长久下来人们的自然反应被压抑着，当舆论空间打开时，情绪就如决堤之水般涌出，在人口白皮书讨论期间发生的一些口水战，把这股情绪再推向另一高潮，进一步突显了融合之难。

对于移民融合问题，个人浅见是应该多下功夫做事和正面沟通。大家通过做事，直接的接触，就会把彼此当成“人”而不是“人口”，交换意见时更能平心静气，遇到分歧时也较能有容人之量，而不是动不动口诛笔伐，把道理越说越歪。

人口白皮书讨论牵涉的范围很广，但正如文章的题目所说，讨论的重点过度放在人口数字和移民问题上，更根本的问题如生育率、老化的社会对医疗和住房需要等等被轻轻带过，使这场全国大讨论变得舍本逐末。

一场旨在让全民对未来建立一套共识的人口白皮书的讨论，最后反而让大家看出共识的建立有多困难。我乐观地认为，这不是坏事。本来寻求共识就是一个不能间断的工作，当社会越来越多元，求同存异越来越重要，“求同”必须“存异”，而对“异”的处理和态度，是一门大家更需要修的功课。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文：杜平

中国新领导层的威信 能够维持多久？

自去年十八大以来，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七常委体制一直享受着较高的民意支持和政治威信，其最大原因并非是这个领导体制多么受欢迎，而在于总书记习近平的个人言行风格让普通百姓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些新期待。习近平淡定沉稳的性格，雍容大度的举止，微笑中透射出的威严，以及干练的行为方式和不啰嗦的语言风格，都让中国民众感觉良好。习近平在反腐肃贪问题上的坚决表态，以及以身作则改变作风的“八项规定”，更使近乎荡然无存的执政党公信力有所恢复。

多方展示中国新的能量

在外交事务中，今年3月“两会”之后，习近平频频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其大国领袖的特质和风范，从而再次赢得了民众的认可。在当选国家主席一个星期之后，他便旋即出访俄罗斯和非洲三国，出席金砖五国峰会，整个过程都备受中国公众的关注。再加上“第一夫人”彭丽媛光彩亮相，始终伴君左右，结果使原本硬梆梆的外交新闻变成了全国人民津津乐道的话题。这种夫唱妇随、相得益彰的政治画面，在当代中国政坛上从未有过，既拉近了人民和领导者之间的距离，更提振了民气，使中国人也能为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和“第一家庭”自豪一回。

接着，在海南博鳌论坛开会期间，习近平更是充分利用东道主之便，把小小的三亚变成了临时首都，把博鳌论坛变成了可以长袖善舞的外交大舞台。今年的论坛共有一千多名外国政要和商界领袖与会，其中有七位国家元首、三位政府首脑、二位国会议长，可谓盛况空前。这至少可以反映出，各国政府同样对习近平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尊重。直白地说，所有与会的外国领导人都希望借机零距离地接触习近平，从而与之建立特殊的私人关系。

这般景象看在美国人眼里，难免会产生一些感触。过去两年时间里，美国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给中国的周边外交造成了一些困难，包括导致个别邻国与中国反目。但是，借助博鳌论坛期间“远悦近来”的景象，中国向外界展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其国际影响力依然巨大，其在本区域乃至世界上的地位不可撼动。毕竟，中国不只是一个大国，而且还在继续地冉冉上升，还在不断地充入新的能量、新的吸引力。所谓新的能量，当然包括习式执政理念和风格所带来的正面反应；所谓新的吸引力，当然包括中国已开始投入实施的新发展蓝图。



中国普通百姓当前最深恶痛绝的事情，莫过于政治腐败、权贵勾结和社会不公。假若反腐没有成效，权贵阶层依然无法无天，那么，习近平及其领导集体至今所赢得的民心与威信，难免会快速地得而复失。

上文所述，旨在概括笔者对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大致观感，以及对其内政、外交举措的基本印象。可以这么说，虽然是新手上路，但习近平的接班却是“无缝对接”，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事务中，他不仅毫无生疏之感，而且更是胸有成竹，大局在握，一切均在股掌之中。这种情形在其两位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上位之初是未曾有过的。其中主要原因，其实所有人都早已明白，一是胡锦涛的“裸退”，使习近平不再面对来自“太上”的干预；二是在政治局常委会内部，没有一个比习近平更为强势的人物，更无人有意挑战之。

中共建政以来第三位强人

因此，我个人的感觉是，习近平是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以来，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位强势领导人。这是时势使然，也是个性使然。当今中国之乱象可谓积重难返，这个时期也许很需要这样一位强势人物，来凝聚共识，重建信心，拨乱反正，匡正纲纪。由于上下左右没有势均力敌的政治对手，习近平的政治建树按道理应该可以超过几位前任。

但是，未来能否如人所愿？这首先要看习近平能否管好自己领导的执政

党。中国普通百姓当前最深恶痛绝的事情，莫过于政治腐败、权贵勾结和社会不公。假若反腐没有成效，权贵阶层依然无法无天，那么，习近平及其领导集体至今所赢得的民心与威信，难免会快速地得而复失。在北京“两会”结束之后，坊间曾传言习近平将在反腐问题上有大动作，其后便耳闻一些事例，只不过尚未公开证实。笔者相信习氏整党治吏的决心是坚决的，只不过要确保反腐行动有序地进行，但无论怎么考虑，中国老百姓都希望能不断地看到反腐的行动和成效，而执政党的威信也只能靠持之以恒的行动和人民所认可的效果才能维系下去。

中国当前急需做的不只是创造物质财富、改善民生，而更应尽快重建政治和社会秩序，使全民有一套基本的价值共识，把混乱不堪的局面变得有条不紊。而秩序的重建、价值共识的达成，最根本的条件之一，就是为政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并且同样受到道德和法律的规制，与黎民百姓无异。假若执政党依然凌驾于法律之上，假若权贵阶层依然视道德底线如无物，那么，中国即便在形式上不是四分五裂，其民族精神也将会变得六神无主、魂魄四散。笔者希望看到，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不仅能够大有作为，而且更应快有作为，因为中国普通百姓等待的时间已经太久，失望的时候也已经太多。

作者为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马来西亚大选 掀“华人海啸”？ 冲击城市选情但未改变格局



／ 文图：谢诗坚

第13届马来西亚大选已告落幕，虽然没有改变政治版图，但归纳为政治海啸2.0版本是有其依据的。

因为2008年的政治海啸（1.0版本），先出现了新的政治板块：国会：国阵140席，民联82席。

州议会方面，民联夺得5州执政权，即吉打、檳城、吡叻（2009年重回国阵怀抱）、雪兰莪与吉兰丹。

而今年大选又出现相近似的结果，变成国会：国阵133席，民联89席。

州议会方面：檳城、雪兰莪及吉兰丹归民联，吉打又重回国阵怀抱。

在格局不大变及民联没突破下，为何称之为2.0版政治海啸，我们不妨作下列的探讨：

纳吉上位打首相牌

首先，国阵经过308政治大海啸洗礼后，内部进行调整，最明显的是拿督斯里纳吉在2009年4月取代卸职的敦阿都拉成为巫统主席（自动成为国阵主席）与首相，启开了纳吉的时代。他急切地推出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和口号，终于化成四面八方回应的“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而纳吉通过一马组织与公司发放数以亿计的援助金给普罗大众，这些措施包



括月入不足3000元者的家庭，从去年开始可获500元援助金，而在今年又再分发500元。那些单身族月入不足2000元者，也有300元援助金。此外，发书券和现金给学生购书。各个组织、学校和社团也获分派赞助金，一时之间，几乎蔚成风气。无可否认的，自纳吉在2009年掌权以来，他就没有手软地给予各不同团体与个人在物资上的大力支持。

例如在他任期内，给予华文国民型中学增设的绿灯，给予独中增设和扩建，更先后认同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提升成为大学学院。这一连串的动作与佳音，也成了纳吉的“活招牌”，被称之为“首相牌”。

抑有进者，纳吉也不犹豫地提供援助和拨款给一些华小和国民型与独立中学，所有这一切纳吉自然希望华社会有回报及回应，以显示华裔对国阵的重新认识。

但纳吉在改革的过程也面对包括巫统内部的不协调；尤其是在挑选候选人方面。虽然纳吉尽量调低巫统的权威，尽其能力来“满足”民间的诉求和需求，但他也面对成员党，如马华、民政及人联党的振作乏力，它们基本上保持了308前的思维来面向新的环境。



民联共主安华在群众大会上造势

华基政党沦为配角

虽然国阵局部的改革声也时有所闻，就是成效不大。不论是马华或民政，它们的领导人是旧的脸孔，即使有变动（如人联党陈华贵换陈康南）也还是相差不多，“左袋换右袋”；那些没有变动的则是马华的蔡细历，他是元老之一，本已退休，但在308后通过党选卷土重来，及在民政被扶正的许子根。他们在不寻求参选的情况下，反映了这三个政党的缺陷，堂堂党魁不参加大选，是罕有的，甚至是不曾有的。如今在大选关头，纳吉及国大党以新人姿态上位时，马华民政与人联党的党魁则是退居第二线，与巫统领导人的全线出击形成强烈的对照。

在这种情形下，纳吉在4月迎来了全国第13届大选时，已没有时间对国阵

内部进行改革，也就是无法兼顾友党人选上的失当与失误。这已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选党不选人的定律下，国阵如何形成一个整体争取选民。

民联打出林吉祥牌

其次，已经结合起来的民联有了第一次政治海啸的经验后，准备给国阵更大的打击。

本届大选，林吉祥在思前想后下，希望晚年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以符合他一向以来的强人形象（英雄是最怕寂寞的）（如1990年对林苍祐及1995年对许子根），也就宣布攻打柔佛的振林山，这对他来说是最后的一仗，输了“收山”，胜了再一次成为民联在南马的开路先锋。

当安华知悉林吉祥有此坚决意向后，马上认同林吉祥带队在柔佛“搞反风”，因为他知道单靠伊斯兰党及蔡锐明（公正党柔佛州主席）不足以掀起反风，也无法在柔佛全面插旗，林吉祥的“派上用场”正合其时。

从这样看来，当行动党有新的部署和突破时，伊斯兰党则在原地踏步，他们似乎满足于现状，也把拿下柔佛当成“红花”，因此未作全面的部署与进攻，其领导人物沙拉胡丁也在选举中落马。同样的，公正党在柔佛也是势力薄弱的，要调动军心，似乎不大可能。因此算来算去，林吉祥成了在柔佛的灵魂人物。这位沙场老将所用的策略与80年代在檳城插旗（开展丹絨一役）是没有两样的，他当时以“哀兵上阵”的姿态面对许子根，并不断强调其胜算只有45%，后来调到50%，说是打成平手。在抓住群众怕失去林吉祥心理下，几乎大部分的选民都把票给了林吉祥，因此许子根在丹絨国席输林吉祥一条街那么长（万余张多数票）。

同样的，我们也看到林吉祥这次在振林山也打出悲情牌，一直表示处于下风；尤其对手是原柔佛州务大臣阿都干尼。在紧急关头，林冠英重拳一击奏效了，他开始公开要求华裔90%必须支持民联候选人，否则不易过关。这一号召果然打动人心。

行动党悲情牌发酵

除此之外，因为不少的团体（非政府组织）、文人学者及专业人士先后发表文告表态支持两线制和结束种族政治，形同认可民联的“改朝换代，告别腐败”的声调。而广大的群众也因在最后3天传来林冠英的阿逸布爹的州选区告急，有被金钱政治轰炸的“危机”。更是使到悲情政治发酵及林冠英倒成为受害者下，把林冠英的形象托得更高。于是在5月3日檳城旧关仔角的那一场群众大会变成了挺林冠英大会，共有12万人之众，简直是破了历史纪录。这种群情沸腾的状况反映了5月5日的投票势将再一次掀起政治海啸，果然不出所料华裔的反风吹得比308更响，从70%拉高到90%，国阵的支持率只剩下10%。这样一来，民联的候选人便以巨大的票数压倒国阵的候选人，前者的得票翻倍，后者的得票相对减少，甚至有两名国阵候选人首次失按柜金，真是匪夷所思。这说明了华裔吹起的反风不但在檳城也席卷全国各地大小城市，连带也影响半城乡地区的胜选。一些伊党及公正党的友族候选人也因之中选。

华人海啸引发争议

首相纳吉形容这样的结果是“华人海啸”，马上被林吉祥和民联的人所驳斥，认为是马来西亚人海啸，非华人海啸。其实这也不必有太大的争议，说是“华人海啸”也没有贬义。而事实上真的是华人动了起来，希望这一次能

改朝换代。也因为这样，民联的华裔议员纷纷中选，马华、民政及人联党的候选人也就因此付出代价了。如果不是“华人海啸”，马华与民政等是不会扑地不起的。

因此我们在估算底下，也就得出下列的答案：不容否定华人的因素在发酵，正好华人也是马来西亚人，所以说也是马来西亚人的政治海啸也没有错，只是较贴切地形容在民主的国家，一个族群的集体表态也没有错，事后亦不是不能被协调与被调整的。

既然华人海啸或城市海啸吹不进乡村与马来选区，巫统的势力相对来说还是固若金汤的。拿槟城作比例，巫统参选州15席，取得10席，只失1席，但又从国席中拿回一席（浮罗山背），并保住属下三个州席。这说明了华人在槟城的旧关仔角闹翻天时，还没有打动和影响巫统的根基。

事实上，民联在本届大选取得22个新国席时，不值得太高兴，因为它的后

院失火了，输掉原有15个国席，而吉打州也失掉7个州议席。

以此推算民联原有的82席+22席-15席=89席，分配如下：行动党38，公正党30及伊斯兰党21，较原来的增加7席，行动党是大赢家。反之，国阵原本有140席，也因城市反风太烈不但增不了席，也失掉了7席，剩下133席（总数222）。

另一方面，国阵从伊党手中夺回了吉打州政权，可见“华人海啸”达不到甘榜和乡村，反而给国阵翻了盘（吉打州席：国阵21对民联15）。在其它州国阵未失政权，只是面对檳雪仍因华人海啸更佳的巩固州执政地位。至于吉兰丹州，回教党也失掉5国12州，所幸州政权仍稳固（33席）。

正由于民联也在柔佛破天荒拿下5国12州席，有人说拜“华人海啸”之赐，唯仍拿不下州政权。国阵拥有21国38州，算是有惊无险，也说明乡区不吹反风。

至于东马沙巴的变化虽然有一些，民联拥3国席及12州席，但整体上国阵还是稳如泰山，拥有国22席及州30席。

在砂拉越民联拿下6国，全是以牺牲人联党作为代价的，明显地吹起城市反风。不过国阵则拥有25席，有助国阵巩固中央政权。

这就是说，东马两州有效地加强国阵的政治地位，它的133席虽未达2/3多数席，但纳吉的政治地位将会在他的随机应变下相对地稳定下来，所谓的改换领导人的呼声仍然听不见，或只是很小声，未成气候。毕竟两线制已经被巩固下来，只是两大阵营中的种族平衡仍未能达致，这是美中不足及有待改善的两线制。

还有大选过后，如何解决马华不入阁及华人在政府中的代表性问题及2.0版本的政治海啸带出的追求平等的课题，已成为纳吉首相当下的重要日常议程之一。

作者为马来西亚资深时事评论家



大选结果宣布后，纳吉与支持者相道贺。

Excel Towards
A Leading Specialist
Engineering Company
In Asia

Voice
Vision
Team

One

Bintai Kindenکو Pte Ltd
Bintai Kindenکو (Vietnam) Co., Ltd
Bintai Kindenکو Indonesia Holdings Pte Ltd
Bintai Kindenکو Energy Pte Ltd
Bintai Kindenکو Property Pte Ltd
Kejuruteraan Bintai Kindenکو Sdn Bhd

Operation Office:
31, Jurong Port Road,
#1m1-17M/18M, Jurong Logistics Hub,
Singapore 619115

Tel: (65) 6264 3818
Fax: (65) 6264 7663

Tel: (603) 4042 6233
Fax: (603) 4042 1221

Registered Office:
No. 149 Rochor Road
#05-13/15 Fu Lu Shou Complex
Singapore 188425

Tel: (65) 6334 0300
Fax: (65) 6339 0020





龍標燕窩

DRAGON BRAND BIRD'S NEST SINCE 1957



56年以来，龍標始终坚持“一定要把货真价实的燕窝送到消费者手中”。多年来，龍標不改初衷，执著于品质，坚持与时俱进、精益求精，并致力于不断追求卓越！

Richard Low, MediaCorp Artiste



Head Office: 60 South Bridge Road Tel +65 65382288
Branches: NEX Mall #01-39 Tel +65 6509 0955 2HR (ex. Airport Centre) #01-22/23 Tel +65 6535 1330 Takashimaya #02-092 Tel +65 6735 5655
112 Katong #01-13A Tel +65 6636 4153 The Shoppes at Marina Bay Sands L1-00 Tel +65 6588 7311 Parkway Parade #01-01 Tel +65 6348 0788
Fook Hai #01-03 Tel +65 6533 2382
Email: enquiries@dragonbrand.com.sg Website: www.dragonbrand.com.sg



从近期大型收购活动 看老牌企业的变迁



文：吴慧敏

先贤李光前(1893-1967)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富商和大慈善家。他的家族一直都是新马最具影响力的家族之一，旗下公司几乎遍布各行各业，有银行、保险、房地产、酒店、建筑、零售、汽车、电子制造、矿业、汽水、啤酒、印刷等等。多个新加坡人引以为傲的品牌和地标，包括莱佛士酒店(Raffles Hotel)、罗敏申(Robinson)、虎牌啤酒(Tiger)、F&N饮品、时代书店(Times Bookstore)、辉盛服务公寓(Frasers Service Apartments)等，均属其旗下。

这个家族企业由先贤李光前所创立，后来由陈振传加以发展。陈振传在管理华侨银行期间，凭借他和洋人的良好关系，收购了上述多家公司，并巧妙地将它们贯连起来，像蜘蛛网一样交叉控制权，目的就是为互相扶持，抵御外人的突击掠夺。至他于80年代退休时，华侨银行已跻身于世界500家最大银行之列，年净盈利1亿多元。在新的形势下，家族企业领导人面对各方竞争与国家经济的转型，坚守以银行业为集团的核心业务，华侨银行作为我国三大银行之一的地位屹立不倒，业绩一年比一年辉煌。

先贤李光前在世时是名闻遐迩的慈善家，他所创立的李氏基金是本地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历年来让无数新加坡人受惠。他的集团所创立与经营的多个品牌，更是许多新加坡人的集体记忆和符号，近十年来，这些品牌接二连三地成为被收购目标，引人注目。

罗敏申集团 (Robinsons & CO. Ltd)

罗敏申是广为新加坡人熟悉的老字号百货业公司，2003年华侨银行和大东方控股初次说要出售时，就引来超过1000名客户联署签名抗

议，这项脱售计划因而暂时被搁置。后来由于新加坡政府规定本地银行需要脱售非核心业务，持股不得超过5%，华侨银行和大东方控股后来还是在2006年，通过竞标的方式，将手上的29.9%罗敏申集团股份，以2亿零300万元卖给了印尼富豪李棕。

2006年10月，罗敏申的一次董事部会议发生一场罕见的大地震。为罗敏申服务了多年的原主席黄文盛，在会议上以80%的反对票被迫卸下主席职务，而担任罗敏申董事18年之久的周玉琴(她当时也是董事会薪酬和委任委员会的主席)，则差点被震出局。周玉琴对此非常恼火，曾公开指责李棕没有事先知会她，处事“不漂亮”，愤而辞去董事职位。几天之后，剩余的两名独立董事——詹道存和陈卓进也跟着辞职。

当时，华侨银行和大东方控股将29.9%股份卖给李棕的金利太平洋集团(Auric Pacific Group)，却保留剩余6.1%的做法，也引起一些小股东们的不满。由于李棕的持股权没有超过30%，不需要提出全面收购行动，因此小股东们没有机会将股票套现。

2008年1月，迪拜的雅富腾(AI-Futtaim)集团突然对罗敏申提出全面收购行动。三个大股东——周玉琴的Tecity、安本资产管理亚洲(Aberdeen Asset)和Silchester国际投资者，是最先答应将他们拥有的一共23.18%股份，卖给雅富腾集团的。

由于持有29.9%股份的李棕一直不肯放手，雅富腾集团只好两次提高献议价格，最后以每股7.20元成交。隔日，华侨银行和大东方控股也将它们持有的大约6%股份卖给雅富腾集团。于是，这家本地老字号百货零售业公司的掌舵人，在短短两年内，又从印尼人换成了中东人。

李棕曾透露，他以每股7.90元买下罗敏申的股份，不过期间收取了1.50元的股息，因此成本只有6.40元。他认为，短短两年内，以每股7.20元卖出，等于有每股0.80元的利润，算是“相当不错的价钱”。

海峡商行 (The Straits Trading Company Ltd)

2008年初，周玉琴突然对拥有矿业、酒店和房地产业务的海峡商行，提出全面收购行动。

由于周玉琴是陈振传的孙女，而陈振传曾担任华侨银行的主席多年，两个家族一向交好，市场原本以为，这个收购行动是获得李氏家族支持的。不料，李氏家族却另外提出一个收购献议，出更高的价格来还击，让市场人士议论纷纷。这两个关系密切的家族，是否各走一方？

周玉琴已经从外祖父陈振传的手里接过棒子，是其家族财富的管理人。有人说，在罗敏申事件中差点被震出局，让周玉琴清楚意识到，她不能指望别人，而必须主动捍卫其家族的财富。与其等别人来抢，不如自己主动先将控制权紧紧抓在手里，以免他日重演被人震出局的场面。

陈振传家族原本持有海峡商行22.4%的股份，周玉琴先是出价每股5.70元。三个星期后，李氏家族出价每股5.76元，来抵御周玉琴的出价。周玉琴再将价格提高至每股6.50元，但李氏家族又还价每股6.55元。最后，周玉琴将价格提高至每股6.70元，成功说服李氏家族、华侨银行和大东方控股将它们共同拥有的大约32%股份买下来。

海峡商行是一家百年企业，不但握有充裕的现金，而且业务遍布锡矿、股票投资、房地产和酒店。更重要的是，



它也持有维信集团、联合工程，以及马来西亚熔炼公司的显著股权，因此，当时市场人士已经猜测，周玉琴收购海峡商行后，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将是维信集团(WBL Corporation Ltd)与联合工程(United Engineers Ltd)。

星狮集团(Fraser & Neave Ltd)和亚太酿酒厂(Asia Pacific Breweries Ltd)

也有人说，李氏家族当时之所以愿意将海峡商行“让”给周玉琴，是因为担心腹背受敌，所以宁愿“弃兵保帅”。

星狮集团在2006年突然将14.9%的股份，以9亿元的价格配售给淡马锡控

股，据说就是因为盛传这家公司可能成为被收购目标，所以才特意引入一名强大的投资者来坐镇。不料淡马锡控股却在2010年以13.3亿元，将这14.9%的股份卖给日本的麒麟(Kirin)公司。

2012年中，泰国富豪苏旭明和女婿向李氏家族、华侨银行和大东方控股献议，收购它们手头上共同持有的22%星狮集团股份，以及8.6%亚太酿酒厂股份。不少人原以为，星狮集团和亚太酿酒厂应该是李氏家族旗下的皇冠宝，不可能轻易放弃。不料他们还是以每股8.88元和45元，火速将这两家公司的股份卖给苏旭明家族。



泰商苏旭明一跃成为亚太酿酒厂的最大股东后，另一大股东——荷兰公司喜力(Heineken)，因为不愿自身参与养大的“虎牌”啤酒，以及它与亚太酿酒厂合作的许多商业秘密落入竞争对手，因而提出全面收购行动，与苏旭明家族力争亚太酿酒厂。双方一来一往数次交手后，喜力最终成功抱得“虎儿”归，亚太酿酒厂正式成为一家荷兰人的公司。而苏旭明和女婿却从中大捞一笔，估计能从中套现至少10亿元。

随后，收购战又在星狮集团点燃。印尼的李棕正式加入战局，与苏旭明争夺星狮集团，他还成功说服麒麟支持其

收购行动。苏旭明原本一直将献议价格保持在每股8.88元的水平，完全无视李棕提出的每股9.08元。双方拖延了好几个月，一直僵持不下，最后，新加坡证券理事会(SIC)不得不介入，宣布有关争夺战进入“拍卖程序”，逼迫双方提高收购价格。最后，苏旭明将价格提高至每股9.55元，成功赢得星狮集团的控制权。今年2月，苏旭明已取代李显扬，成为星狮集团的新任主席。星狮集团旗下多个新加坡人熟悉的品牌，包括F&N饮品、时代书店(Times Bookstore)、星狮家居(Fraser Centrepoint Homes)、辉盛服务公寓(Fraser Hospitality)等，因而成为泰国人所拥有。

维信集团 (WBL Corporation Ltd)

周玉琴在2008年收购海峡商行后，曾多次高调接受媒体的访问，要求维信集团“释放股东价值”。

尽管海峡商行当时直接与间接持股只有大约20%，但由于另外两个大股东——直接与间接持股权约18.43%的基金经理第三道管理，以及直接与间接持股权约7.67%的安本资产管理(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在一些问题上，都与海峡商行站在同一阵线，因此三方人马在过去几年来，已经充分展现，它们的影响力其实足以左右李氏家族和他们控制的华侨银行。

例如2010年，这三家公司据说都投了反对票，将维信提出的一个奖励管理层的特别表现股计划否决掉。2012年初，这三家公司据说也都投了反对票，将当时寻求蝉联主席的黄思绵震出局，意外败选。有关报道指出，黄思绵事先并不知道这三方股东反对他续任主席，因此不少人将矛头指向周玉琴，认为曾在罗敏申董事会上差点被震出局

的周玉琴，应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过，又有媒体证实，周玉琴其实早在常年股东大会开始之前，已经通知黄思绵不会支持他续任主席。

不管真相如何，周玉琴在2012年底终于再次出击，对维信集团提出全面收购行动。2012年11月，周玉琴通过海峡商行，献议以每股3.41元现金，或者1.07股海峡商行股票，来收购1股维信集团股票。她也成功买下第三道管理和安本资产管理的股份，将持股权提高至大约45%。但华侨银行集团财务总监陈首平很快就批评海峡商行对维信所提出的献议价太低。今年1月，联合工程在李氏家族、华侨银行和大东方控股的支持下，以每股4元来反击，这三方人马总共持有维信集团大约38%股份。原本大家都期待维信集团爆发一场激烈的竞购战，不料，周玉琴却在3月初宣布，不延长收购献议，也不提出更高的献议价。

尽管如此，联合工程仍在3月中宣布将收购价格提高到4.15元，似乎对维信集团的控制权志在必得。不过，这仍然低于维信集团独立财务顾问预测的合理估值(每股4.56元至每股5.30元)。5月9日联合工程再度把收购价提高到每股\$4.50，显示最大的决心。至截稿为止，鹿死谁手，尚未分晓。

联合工程此次争夺维信集团的控制权，不论最后孰胜孰负，都不应该是李氏家族放松防备的时候。这些年来李氏家族显然以银行业为其核心业务，但除了华侨银行，仍握有大东方控股、万国(Bukit Sembawang)和联合工程的控制权，这几家公司同样也是本地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品牌。

作者为本地媒体人

如何投资亚洲？估值依然对投资者有利。目前MSCI亚洲（日本除外）的市盈率在11.1倍，仍低于12.4倍的历史平均值。考虑到通胀压力温和，我们预计亚洲企业利润率将在今年触底回升。

亚洲股市跑输发达市场 属暂时还是长期现象？



文：浦永灏

2月 and 3月，主要新兴市场，比如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金砖国家”股市继续下跌。当月中国A股市场指数从峰值到谷底的降幅达到5.3%，俄罗斯RTSI指数和巴西IBOV指数也双双下跌4.5%。新兴市场继续跑输美国等发达市场。这是怎么回事，为何如此？

“去风险”情绪卷土重来了吗？未必。在避险情绪高涨的环境下，新兴市场股市常常成为牺牲品，近期的形势发展确实让投资者有理由感到担忧：“货币战”升级、美联储及日本央行可能提早撤出积极的资产购买计划、美国自动减支、意大利“悬浮议会”（无多数议会）、朝鲜半岛潜在的军事冲突、新型禽流感以及中国近期推出紧缩政策等。

虽然我们承认全球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欧元区 and 亚洲，但是我们没有改变对世界经济看法。就美国而言，先行指标预示经济复苏仍在稳步推进，通货膨胀不是个大问题，美联储还不急于撤出量化宽松措施，尽管自动减支措施已经实施，但标普500指数仍创下历史新高。

同时，韩国等高贝塔市场似乎摆脱了日元贬值导致市场对其竞争力下降的担忧的影

响，KOSPI股票指数在2月份已全部收复1月的失地。另一方面，“避险资产”，比如黄金和瑞士法郎等依然疲软。显然，这不是一个可能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表现落后的“去风险”环境。

美国经济向好，美元走强是原因之一。今年迄今，DXY指数（美元贸易加权指数）显示美元已升值3.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除外的亚洲股票指数（MSCI亚洲（日本除外）指数）下跌2.7%。实际上，美元走强对亚洲总体股市影响负面，原因在于其往往会推高亚洲企业的融资成本，冲击资本账户，导致货币贬值，促使当地利率上升。流动性方面，美元走强也意味着货币政策趋紧，本地区的过剩流动性减少。流动性减少反过来又会阻碍当地股市上涨。美元走强还意味着亚洲货币贬值，从而降低了亚洲股票的吸引力。

增长和通胀形势亦值得关注。从环比数据来看，发达市场经济蓄势待发，而新兴市场的周期性复苏则在放缓。新兴市场不是面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就是面对增长减速的难题。近期经济数据（如PMI）即表明此种趋势。特别是，巴西、中国、印度和韩国的PMI指

数在过去三个月都表现平平。相反，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日本和德国）的PMI则显示出环比增长的迹象。市场也开始对印度、巴西、俄罗斯和中国存在一定程度的担忧，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增长动力日趋减弱。中国方面，新政府换届接近尾声，将注重从大宗商品密集型增长向消费和服务驱动型增长转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因此，大宗商品需求不再居高不下，由



此削弱了对大宗商品出口国（如巴西和俄罗斯）的需求。

有利催化因素随后将出现：虽然我们同意，发达市场的短期经济动能好于新兴市场，但随着时间推移后者将受到利好因素推动。第一，美元升值意味着新兴市场的货币政策和流动性环境趋紧，但同时也意味着大宗商品价格走低，进而降低通胀风险。亚洲作为很多大宗商品（原油、大豆、铁矿石、化肥）的净进口地区，2013年下半年可能会受益于进口成本下降及更为良性的通胀环境。

第二，发达市场经济复苏形势好转，应会为亚洲带来更好的出口环境，特别是对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等出口型经济体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大陆都是利好。部分亚洲出口经济体已经出现美国订单增多及相关利润率回升的情况。对于国内导向型经济体（如东南

亚），财政政策仍具有一定支持作用，多数亚洲国家（如东盟、印度和中国）都在扩大基建投资。出口前景好转、新一轮国内投资热潮，应有助于提振当地劳动力市场，增加员工薪资，从而支持地区经济增长。

如何投资亚洲？估值依然对投资者有利。目前MSCI亚洲（日本除外）的市盈率在11.1倍，仍低于12.4倍的历史平均值。考虑到通胀压力温和，我们预计亚洲企业利润率将在今年触底回升。虽然整个亚洲股市由于上述各种挑战而仍可能受到一定压力，但我们建议专门通过多种投资主题有选择地参与亚洲投资，比如日本出口商，以及受益于本地薪资上涨、基础设施投资和美国房地产复苏的亚洲公司等。

作者为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
首席投资总监

此文件仅旨在提供数据讯息，并未考虑到个别投资者的特定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尽管本文件中所载的所有信息和意见系从瑞银认为诚信可靠的来源处所获得，但瑞银不会就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此文件并不应被视为是针对任何交易之招揽、建议或要约而构成任何形式之法律行为。此文件任何内容并不限制或约束其它特定邀约之个别条款。瑞银明确禁止在任何司法管辖限制地区中进行商品销售推介或由不符法律规定之人员进行销售或推介或提供相关商品。某些投资工具和金融服务受法律限制，因此可能无法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提供。本文件所提供的信息、意见和价格仅限于其发布之时现行的信息、意见和价格，可能会在毫无预警之下即会发生变更。本行无义务更新或保存最新的资料。UBS及其关联机构、董事、高级职员、雇员和/或代理人均明确免予承担与本资料全部或部分内容或其中所含任何信息的使用相关的或因产生的部分及所有责任。

租金飙升

中小企业何去何从



文：龚慧婷



曾 经跟一位年逾古稀的雇主交谈。他经营公司四十多年，从八十年代高峰期聘请三、四十名员工，一直到现在剩下三、四名老员工。他所从事的是夕阳工业，年纪也大了，要转型几乎不可能，但由于市场上提供这类服务的公司已所剩无几，因此每年的营业额还是足以应付开支，不过在给员工发薪水以后就没什么利润了。

由于员工太少，他凡事得亲力亲为，在旺季，一周得工作七天，每天十几个小时。我问他为什么不退休，他说女儿的公司需要他的公司的技术援助才能降低成本，否则也很难生存，而且那几名老员工也需要工作来赚取基本的生活费。

当时政府还没有收紧外劳政策，我问他为什么不聘请外国员工以减低成本。他说其实他的员工薪水都不算高，最高的也不过两千多元。现在让他最担忧的，反而是租金的不断上

扬。原料、水电的成本还容易控制，薪金因为都是老员工，所以也可以有商有量，但租金的直线上涨，却随时可能超出他所能负担的范围，迫使他结业。

JTC初期曾惠及企业

初创业的时候，他是向裕廊镇管理局 [Jurong Town Corporation (JTC)] 租厂房。30多年来，经历了不同的经济周期。他一直很感恩的是，当大环境欠佳的时候，JTC会给与租户租金回扣或不加租，风雨同舟，共同携手渡过经济低潮。

成立于1968年6月1日的JTC，在设立初期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是要将裕廊的烂泥地转换成欣欣向荣的工业区。因此，在新加坡独立初期，JTC的宗旨就是要通过发展和建造低成本的厂房，来协助新加坡走向工业化的道路。

秉持着这个宗旨，作为工业厂房和工业用地“大地主”的JTC，因此会在经济低迷的时候，通过种种租金优惠政策，协助中小企业租户。

例如：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JTC将总值12亿元的租金回扣反馈给租户，并在过后的6年，逐步调整租金，让租金逐步下降到90年代初的水平。在2004年7月，JTC也鉴于整体经济未完全复苏，而提供了20%的租金回扣，扶了受SARS影响的中小企业一把。到了2004年12月，集团再将租金回扣延长半年，到2005年6月底才终止提供回扣。

然而，随着本地经济腾飞，经济结构开始转型，在80年代，新加坡开始朝吸引高科技工业进驻的道路发展。JTC也“顺应时势”，与当初成立时的宗旨“渐行渐远”。

然而，随着本地经济腾飞，经济结构开始转型，在80年代，新加坡开始朝引高科技工业进驻的道路发展。JTC也“顺应时势”，与当初成立时的宗旨“渐行渐远”。在2008年7月，JTC更是以17亿1000万元，把手头上的一些现成厂房，脱售给私人企业丰树产业（Mapletree Investments），从“国有化”变成“私营化”，受影响的中小企业至少有1500家。

在2008年7月，JTC更是以17亿1000万元，把手头上的一些现成厂房，脱售给私人企业丰树产业（Mapletree Investments），从“国有化”变成“私营化”，受影响的中小企业至少有1500家。

尽管丰树承诺在接下来的三年内，为受影响的租户设下租金涨幅顶限，不会让租金无节制地上涨，但一些租户赫然发现，这么一“转手”，自己需缴付的租金，至少就上涨了15%。

当各方还在尝试厘清这笔大交易会带来什么冲击时，坏消息接踵而来。同年9月，美国金融巨头雷曼兄弟突然倒闭，引发一连串的经济骨牌效应，也迅速让全球经济陷入可能会严重衰退的阴影中。

由于出口减少，制造业首当其冲，而租用厂房进行制造生产的中小企业尽管叫苦连天，但却求助无门。

厂房私有化导致租金飙升

JTC在2009年宣布，集团现有的租户可获得15%的租金回扣，希望协助雇主，让他们不需要裁员，也能渡过难关。然而，那些在半年前“过户”给丰树的1500家中小企业当然已无法获得租金回扣，还得应付更高的租金，仿佛雪上加霜。

尽管一些丰树新租户后来联名情愿，要求丰树减租15%至30%，但由新加坡淡马锡100%独资拥有的丰树产业当时表示，会根据个别情况来协助租户，但减租不会是他们优先考虑的方法。

丰树总裁当时更出面表示，若给与所有这批前JTC租户15%的租金回扣，将会导致其贷款违约，因它将无法偿还为买下这批工厂而向银行借贷的款项。

当时就有市场人士表示，盈利向来是私人企业的“终极目标”，作为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丰树也需要向股东作出交代。

幸运的是，2009年的经济衰退并没有想象中严重，新加坡经济很快就从谷底回弹。然而，我国虽然无需通过大幅裁员来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但还是有中小企业因无法抵御租金上涨和产品需求减少的双重打击，而必需结束营业。

在2011年，当丰树承诺提供租金顶限优惠期一过，有租户赫然发现，自己在更新三年租约时，租金上涨了40至60%。也就是说，原本每个月1200元的租金，突然骤涨到1800元。

最近一两年，通货膨胀促使原料成本上扬，加上碰上新加坡政府收紧外籍劳工的政策，租金又节节上扬，中小企业无疑已陷入水深火热的状况，因为，不管是原料、人工还是租金都在“涨、涨、涨”，但又没有良好的经济情况做后盾，让他们的营业额有机会跟着上扬。

在2011年7月，JTC二度脱售旗下两批工业厂房，总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包括将10栋多层厂房，以2亿8833万元卖给速美集团（Soilbuild Group），并以超过4亿元，脱售另外11栋多层产房给丰树工业信托。

在今年2月的财政预算案后，新加坡政府表示，将推出各种奖励措施，协

助企业提升能力、提高生产力及创新、重组业务并转型，以维持其竞争力。尽管各类计划林林总总，从津贴到人才培养计划似乎不一而足，但个人认为，中华总商会前会长张松声在国会上真正道出了中小企业的心声，点出了症结所在。

盼望政府从“心”出发

张松声希望，贸工部属下的亲商小组能探讨减少繁文缛节，避免过度监管。援助计划申请程序复杂繁琐，加上中小企业申请援助困难，他建议政府简化申请程序，并整合相似的计划，推出援助计划配套。

至于中小企业面对厂房租金高涨的难题，张松声表示，中小企业因为租金高而大受影响，他吁请JTC为中小企业提供较负担得起的工业用地，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不提高中小企业的租金。

然而，笔者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业厂房已掌握在私人业者手里，就算JTC推出租金冻结还是回扣优惠，能从中受惠的中小企业租户已越来越少。若要私人或政联企业（丰树）冻结租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他们能“抬出”丰树必须照顾股东利益为由，毕竟工业厂房已被归入他们上市的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资产中，有租金收入才能派发更多股息给股东云云。

政府若真想向中小企业伸出援手，或许可以考虑从“心”出发，深层思考中小企业最需要的援助到底是什么？

作者任职于新加坡管理大学公关部

劳力紧缩下的中小企业

浅谈本年度预算案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本年度预算案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和未来经济发展，二是调整贫富差距，三是解决人力和外来人口问题，所有的重点都围绕着民生课题，可见政府与财政部长高度重视全面性的民生诉求。

从商业角度而言，预算案虽有多项配套措施以推动企业发展，包括税务奖励和提高企业生产力措施，不过却大幅度增加外劳税和外劳配额限制，以严格控制聘用外劳，这对工商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势必产生很大冲击。有分析师指出，预算案似有置中小企业于死地而后生的用意，让中小企业经历“阵痛”和“冻火鸡疗法”后，希望更具有实力去面对未来的挑战。

人力问题引发社会情绪问题

多年来生育力下降、人口老化，但经济的稳健发展不断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人力的供应和来源就成了问题。即使我们想方设法通过各项举措去增加新生人口，也需要10-20年才能见效，这凸显了引进外来人口与外劳的紧迫性。

多年来，我们甚少集思广义去深入探讨，共同找出解决人力问题的办法途径。商家根据自

身的需要，大量引进外劳；政府也甚少与国人就移民与外劳问题进行全面性讨论，商家根据自己思维方式解读政府政策。近年来自引进大量移民与外劳后，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给国人在生活上带来不便，加上欠缺沟通，引发了国人不满和强烈反弹，以致移民与外劳问题发酵成为情绪化课题。

其实，外劳与移民是两项不同领域课题，聘用外劳是为了填补现有工作岗位缺口，这些外劳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必须离开新加坡，而引入的新移民则是解决人口老化与替代问题。其实，从现有的100多万外劳、女佣、持专业准证外籍工作人员和学生中，最多仅挑数万名成为公民来填补生育率的不足。如果大家认清人力问题的所在，国人与政府即可以心平气和地共同探讨和寻找我国人口政策与如何摆脱人力不足的困境。

预算案对工商界影响

本年度的预算案有许多举措对企业生存与发展极为不利，包括调高外劳税、减少发放专业准证和工作准证、提高公积金雇主缴交率、规定工人的基本薪金增至1000元才可计算成



文：郭庭水

为一个工作人口。显然的，这些举措都会加重企业的负担，影响企业的发展。

在资助企业方面，虽然政府为企业所提供的配套计划有多达一百多项，不过众多资助计划却在申请程序中附带了繁复的条件与要求，让许多商家却步。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提出了协助企业发展、增加国人收入的相应举措，包括以生产力创新优惠计划（PIC）提高生产力、鼓励聘用本地人而减少依赖外劳、工资增加补贴、公司与个人所得税回扣、商业用车路税回扣等，对工商界而言，原则上是有激励作用，但是令企业关注的是，有关计划与举措推出后，各有关部门是否会“各自为政”，附设更多要求与条例，导致遵循成本（Compliance Cost）反而增加。

一些建议供考虑

为了营造宽松的亲商环境，制定有效的推动企业发展政策，政府或许应该考虑下列几方面的建议：

人力政策方面

(1) 为了发挥外劳的生产效能，允许企业在不可滥用的先决条件下，让外劳进行不同范围的工作。

(2) 外劳的工作经验对企业运作十分关键，在现有外劳配额不变条件下，建议政府让有外劳配额企业可以安排外劳在其企业各所属公司内工作，允许企业可以根据其业务需要，自由调用外劳。

(3) 鉴于外劳动的来源已有所变化，允许企业可以按现有外劳配额，灵活雇用非传统来源外劳。

(4) 为了鼓励商家聘用更多本地员工，政府在推行较为灵活的外劳政策的同时，可考虑奖励企业采取积极步骤，以聘请本地员工来代替外劳。

(5) 允许有紧急需要的企业可让外劳做超时工作，每周工作超过72小时，但须预先向当局申请批准。

(6) 让企业可以继续更新要聘用外劳的准证，而不要以服务年资来限制企业聘请具有工作经验的外劳，外劳的去留应由企业决定。

(7) 为了缓解人力紧缩的压力，政府可在必要时提出各种奖励措施，让现有持社交准证者与合格入境者加入劳动队伍行列。

(8) 为了缓解人力匮乏，鼓励更多国人，包括年长者和家庭主妇，加入劳动队伍，进行部分时间工作，政府可考虑让薪金少于800元者豁免缴付公积金。

(9) 鉴于企业在调适新人力政策时，需要较充裕的时间进行规划与安排，政府可考虑延后半年才实施对外劳限制的新举措。

(10) 基于外劳人数已超过100多万，涉及领域广，人力部在执行统一性政策时，应视个案情况而予以处理，避免“一刀切”而伤及无辜者；人力部可考虑设立民意回馈机制，定期让商家和国人有机会向当局反馈意见、陈诉人力情况，并通过此民意汇集平台解释相关的人力政策。

(11) 设立跨领域的委员会，涵盖学者、专业人士、企业与民众加入参与研究人力课题，集思广益，定时检讨与制定合宜的人力资源配套举措。

商业成本方面

(1) 检讨房地产基金（REIT）与裕廊镇管理局（JTC）的功能角色

自房地产基金（REIT）推出以来，为了满足经营者和股东的利益，许多购物商场仅有少部分相同的品牌商家

进驻，造成我国零售业千篇一律，欠缺特色，而且租金大幅度提高，让商家无法应付；在工业领域方面，房地产基金则导致工业厂房的租金成本不断上涨，许多中小企业难以生存。政府应对房地产基金进行全面检讨，以防范其对我国工商企业的造成巨大伤害。

至于裕廊镇管理局（JTC），过去以来在推动我国的工业发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如今却像产业发展商与招商者一样，仅仅追求利润。我国工业的发展必须有一站式的服务机构，而裕廊镇管理局应摒弃商业角色，恢复其推动我国工业发展的服务功能。

(2) 恢复跨部门行政程序检讨、简化行政

各政府部门繁杂的行政程序，一直以来都在困扰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甚至影响国人的生活。政府应恢复跨部门的行政程序检讨委员会，防止可能出现的官僚作风，以及避免官员为了在业绩指标（KPI）要求的压力下，对工商界加入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与开销。简化申请程序，让各项资助计划能发挥功效，利于企业发展。

小结

人力政策与财政预算案对企业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各项举措犹如张开之弓，箭一射出即无回头。中小企业在求存与发展的道路上，如同逆水行舟，必须认清大环境，不断自我审查与检讨，并作出风险评估与必要调整，善用资源，如关闭不赚钱的生意、重新设计业务运作与程序，保留元气，等待下一个发展机会，为自己的业务展开创新空间，为我国的稳健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为本地中小企业主者、
现任国家生产力及延续教育理事会理事、
国内税务局纳税人民意委员会前任主席

楔子

蛇年初二，在金融界工作的外甥偕妻子上门拜年。

话题很快转入我国高级职员的工作压力，他说：“越是有能力，责任感强，上头越是要以数字打动你，委以重任。从此你像一只上轭的黄牛，负着沉重的枷锁，日夜劳作，十几小时是家常便饭。虽说薪酬丰厚，但房子、车子、孩子和物质的追求，驱使你更卖力工作。夜深人静，潮起潮落，回首往昔，感慨万千，仿佛白来世上走……”

生活的压力，把外甥的志向、热情和爱好消磨得一干二净，空余下只能向局外亲人发泄的满腹牢骚。春回大地，普天同庆，总该有一点幸福感吧。我们招呼这对夫妻品尝大红袍和享用五花八门的甜食，没想到外甥的妻子又有令我惊愕透露：“他真受不了，有意年底辞职不干！”

“你们那个宝贝女儿不还在英国深造小提琴吗？”我转移话题。

“快完成学业了，”她接着说。“但不想回来了！”

“怎么回事？”想到新加坡又要丧失一个人才，我感到不解。

“最近她听同学说，有个圣贤到母校视察，碰上一名同学在场弹奏钢琴。访客详细查询这名同学的背景，知道她的数理化成绩优异，便问她将来打算做什么？这位同学不假思索地答称要当钢琴家。此君当着大家的面，说了一句 It is a waste of time! (简直浪费时间！) 这话传到女儿耳中，大大伤了她的心。”

“以人为本” 抑或“以数字为本”？

／文：雨石

人生选项

这对父女的人生选项，既说明我国社会经济的变迁，又揭示两代人对人生取向的差异。父亲是务实的，“为五斗米折腰”，到了50开外“知天命”之年，才疑惑这种为了富足而劳碌一辈子，到底是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正如一个人在阳光下拼命追逐自己的影子，搞得满头大汗、精疲力尽，还是甩不掉身影。后来听到有人大吼一声：何不到树荫下乘凉呢？一坐下，环顾不但影子消失了，而且周遭凉风习习，好不自在！女儿呢，顺其自然、按其天性，不理数字，选择自己的爱好；因为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意识趋于淡薄。如果说当年

庄子还得靠“背负太山，翼若垂天之云”的巨鹏才能遨游世界，如年轻人仰仗科技手段，早已“绝云气，负青天”，走南闯北了，把移民等闲视之。

这对父女不论是务实任劳抑或雄心万丈，都离不开所生活的时代和所处的环境。早飞的亚洲四小龙和后起的亚洲巨龙，津津乐道的曾经是二位数或近二位数的经济成长。结果呢，父亲为二位数作了贡献，女儿则是二位数大环境中的成长者。父亲劳极而悟，女儿为理想而远走高飞。从两代人的人生选项中，也可窥见“以数字为本”的市场力量和金钱诱惑正逐渐失去往昔的光环。

有钱能为鬼推磨

“以数字为本”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GDP，一是劳动者，前者以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企数字为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不二法门；后者是与“治人者”相对的“治于人者”，被当成数字的无助群体。市场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是现代社会的写照。在市场无道德，钱能胜邪的思想侵蚀下，赌博、娼妓、淫乱已呈常态化。而无孔不入的市场力量，可以靠高额薪酬，购入高学历者、有才干者的青春、智慧和精力，像那位在金融界身居高职者。相比之下，他的女儿爱上无法量化的音乐，自然就就不被满脑子数字的贵人所重视。市场社会带着数字的魔力，如同天罗地网，把世人罩在其中，你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挣脱束缚，那是你的造化。但大多数人是认命的，或为高薪卖命，或在底层挣扎，或终生潦倒。然而，种种因素掺和在一起，斗转星移，被视作数字的群体与操纵数字的利益集团之

间的角力，出现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美国就是一个典型。这么一个曾经呼风唤雨的经济强国，经过30年的经济成长，竟出现1%与99%人群的鲜明对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oseph E. Stiglitz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序言中指出，美国正为不平等付出巨大代价。其实何止美国，我们和周边许多国家，不也面对同样的困境？

幸福源于平等

在经济阴霾的笼罩下，各国政治家莫不以亲民姿态为时髦，重提或重申“以人为本”的口号，宣称要执行为民谋幸福的政策和措施。孔子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两千年不变！以至上述诺奖得主，直至去年仍大声疾呼：低成长不是问题，分配不均才是！成长是以数字为本，大多数人的钱财和幸福，在利益集团的摆布，变得微不足道。如不缩小财富鸿沟，箝制利益集团，提升劳动者地位，实现平等，造福人群，那么，

“以人为本”的高调，终究是迷惑人心的邪音。近阅英国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名誉教授 Robert Skidelsky 撰写的《幸福就是平等》一文，其中颇多精辟的言论：如“增长不一定让我们更幸福”、“幸福的感觉更多是取决于增长的果实如何分配，而不是它们的绝对数量”、“少数人攫取了增长的大部分果实”、“更大的平等性不但能够产生更多安全感、更健康的身体等所带来的满足感；还可以带来更多休闲、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更多来自同侪的尊重，以及更多生活方式的选择所带来的满足感”。

看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来访的外甥，还有他那远走他乡的女儿，今后会想到、走到一起，共同为个人和群体的幸福而努力，最终实现尊重人权，展示尊严、自由、平等、幸福、和谐等真正“以人为本”的“人类梦”。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2013年5月1日摄于芳林公园 / 杨伟汉摄

强人政治与 强势政府



文：陆锦坤

以 笔者所观察，人民行动党自创党以来就本着“三个坚持”，挑选有才干，有品德及有理想的人脱颖而出为社会服务。第一坚持是“选贤与能”，被选出从政者要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有廉洁与公正的品德，不官商勾结，公器私用。第二坚持，是从政者都必须要有为民服务的精神。第三坚持，要有为国奋斗之意志及理想。过去，也因候选人能呈现这“三个坚持”，而取得人民信任，人民行动党才得以通过多次的大选胜利而继续组织政府，为民服务。

第一代行动党政府领导者对国家贡献是巨大的，他们绝大多数是属于前述“三个坚

持”之人物。但他们一生为国服务直到退出政坛的总收入，可能少于现时某些政联企业总裁一年的收入。

在当年的贫困时期，人民都向往有好的政治人物出现，为人民解决民生问题，甚至民权问题。第一代人民行动党的领导者不负众望，带领人民走上康庄大道，解决了大部分民生问题。这样勤政爱民的政府当然得到人民义无反顾的支持，而渐渐地演变为强势政府。

一个强势政府的形成，必须在强势领导者及其政务官(内阁成员)与事务官(我们所谓的公务员)，共同合作下才能形成一股强大执政力量，并在人民大力支持下以高效率执行好的

政策,以达至社会进步,最终获得大部分人民的信赖。这里所谓的政治强势领导者则是须靠民主宪政的制度,包括推行公正、公平的选举制度,及支持他的一群有使命感及有献身精神的人一起来推动其政治愿景,让人民感受到希望。

强人政治最终都付出代价

除非是军阀统治,强势政府也要必须依循制度,严守三权分立的宪法精神。由于强势政府在国会中拥有超过半数国会议席,因此能顺利且快速地通过一般议案,因此显得效率高。当强势政府在国会中拥有超过四分之三议席时,它要随时修改宪法条文以利其继续执政的话,有时也易如反掌。

因此,权力之大,如使用不当,后患可以无穷。若我们视宪法为政府与人民之契约,那么当强势政府拥有超过四分之三议席时,人民没有能力起制衡作用,则这份契约之实效就决定于强势政府领导者的政德与良知。但如果一个政府在国会虽有超过一半以上议席,但其议员具有强烈独立性格的话,执政党内部意见便常会发生分歧而无法有效整合,那么政府就必须以较长时间及力量去说服不同意见者,其强势也会因此而逐渐减弱。

在进步的民主国家,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议员,一般上有其言论的自由,在国会议决时,不一定都遵守党的立场来投票。有些民主国家,如果在大选中没有单一政党能取得绝大多数席位,而必须与其他政党共同组织政府,这种联合政府则通常难有强势作为,势必也难形成强势政府。

政治强人之产生则是强势领导者一步一步建立起个人声望,并再经过长期累积政绩,最终形成个人的高威望。

取得威望后,进而利用其权威及行政权来挑选自己的班底,并部署及掌控政府的各组织以取得超强执行权力,最终以“一言堂”之指令,根据其意愿推动社会建设。若这强人是廉者能者,当然有好的政绩。但自有人类历史的记载,人无完人,这种强人领导最终不免有错失而产生后遗症,并需付出惨重的代价。

从人性权力贪婪的角度而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所以,权力必须给予制衡。要是国会一党独大,而党内又缺乏民主机制,政府的决策就不可能受到应有的监督与制衡。如果又缺乏反对党制衡的话,具有强民意基础及高威望的权威政治强人,有时会因为要保持长期执政权力及其个人私利,便可能更会玩弄权术来达到目的。结果,社会弊端丛生,腐蚀国家辛辛苦苦多年来已建立起来的根基。

超出常理的伟大行为

在新加坡,由于行动党长期执政,成为人民依赖的政府,渐渐的有时难免有点过度自信而疏于倾听民意,与人民渐行渐远,人民有时不得不在无奈与妥协中生活。选举游戏规则之规定与改变不只让反对党不满,也让一些人民产生反感。人民觉得,既然被公认为好政府又一定能赢得大选执政,为何还如此怕输?其实,如此做法不只失去风度,也让人觉得好似有损诚信。

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世界上任何执政党都会或多或少利用其执政的资源优势及动用行政资源来吸引选票,不过一般上手法都较含蓄,否则成熟的选民会以“正义与公平”为前提加以拒绝。

长期以来,我们有个强势的政府。政府不只能轻而易举的通过任何法案,

也可以不费力的修改宪法。几十年了,大部分人民都习以为常。然而,经过2011年5月之大选,政治形势出现巨大变化,人民开始呈现出政治醒觉,发出声音。

其实,纵观近几年执政党的表现,让人民开始质疑,当前从政者是否个个都具有前面所提的“三个坚持”之素质。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是否有可能培养出一些有负众望的强势领袖,或理想的接班人?

如果说世界上没有执政党有义务去培育反对党,就如世界上没有父母亲不将自己的遗产留给自己儿女,一样是属于常理。可是,看看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中排名第四,身价超过520亿美元的美国“华尔街股神”华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吧。他订下遗嘱,把绝大部分遗产交到巴菲特家族基金会以从事慈善用途,而他们的三个子女只获得非常少的资产。这样的胸怀,是多么令人感动与敬佩!巴菲特认为,将遗产回馈社会只是伸张公平与正义的行为。又如美国国父华盛顿,拒绝连任总统,拒绝形成政治强人,而选择回归故里,都是基于社会与国家之长期利益,做出前瞻性的抉择。

换言之,这些伟人本着国家的长期利益及社会之公平与正义,而能做出超出一般常理的行为。我们是否也可以盼望,我国的政治领袖能如巴菲特与华盛顿一样,以国家持续繁荣、社会公平与正义为前提,而做出超越政党的创举?

近50年来的历史清楚的说明,只有在一个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才能培养出具有反思勇气的政治文化。也只有具有这种政治文化的社会,才能避免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

作者为怡和轩副主席



艺术何价？

与画廊业沾边近30年，最常被问及的是“艺术何价？”。这类问题随着艺术品市场化步伐的加速，变得日益突显和迫切。影响所及，在画展上，人们不是沉浸在对艺术品的欣赏，而是弓身翘首，双目咪咪地望着牌子上标示的价格。

一幅画、一件古董，到底是如何标价的？不仅是平日甚少关注艺术的人，就连从事艺术品行业的人，都常常要为之伤透脑筋。

画价扶摇直上

为什么两幅看似相近或出于同一画家手笔的绘画，价钱竟相差这么大？为什么报章常登载拍卖馆成交的天价？为什么几百年前的古画竟然一文不值？

一位友人十几年前花八千元购得吴冠中A4大小的速写《千佛洞》，在上海被人以人民币60万元（折新币12万元）被人拍走。

另一个客人十几年用了6个月偿清3万元的陆俨少8平尺山水画，2004年在上海以人民币180万元（折新币36万元）拍出。

不久前，本地一名收藏家出售吴冠中一幅8平尺水墨画，藏家一口价新币180万元，结果还是成功脱手。

还有一个藏家，4年前要以25万元出让他父亲留下的一幅8平尺徐悲鸿奔马，因5万元差价而“失”之交臂。不久前又想出售此画，开价竟高达300万元！



／文：谢声远

艺术何价在这里指的是艺术品的市场价格，由艺术品市场决定，与艺术品的自身价值是两码事。价格与价值的区别，对艺术尤为重要。在商业运作猖獗的年代，一幅画、一件艺术品的价格，并不等同其价值，而且往往南辕北辙，相距何止千里！

这些真实的事例，与风闻的或报章读到的更惊人、更目眩的数字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能同日而语。

艺术何价？确实是一个诡谲的命题。想当年，梵高连5英镑一幅画都无人问津的时候，他是何等沮丧，而今一幅数千万乃至上亿美元也不足为奇，九泉之下的他，应该更沮丧呢，还是兴奋呢？或者啼笑皆非？

必须解开的谜团

艺术何价又是一个不得不面对、不能不解开的谜团。初涉艺术者有机会来到画家寓所，或走进画廊，或置身画展现场，看中一幅画，对方开个价，我该如何应对呢？买还是不买？物有所值吗？这要看情况而定：如果是负责任的画家、画廊或画展主办者，标示的价格应当是比较专业和可靠的，近乎物有所值，甚至超值。如果碰上的是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之辈，那你可能会被宰了。如果东西是好的，买贵还不是大问题，买家往往因为贪便宜，而购入劣货或假货，那才够冤枉！反之，如果你本身就是行家，或得到行家的指点，不同画家、不同质量的作品，在价格上得到怎样的反映，你是心中有数，或者说，你对不同作品的价格浮动范围，是有相当把握的。

所以说，只要买卖双方，有一方是行家，艺术何价不是问题。明眼人遇到骗子，自有应对之策，怕的是瞎子遇骗子，上当又破财。也是十几年前，有个姓李的客人，经推荐在画廊买了一些好

画，可以说物有所值。后来误入歧途（也怪他本身不是行家），花费好几十万元大量收购“名家书画”，牢牢收藏。等他病逝后，妻子要变买藏品，只有几幅好画可以换回钱。明知所购“名画”是膺品，我也不敢贸然揭穿，只是婉转告诉她回到原址处理，过后她才透露那间店已关门走人，所有的损失也就无法挽回了。

艺术价格与价值

艺术何价在这里指的是艺术品的市场价格，由艺术品市场决定，与艺术品的自身价值是两码事。价格与价值的区别，对艺术尤为重要。在商业运作猖獗的年代，一幅画、一件艺术品的价格，并不等同其价值，而且往往南辕北辙，相距何止千里！许多艺术家，毕其生创作了富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但由于所处的年代不利他的发展，所产生的作品曲高和寡，一生郁郁寡欢。反之，有些极为一般的艺术品，因为画家有幸邂逅其实并不懂艺术真谛的贵人，借助商业运作，画价一路上升，直上云霄，把你我都抛入弥天大雾，摸不着头脑。当然，如果贵人恰巧又是行家，或者有行家指点，虽说炒作的天价并不反映真正的价格，但其艺术价值还是不可否定的。

所以说，艺术何价这问题是容易有个圆满的答案，我尝试给个比较符合艺术规律、实事求是，但难免稍嫌笼统的答案：在特定的时间点、环境和条件下，艺术品的市场价格应与艺术品的创造价值相一致或相近。

但是，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以为艺术的市场价格就是艺术的创造价值。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区，主要因为艺术的创造价值往往需要时间的检验（时代性）、行内专家的共同认可（经典性）、作品的含金量（积淀性）、画家的才华（独创性）。这样的共识有时在艺术家有生之年都欠缺（天啊，行家也成了瞎子！？），价格和价值的垄断权或话语权，就落到市场身上，特别是现代以资本为引导的市场。

市场化对价格的冲击

如前所述，市场是双刃剑，它标示的价格有时与价值相一致或相近，有时天差地别。其实，从艺术的诞生到市场化，有个微妙的转移过程。上古时代的艺术，原是人们在劳动之余，检视劳动过程如狩猎、捕鱼、种植，内心有强烈感受之处，便用不同的艺术形式，或壁画、或陶塑、或雕刻加以表现，它的价值在于让人们触景生情，重温劳动的紧张、喜悦和审美感受。这时候的艺术只有价值而无市场价格。多少年后，因为年代久远，它们或成为无价之宝，珍藏在博物馆内，或成为古董、古画而流入市场。于是，市场的机制便发生作用。艺术品一经市场化，各种正面的、负面的、美好的、邪恶的现象便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这里有正当的自然市场、有推动作用的人为市场、有造假的欺诈市场、有暴利的炒作市场。

正当的自然市场,可分为感性和理性两类。你可以是艺术的门外汉,一个偶然的场合,你对绘画发生兴趣,按你的喜好和能力从正当渠道购画,虽说是感性的,一般不会错到哪里。如果作为长期的兴趣,从中得到更大审美愉悦,你应该进一步提升到理性层次,对艺术有所认识,从而提高欣赏的水平和接近更好更精的艺术品。

利之所在 邪必生焉

关于有推动作用的人为市场。灰尘不扫不走,艺术品的价格不推不上。我认识一位本地正直而认真的油画家,六十年代每幅作品不过三五百元,多年画价不变,后来他自己规定每年上涨10%,等涨到过千,市场停滞不前,为了让自然市场恢复常态,下来10年不涨价。公元2000年后,由于受到中国艺术品价格暴涨的带动,加上本地画廊推波助澜,他的画恢复每年10%的涨势,而且销路越来越好。推动工作是艺术品价格稳健上升的必要途径,也是唤起人们关注艺术品的合理手段。时代在进步、艺术品水平在提升,在各方推动下,价格上扬虽说有人为因素,却是适宜的,对画廊、画家、藏家都有好处。当然,聪明的买家能够辨别什么是合理的涨价,什么是炒作性暴涨。

关于造假的欺诈市场。这类市场由来已久,于今尤烈。上文提到“数百年古画一文不值”,便是膺品,还有李姓藏家,去世后家人才发现上当受骗,损失巨大。利之所在,邪必生焉,这是造假欺诈市场存在的前提。市场上充斥假古董、假名画、假田黄,造假技术之高,可瞒天过海,甚至行家都无从辨认,更何况普通人。应对之法,一是弄清出处

(不轻信故事),二是高人指点,三是不懂不买,四是不贪便宜,五是不为名所欺。总之,艺术何价,宜以平常心待之,贼船在侧而不为所动,邪不胜正,如此而已。

天价背后的故事

关于暴利的炒作市场。人们往往分不清合理的天价和炒作的天价,前者因各种历史原因、艺术背景、稀缺因素、竞逐激烈而创下天价,但那是自然市场的一种反映;后者是有人背后操纵,制造天价假象,以获取眼前的或后续的暴利,这是非自然的炒作市场。但这类市场在各种公关(如名人效应、轰动新闻、吹捧逢迎)的配合下,最能夺人眼球。艺术何价的询问中,最经常被问及这种情况。我的回答是:你对这类艺术品有兴趣吗?没有。他只对天价有兴趣,我的见解是:如果是自然市场所形成的天价,可以剖析,以判断其合

理性;如果是人为炒作的天价,一笑置之可也。

自然市场形成的天价,有极其错综复杂的原因,但必定是缓慢的过程,绝非昙花一现,而且相关的艺术品接受面深广,市场支撑力量强大。如前文提到的徐悲鸿、吴冠中、陆俨少的画价,与40年前相比,也可说是天价。这些画家的作画历史,可溯及30年代,画价长期低下,直到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艺术品市场逐渐形成。公元2000年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艺术品价格才逐渐与艺术创造价值相一致或相近。近年来,随着艺术品投资意识的登场和增强,富豪、财团、机构大举进入市场,更多耸人听闻的天价还在后头呢!

重要的艺术品,很快成了大户的囊中物。被边缘化的小人物,徒呼艺术何价——一声声无可奈何的感叹!

作者为本刊统筹



学前教育VS 小学先修



一、学前教育教什么？如何教？

最近打开本地中英文报章，铺天盖地都在讨论学前教育，社会各阶层对学前教育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与批评，可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涉及到的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问题：“教什么”？“如何教”？学前教育是小学先修吗？是否应该由政府来制订政策性规划？或者由政府一手包办所有的幼稚园？



文：许福吉

“教什么”就是教学内容，“如何教”就是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是指有目标、有策划、有特定教材的教学活动；教学方法是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具体环节的理论、原则和科学方法。前者是行为过程，后者是理论体系。简单而言：学前教育从课堂学习、游戏到课外活动、体验，是一个多层次、综合性的学习之旅。

有人认为这种综合过程应该由政府、家庭、学校、教师、家长及学生共同完成，属于社会公益性质；但也有人认为学前教育的经

营模式，应该更加自由开放，让商业化模式参与进来，形成市场上的良性竞争，并产生社会效益。其实，学前教育的经营模式应该公益与商业性质两者兼施，即有教无类，又因材施教，提供和而不同，百花齐放的开放性的经营模式，让家长有更多的自由选择。

学前教育是否应该由政府制订政策性的规划？支持者认为，学前教育政策最好是由政府来操办，包括制订教学大纲、编写教材，解决“教什么”、“什么时候教”、和“教多少”的问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Kindergarten

Pre-school educa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lately. What should be taught in preschool classes? How should they be taught? I

The first question deals with the teaching content, while the second deals with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content is defined as teaching activities with definite goals, plans and specific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method involves incorporating specific aspects of educational theories, principles

and scientific methods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former involves a course of action, the latter a system of theories. In other words, preschool education is a multi-level, comprehensive learning journey that encompasses classroom learning, playing,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s.

Preschool education should be an integrative process which embodies the nature of both the social welfare and commercial models. This means the preschool system should be one in

which no child is left behind while catering to the learning needs of each child. It should be an open system that allows for harmony in differences and embraces diversity, and which gives parents the freedom of more choices.

Should our preschool education curriculum be developed by the Government as a matter of policy? Opinions differ.

Education is a systematic endeavour for lifelong learning. From preschool to golden years education, we never actually stop

题。普遍上，大家都认为新加坡的教育是全球品牌，只要政府参与创办幼稚园，并确定教学大纲和教材，一定可以让大家放心。教育部也将成立学前教育署，解决“如何教”的具体方法和技巧，并组织幼稚园校长和老师参加培训。但也有人认为这样只能解决部分的问题，家长、社会环境、学前教育企业等绝对都不能缺席，大家应该开诚布公讨论学前教育过去、现在和未来所面对的问题，对症下药，以避免很多情况重蹈覆辙！

二、胎教与教育起跑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系统工程，从学前教育到老人教育，我们其实一直活到老，学到老，学习和教育在我们一生其实没有停过脚步。

有人认为，人在母胎里来就开始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提倡“胎教、早教大有用论”。不少专家著书论述，不但肯定胎教的重要性，还畅述怀孕父母如果用心和胎里的婴儿互动，例如念诗、读书、说道理给婴孩听，他们出世后

可能比别的小孩更加聪明。初为人父母都是很兴奋的，有时候甚至兴奋得手忙脚乱，不少年轻的家长其实都期待和胎儿互动，他们不会怀疑所谓的胎教，只是不知如何下手落实。

现代医学发达，生活环境优越，每一位孕妇都有很专业的妇产科医生照顾，这使到年轻夫妇放心也安心，相对于医学的检查和照顾，胎教显得次要。其实“胎教”最早的基本含义，是让年轻的父母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遵守一种心安怡和的行为规范。

《颜氏家训·教子》中就说：“孕妇怀孕时应该目不邪视，耳不妄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强调心理平衡和谐，性情愉悦。

朱熹在《小学集注·立法》中也指出：“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跛，不食异味……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过人矣。”

康有为的《大同书》也说：“天下之人皆出于胎，胎生既误，施教无从。然而胎教之地，其为治者之第一要地”。

这些古今哲人智者，为什么都会提及胎教的平衡呢？这与儒家的积极性和活在当下有关。儒家一直以来，都特别注重教育与学习，强调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在于春。”勤奋、提早准备、早教、早学等，也就成了启蒙教育的起步点。

三、起步点：先调教，后快乐

在新加坡这个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大部分的家长都是怕输的，特别是精英分子和中产阶层，他们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更早地发掘孩子的潜能，更好地为孩子的美好未来铺路，为学习奠定基础，他们到处寻找适合孩子的课程，和孩子一起携手同步学习。

这样的家长是让人尊敬的，所谓“天下父母心”，他们关心孩子，只要不是矫枉过正，因噎废食，提早为有能力的孩子的准备美好的未来，该携手、扶持的时候携手、扶持，该放飞的时候放飞，这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三至六岁的幼童，是吸收知识最好的黄金时期，所谓“先调教，后快乐。”年轻的父母得为孩子筛选和淘洗坊间

learning as we grow and age. Some people think that one should start learning while in his mother's womb, which is why some people advocate "prenatal education" or the efficacy of "prenatal learning theory".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modern society like Singapore, most parents have become averse to 'losing out', especially among the elite and middle class. They are afraid their children will be disadvantaged even at the starting line, and so, in order to develop their children's potential earlier and pave the way for a better future, they seek to lay a firm foundation for learning by seeking out suitable courses for their children and learning together with them.

It is not wrong for parents to care about their children, as long as they do not overload them with what they themselves think is good for their children. By all means, give able children a head start to prepare for a better future, hold and support them when needed, let them fly when it is time. This is part of life after all.

Recently a number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wrote in to the press to explore how to improve pre-school teaching in Singapore. They felt that th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courses and activities in pre-school classes were found to be not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enough in terms of their design and development. Some kindergarten teachers would even photocopy materials at random for the children to

use, demonstrating a complete lack of a system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methods. Preschool classes's teachers are paid relatively low, which may explain why many kindergartens find it difficult to recruit good teachers. It is hoped that the new regulatory agency that is being set up can help the pool of preschool classes's teachers in real and practical ways to upgrade their qualifications, thereby improving preschool education standard..

Teaching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akes place mainly in kindergartens. For this reason,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very simila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ole of

五花八门的各种课程，他们应该了解孩子，看孩子的能力，才能让孩子真正体验到学习的快乐！

通过游戏和兴趣，才能真正理解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孩子的智能与发育也才能同步前进。幼稚园可以成为孩子与社会间的桥梁，许多父母都希望陪伴孩子一起长大，塑造他们良好的人格与价值观，使孩子成为将来能独当一面！

四、幼稚园教育不是小学先修

曾几位幼稚园教师，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探讨如何改善本地学前教育，他们认为学前华文教材、课程和活动，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的设计与制定，有些幼稚园的老师，还随机影印教材给孩子用，缺乏完整的教材和教学体系。学前教育从业者的薪水偏低，许多幼稚园找不到好的老师，希望接下来设立的新管理机构，能具体协助老师提升学历，提高学前教育水平。

学前教育的主体教学在幼稚园，教师和校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各国对幼稚园的解释非常相似，英国对幼儿园的诠释为“用实物教学、玩具、游戏及

发展幼儿智力的学校。”德文的意思是“尚未进学校的游戏学校。”幼稚园以游戏为主要活动，通过活动逐步进行有组织的作业，如语言、美术、音乐等，并注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人格素质。

幼稚园教育作为整个学前教育体系的基础，是对儿童进行预备教育，但不是小学先修班，它能提早培养孩子的健全性格、良好的习惯和基础自然与生活常识，并在此基础上，就儿童的观察力、想象力、记忆力和创造力等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为儿童未来的小学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幼稚园的任务是让幼儿身体、智力和情绪得以健康发展，并快乐地度过童年时光。孩子在幼稚园不仅通过游戏学到知识，而且可以接触集体生活。

儿童天生具有吸收性心智，我们不要低估孩子的吸收力与能量，他们能环境中自己学习、自己克服、自己成长。孩子的吸收力与能量超乎我们大人的想象，陪伴孩子一起成长、茁壮，在整个过程中，父母和教师，也跟着变成更善良、更仁慈的善人。如此美好的教养历程，没机会体验的家长会后悔一生。

前些时候有一本书《我们得回到幼稚园去》，写的是现代父母都应该有孩子的的儿童观，与孩子一起回到幼稚园上课，通过了解孩童的生活秩序和规则，寻求到自身的完美，这些规则包括分享、合作、友好、礼貌、爱心；向他人学习，帮助别人；谦虚，礼让，积极向上；诚实，勇敢，说话算话；自己的事自己做；用完东西放回原处；爱护公物，不浪费粮食；做事有始有终；爱护环境；有时间观念；有错能改；遵守纪律；能分辨是非等等。

理想的学前教育成果，应该是上述这种人格素质的培养，处处与他人分享、替他人着想；对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善于思考，并能表达自己的见解，养成良好的习惯与价值观。每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童年，错过了良好的幼稚园教育，再回来肯能是孩子或孙子的幼稚园了，我们的学前教育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否能成功？就让我们大家耐心地拭目以待吧！

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the kindergarten. In Britain, the kindergarten is "a school that employs object lessons, toys and games to develop the children's intellect." The German definition is "a play school before entering the school." Kindergartens use playing as the main activity, in which children take part in activities that gradually introduce organised work such as languages, art and music, while focusing on developing good habits and personality.

Kindergarten education forms the basis of the entire pre-school education system which provides preparatory education for the children, but it is not a primary school preparatory class. It can provide an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ren's character,

good habits and basic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everyday life. Building on this basis, the children continues to develop their sense of observation, imagination, memory and creativity, which would be used to stimulate their desire for knowledge, thus laying a sound foundation for children in their primary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The role of the kindergarten, therefore, is to encourag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young children physically, mentally and emotionally, while enjoying a joyful childhood. Not only would the children in kindergartens acquire knowledge through playing, they would also have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a community.

Children are born with a sponge-like mind.

We should not underestimate their ability to absorb and the amount of energy they possess, for they can in fact learn, overcome and grow in their environment all on their own. Their absorbency and energy level is far beyond what we adults can imagine. By growing and blooming along with their children, parents and teachers will also become kinder and more benevolent in the process. Parents who do not have the chance to share in such a wonderful parenting experience will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fe.

The above is an abridged version of an original article written by Assoc Prof Koh Hock Kiat in Chinese.

创校人这番话……充满性灵的启示。尤其是“脱然无累”四字，画龙点睛，说明任何政策的设定，必须要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鼓足毅力与恒心，一以贯之地实行，才有希望修成正果。

双语教育本受欢迎

本人所受的“双语教育”是很单纯的，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考入了本地一所教会学校公教中学。学校创办于1935年，创始人劳爱华神父以中英双语阐述了他的办学方针，中文版是这样的：

公教中学好像双轨火车，中英并重，脱然无累，直向它的目的地驶去，谁跟它走的，真是幸福，必能获得健全的教育。

对我来说，创校人这番话就好像每天早晨上课之前念的祷告一样，充满性灵的启示。尤其是“脱然无累”四字，画龙点睛，说明任何政策的设定，必须要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鼓足毅力与恒心，一以贯之地实行，才有希望修成正果。

今年2月初，应邀到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参与一个翻译研讨会。两天的盛会由艺术之家和语通翻译有限公司(Interlexis) 联办，从翻译课题，节外生枝地谈到了新加坡的双语教育。

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浮沉

双语政策向来被视为新加坡教育的基石，也是耀眼国际的一个骄傲，但研讨会主办者却反映了他们的困惑：既然政策是这么重要，为什么实施多年以来，本地学子的“母语”程度却节节败退，而新加坡人最终无可奈何地以区区一种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作为本土的认同？

在中英文报界与媒体工作多年的本人，对这个疑惑感触良深。学术研究显示，建国以来，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其实是一个调整得最频密，更动得最厉害的政策之一。在多年来不断提出的检讨与修订声中，双语教育政策成为众矢之的，官方也形容它是个“移动的靶子”(a moving target)。最后，双语教育这头“圣牛”，于是推向了屠宰场。

母校旧址在奎因街222号，在若干热心校友的坚持下，建筑物以及具有特色的文物得以保留。旧地重游，发现学校牌匾上的英文名称，翻译过来便是——“华英天主教学校”。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这是母校原装的牌匾。校史阐明，“鉴于当时新加坡好多学校都以‘华英’二字为校名，校方便向教育部请准将‘华英’二字删去，改为今名。”

校名重订的这段小插曲，说明了新加坡殖民地时代教育界的思维，“双语教育”受到办学者、家长和学生们的普遍欢迎！创立于1886年的ACS通常被人指为“大英主义”，说它歧视华语，要知ACS全称为Anglo-Chinese School，是实实在在的英华学校。



文：莊永康

政策反映了社会实况

新加坡成为一个国家之后，其双语教育的政策，由1965年独立时的政府琢磨敲定。当时的总理是李光耀，教育部长是王邦文。

固然，政策的制订与执政者个人的思维和视野有关，但从宏观上看，政策却又是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社会需求、舆论压力等等实况的折射。不难想象，建国初期的双语教育政策，是新加坡经过英治开埠，而后的经济萧条、种族紧张、独立运动等历练的积累沉淀。

建国之初，认定教育的目的并非光为了技能的训练，而须用来“培养国民团结精神”。因而，四种官方语文的教学在师资和待遇方面享有同等待遇。

政策也设定，从1966年开始，所有中学生必须选修“第二种语文”，即华校的英文、英校的华文都是必修科。新加坡若有双语教育政策，这才是一个基础。

高等教育方面，新加坡大学复办马来文系，中文系则有所加强。南洋大学学位在1968年开始获得政府承认，南大毕业生可以申请成为公务员。如果你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便能体会政策影响的深远。

语文教育不断失衡

那么，双语教育这头“圣牛”，为什么会在建国短短的二十年后，就拖拖拉拉地走上屠宰场？据我观察，最重要的潜在原因是，新加坡历来的经济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土生者手中，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以英语成家，土生华人在家中说说方言，就已很满足。他们反而认为，学校逼他们的子女学华文华语，影响了升学的前途，是不公平的。要是政府“逼人太甚”他们甚至恫言要移民。

舆论压力的倾斜，导致语文教育的失衡。学者也指出，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加坡大力提倡工艺教育，政府也特别注意当时教育投资的“耗损率”，也就是学

生考不及格与辍学率的增加。教育体制大幅度改革，着重“因材施教”，分流制度便在此情况下诞生。

面对难题而实行教育改革，或许有所必要，但这里有个副作用，就是双语教育这块“基石”受到责难：认为小朋友考试不及格，是因为被逼学习双语所造成。逼孩子念母语，成为原罪。华文教学法枯燥，华文老师乏味，这些指控大家都耳熟能详。

到了八十年代，新加坡教育的成效曾提呈给美国研究机构作专业检讨（从国家图书馆或其他资料处不难翻查这些学术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双语教育要是两头不到岸，后果是灾难性的——尤其是通往工艺与科技的英文。这促使了1987年新加坡全国学校统一以英文作为主要教学语文政策的出台。

在此大一统政策之下，固然仍设有“母语”一科，但其重要性逐步削减，每况愈下。迄今，也经过二十多年了。在此教育制度下，产生了新生的一代。既然“母语”可有可无，我们干吗还要念呢？我们又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干吗要念中文？他们问。

于是，我们也产生了蜂拥到演说角落，手扛英文标语，高喊“新加坡人的新加坡”的一群。有人认为，这些是心胸狭窄的“排外”者。其实我是很同情他们的。因为他们自己并不明白，源远流长的地道新加坡人，对语文教育，对掌握两种、或多种语文的能力，是十分重视的。要是新加坡人的认同只在说Singlish，那么他们不只是“排外”，而同时也在“排内”。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
现自由撰稿人



新加坡公教中学的英文名称，原本是“华英天主教学校”。/ 莊永康摄

社团的韧性与再造

社团除了是个团结、凝聚同乡宗亲的核心组织，也是成功者施展领导才能、彰显成就地位、光宗耀祖、回馈族人的一种方式途径。传统上，能当上会馆领导人意味着事业有成，有能力帮助同乡或宗亲。传统上，社团领导人要舍得出钱出力，才能赢得族人敬重。



州人在新加坡人数极少，最近却惊讶发现，目前只有130名会员的雷州会馆，竟然在本地延续了120年。会馆的韧性叫人刮目相看。



文：谢燕燕

走访雷州会馆时还解开我脑海里的历史文化谜题，我总算对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苏轼）和其弟苏辙被贬时、相携同行的目的地雷州有了具体地理概念，另外还厘清南宋灭亡之际、宋王室流亡地硃岛之所在处。原来硃岛在雷州湾。有了新认知，雷州不再是抽象历史名词。

鲜为人知的雷州会馆，让我看到本地会馆的特性；它在凝聚乡亲宗亲的同时，还深具文化历史内涵。扎根于族群、宗亲之间的会馆，生命力极其顽强。

有一年到越南中部的会安古城自由行，发现那里的华人会馆、原来是古城最珍贵的旅游资源，是重要观光景点。会安最有看头、最具历史与年份的建筑物和族群历史，就隐身在当地的福建、潮州、广肇、琼府、客家、五帮等会馆中。这些至今仍留在原处、保留着原貌的会馆，承载着一部部华人移民史，也构建了今天的会安城。

又有一回到槟城乔治市出差，发现那里的重要旅游资源同样是会馆——建于1828年的惠州会馆、创立于1855年的潮州会馆（又名韩江家庙），雕梁画栋美得叫人屏住气息的龙山堂邱公祠，设立年代无从考据、但至少拥有同治九年牌匾的海南会馆等。

这些百多两百年来、默默矗立在街头巷尾，见证着当地华人社会历经各种变迁的会馆、宗祠、家庙，不仅为所处城市增添丰富人文景观，更对会安和乔治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观过会安和乔治市的会馆街，再回看散落在本岛各处的200多家地缘、血缘会馆，不难发现这些会馆虽相隔数百、乃至数千里，但大家草创年代相去不远、创立背景大致相同，老祖宗又都来自相同地区——潮州、福建、广东、海南、客属地区等，以致创立会馆背后的那套思维模式，可说同出一辙！

会馆创立年代从明末、清代，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是早期中国人下南洋或移居海外时所留下的历史产物，属于某个特定年代和特定历史时期。即使到今天，本地新移民也还在沿袭同一作法，设立天府会、天津会等。

会馆背后的精神支柱，是宗族同乡往外迁移、面对陌生而又艰苦的新环境时，发挥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团结精神。具体运作是由成功者登高一呼，再集合众人力量组织会馆社团，靠群体力量照顾弱势同乡或宗亲，与此同时供奉家神宗庙，维系作为海外游子的身份认同，把家乡的文化、价值观、信仰、习俗等倾注在会馆这样一个组织里。

社团除了是个团结、凝聚同乡宗亲的核心组织，也是成功者施展领导才能、彰显成就地位、光宗耀祖、回馈族人的一种方式途径。传统上，能当上会馆领导人意味着事业有成，

有能力帮助同乡或宗亲。传统上，社团领导人要舍得出钱出力，才能赢得族人敬重。

本地会馆组织健在

新加坡虽没有会安古城或乔治市那样具有“看头”，足以成为旅游资源的会馆建筑群，但会馆组织依然安好健在。大大小小、血缘地缘的会馆分布在全岛各个角落，是传统“华社”重要组成部分。

本地会馆社团在漫长岁月里历经一批又一批不同的领袖。遇到有魄力、有见地、高瞻远瞩的杰出领袖时，会馆便壮大发展，甚至在英殖民地时期充当社群本身的“政府”，从扶贫济弱、兴学办校、调解纷争到建庙设坟地等，一一操办。遇到人才凋零时，会馆则蜗居一隅，但求生存，等候他日出现新转机、新机遇。

早期会馆通常要解决的问题是置产建会馆，作为同乡、宗族聚会、议事场所。另外便是设家庙或立宗祠，让精神有所寄托。再来便是购地辟坟山，让客死他乡的族人能入土为安。随着会

馆组织日渐完善，一些会馆也办起学堂，从教育着手、改善后代生计问题。

数十年、甚至百多年下来，不同会馆社团有着不同际遇，有的会馆领导人善用资源、懂得投资置产，累积了可观资金或庞大资产，在社团之中富甲一方。

但绝大多数本地会馆依然小康，守着老祖宗留下的一点产业谨慎度日。目前最流行的一种作法是把部分祖业分租出去，换取租金作为会馆运作经费。

早期先贤中不乏具有远见，懂得集合财力、为自己所属会馆或组织置产和累积资源，为会馆长期发展奠下深厚基石的精英型领袖。这类领袖具备长远投资眼光，原因是他们本身就是成功商人。

祖业成了“祸端”？

“阿公”留下来的庞大资产，好好被用是极其可贵的资源，更是会馆一大优势，因为有资源方能办事。但庞大祖业和资产，也容易成为展开争夺战、争吵不休的“祸端”。

历史遗留下来的会馆组织，虽经过许多先哲不断完善改进，还是无法做到全无纰漏或毫无缺失，更难以避免纷争的出现。会馆爆发纷争，两派人马纷争出现火花四溅的激烈场面，时不时发生。

去年更是纷争特别多的一年，从潮州八邑会馆与潮州总会的口水战，海南会馆的激烈选战，到茶阳会馆两派分歧浮出水面，还有丰永大开发祖业时所出现的问题等，是风起云涌的一个年头。

会馆纷争也是一种“政治”，有强人压阵时纷争少一些，如果持不同看法意见的派系“势均力敌”，便容易形成“对立阵营”，出现“分裂”局面。

换个角度看，会馆纷争层出不穷，意味仍然有人愿意“争”着当会馆领导人，说明它依然是身份地位的一种肯定与认同。但明眼人不难发现，闹纷争的通常是有资产、有影响力、有一定规模的会馆。

如果有德高望重、能得到会员压倒性支持、完全能服众的强势领导人，纷争便相对少。但如果大家势均力敌、又



对治理会馆事务持不同看法和意见，就很容易形成不同派系、然后各自招兵买马、选举时斗来斗去，吵吵闹闹、甚至恶言相向、互相攻击，最终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

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领导班子，面对众人诸多要求，诸多想法，甚至意见相左时，想要放手搞好会务，把活动办得出色，恐怕还真不容易，最终只能战战兢兢、但求无过，很难有所发展。

吵吵闹闹的事层出不穷，也会让年轻后进，以及有才干、有想法的人，对参加会馆一事望而生畏。想做的事还没开始，先得花时间精力去打场“内战”，胜出后才有话语权。即使争到话语权，也还是要面对败选一方的“挑战”，于是又变得战战兢兢，步步为营。

说实在的，愿意出来当会馆领导人犹如愿意出来参选从政，除了预先具备一定条件外，更需要一定勇气和决心。要赢取族群的敬重与认可，还有随之而来的地位与威望，最重要的是必须有服务族群的献身精神。

思考会馆的再造

会馆在草创时期，动机目标明确，动力强劲。但是数十年、乃至百多年后的今天，原先的目标变得模糊，动力减弱，加上时代不同、大环境出现巨变，新思潮冲击着旧想法，百年会馆的组织虽健在，却急需重新思考目标和定位，寻找生存下去的新动力。

今天的会馆，已无需扮演族群“政府”的角色，不过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会馆草创时期那种帮助弱势族人的精神，却依然可发挥作用，特别是那些有资源、有能力的大会馆。不过要怎么帮、如何帮，才能帮得其所、帮得到位，则考功夫和考智慧。

关于会馆下来的使命，基本上已有一些共识，那便是发展教育和传承构建文化这两大块。发展教育是会馆所擅长的，福建会馆这方面的成就便有目共睹，其他会馆也有各种奖助学金、贷学金计划，帮助会员减轻教育子女的负担。

通过教育提升族人生活水平，拉近差距，确保社会阶层之间保有流动性(Social Mobility)，让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有机会向上提升的想法，早就根植于华人社会的思维模式里。想用会馆资源来资助教育这一块，一般不会有太多阻力。

认真思考构建文化

反倒是文化传承和文化构建这一块，对会馆而言是较新的领域，尚有很多可探寻与发挥的空间。但由于会馆领导人传统上以商人，而非文化人为主，新加坡社会又刚从基本求存状态迈向富裕，对文化的意识与认知尚嫌薄弱，很大人还普遍认为文化艺术可有可无，把资源用在这方面是一种“浪费”。

如果会馆领导人也持这样的心态和看法，传承和构建文化这一块就会继续流于表面，只是一种口头奉承，却不可能有实质进展、更不可能做得出色或做出成绩。

其实，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很多传统艺术正面临式微、甚至失传的厄运，而族群的历史文化亦有被完全遗

忘、从此被掩埋之趋势。会馆恰好能在这方面做些事，动用部分资源，起来好好捍卫、传承和发扬自己的传统艺术，或者请专家学者带领有兴趣的会员，深入挖掘、整理自己的历史文化，为后人留下宝贵记载与文献。

文化构建涉及一个族群的精神面貌和身份认同，文化底蕴越深厚便越有自信，也更能赢得他人的敬重。

关键在于着手构建文化时，不能再以敷衍、马虎和草率的方式待之，只做到门面功夫，完全不在乎素质与水平。会馆属下的文化艺术团体，如果总是流于玩票性质、业余水平，试问谁愿意来捧场观赏？又如何谈得上捍卫与传承自身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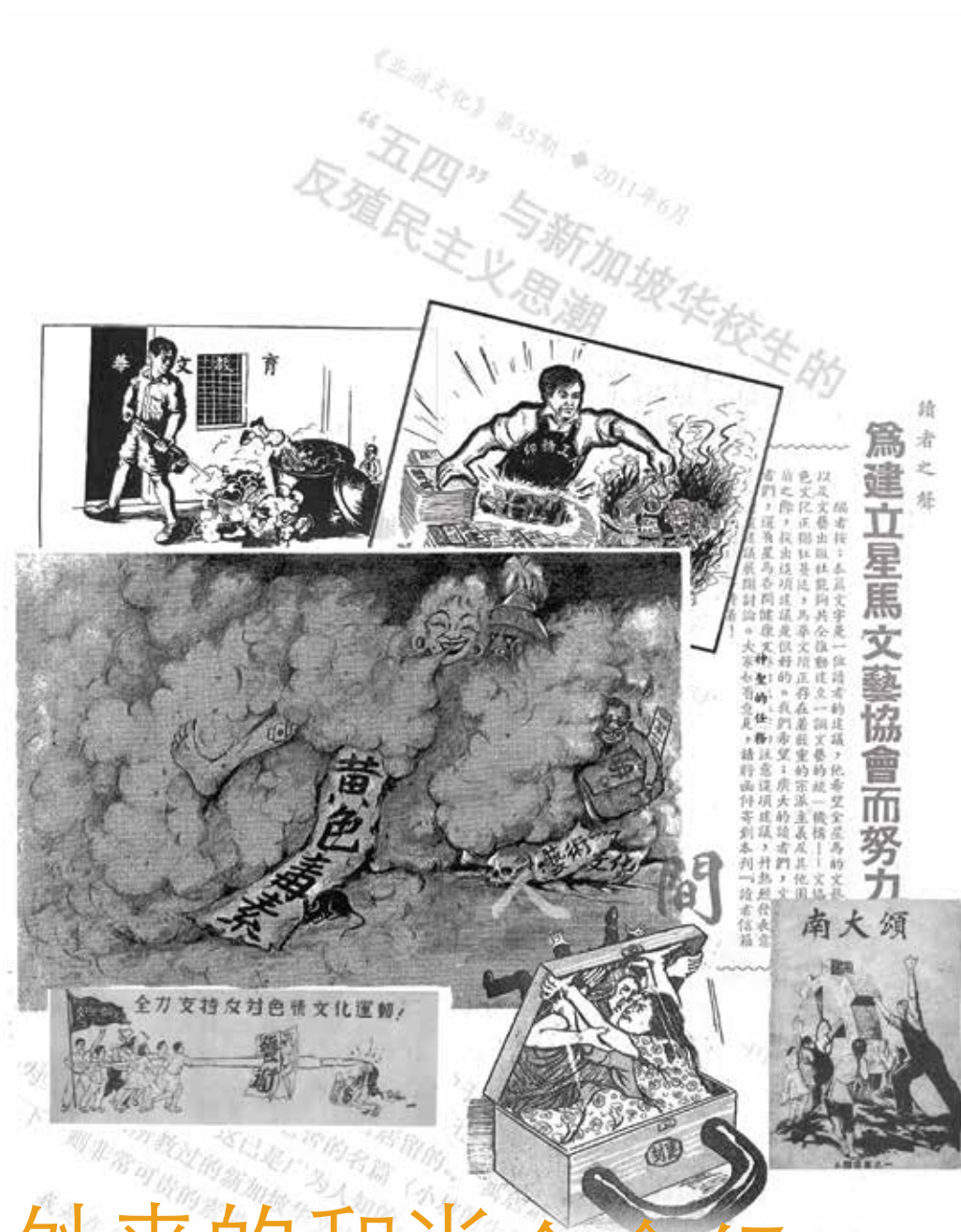
本地会馆很乐于逢庆典便出版特刊，好留下历史记录，但如果全是些东抄西抄，没有任何学术含量的吹捧文章，



只怕大家拿过后手便想丢弃，嫌它占地地方，又如何谈得上收藏价值？

要传承和构建自身文化，首先必须学会尊重文化，尊重历史，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一课题。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文：柳 舜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从新加坡“文化史”蒸馏出十个关键词，这就是：《叻报》、儒教、汉诗、《新华百年史》、南洋大学、南洋华文文学、多语剧场、越界创作、“孤岛遗民”和新谣。

他在“解构”了华族文化之后，抽出的十个关键词中，多处重叠且互为因果。叻报/儒教/汉

诗/南大/华文文学这几个词，源头只有一个：华族的传统文化、教育与信念。至于多语剧场/越界创作/新谣等等，放在时代性的冲击和演变过程去观察，其涉及面并不辽阔，影响也不显著。

新加坡（一度涵盖马来亚联邦、沙砂汶等地）在自治、合并、独立前的华族“文化史”简约的论述，分为两部分：

一、五四运动前——刊印书报启迪民智，办私塾传授儒学，同时宣扬伦理和待人处世的传统道德。

二、五四运动后——报章舆论兴起，举足轻重；民办中小学教育逐渐普及并获得民众拥护；进步的、科学主义的新思想迅速传播；五四精神感召的民主、自由、革命的新思潮愈演愈烈，蔚为主流，促进了原为殖民地的新马地区走向独立建国的新生道路。

独立前华校广泛采用的课本，不乏中国历代的经典古文和古诗词；当中的白话文选文，绝大部分取自五四时期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

二战前后华文文学作为华族文化的重要堡垒，在政治压力下防守维艰，出现几度低潮和高潮。二战后本土意识强化，大批本土作家艺术家出自华文教育源流。随着南洋大学的一整页战斗史，南大影响、淬炼并提高了新马各地的文学创作水平，成为中国两岸三地之外一处根深叶绿的茂林。

关键词之一“南洋大学”，可说是华文教育在新加坡（以及当时的马来亚、婆罗洲等地）经数十年抢救、斗争的辉煌战果。智勇双全的华人首先决定立足当地，服务这块土地和各民族人民；为了这项长期的目标，华人始终不饒地捉紧各种机会争取公民权。缺乏高素质的民族是长不大的民族，选择唯一的殖民地英文大学虽然照样获取知识，却很容易丧失民族的脊梁，隔绝于丰饶的民族文化门外。在多方面考虑、集思聚力之下，新马华社发出共建南大的号召，一呼百应，回声遍及全球华人居息的地区。

南大由华人集资创办，以华文为主要媒介，然而并重英文、马来文与世界优秀语文。南大抱定本土观因而欢迎异族学生。南大培养学生继承优良的文化传统、哲学思维、儒家道德，然而不遗余力地撷取新科技与尖端知识。中西并重造就南大生出类拔萃，叱咤世界各地，显现一派独特的人文修为、政经才华和做人做事的分寸。

不拘泥于“关键词”，概要地分为五四前后两时段，似乎避繁就简，但本区域格于文化、政治、经济的樽俎折冲，受限于历史残存的“基因”和病变，形成今日新马殊途同归又各寻出路的态势，恐怕只能“择其大者”加以评析。研究片叶的脉络，不如查看树根至树顶的全貌，摸清枝叶的来源与性格。

五十年代（1953）由知识界、小市民、工会、民间团体广泛推动的“反黄运动”，掉在十个关键词之外，令人诧异。从1948到1953文化界陷入沉寂，颓废和色情的低级趣味的书报充斥市面，荼害青年身心。由舆论界积极声援，反黄通过“反对”黄色文化、“建设”健康文化的双轨道，为塑造至少一整代有为青年、进而抗英建国取得了成效。同时，反黄运动开展蔓延，促使青年学习文艺创作，写剧本，写歌曲，投入音乐艺术舞蹈的专业训练。可以断定，没有文化史上的反黄，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冒出的许许多多文化界精英，相当可能尚未走出娘胎。

提到多语剧场、越界创作、新谣……，无非大花园里一株丛灌木，大海上的一朵浪花。它们既不是“运动”中的主流，也构不成历史的奠基石、历

史进程的主轨主线。只是一群人在时代的某个转折点，由于寂寞也由于兴趣，想突破谧静的氛围干点热烈的、能激发年轻人参与的、解放年轻人创造力的“大事”。随着学业完成，兴趣转移，各奔前程，青年时期的“理想”大多逐个转软。

“文化史”如果是一系列“满汉全席”，台面上的汽水酱醋花生，很难分享佳肴美馔的荣誉。这纯属作者的看法，不求人人赞同。

超过百年《文化史》甄选出十个关键词，正如前头所说，有些状似一个小浪花，不成其为排山倒海日以继夜奋勇向前的狂涛巨浪。对当地文化史具实质意义，其贡献历历可见的“名词”和“关键词”，下列几个足资参考：

华校董教总维护华文教育运动
南洋美专
艺术剧场
武汉合唱团/中艺
中学戏剧会/文娱公演
……

还有前仆后继的文艺刊物，报章文艺副刊；还有由中华总商会陈六使领导的、奠定本土意识的“争取公民权运动”（终于获得成功）。没有公民权，没有本土观念，文化会是目前这个样子吗？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春风化雨九十载

笨珍培群独中扩建任重道远



文：李文辉



新加坡前往笨珍，陆路也好海路也好，不过区区个把小时。1942年日军登陆新加坡，笨珍县内的甘榜和渔村是新加坡人避难的大后方。二战后，在笨珍还没有自己的华文中学前，笨珍的小毕业生都到新加坡升学。五六十年代新加坡政坛风云人物林清祥虽在新加坡出生，二战前后也曾在小笨珍接受小学教育。新马分别独立前，新加坡是笨珍青年追梦的地方。直到今天，很多年长的新加坡人谈起笨珍，乡情浓浓不减当年。

笨珍总人口约155,500人，其中华裔人口仅有41,700人，为了让子孙后代能有机会接受母语教育，他们兴办了一所又一所的华文学校。本文从笨珍的风土人情切入，籍以勾勒小镇社稷为维护民族教育所走过的坎坷路程。

笨珍，小镇风情与华教概况

笨珍位于马来半岛柔佛州的西南岸，地处偏壤，西向马六甲海峡，背为蒲莱山，境内多平原，适合农业发展。该县分为大笨珍 (Pontian Besar) 和小笨珍 (Pontian Kecil)，辖区包括北干那那新村 (Pekan Nanas)、文律 (Benut)、龟咯港脚 (Kukup Laut) 及咸水港 (Kg. Air Masin) 等地。

龟咯是笨珍较早开发的地方，它座落在笨珍南隅，当地人早期多从事渔业。随着时代变迁，龟咯港脚与毗邻的咸水港之居民转而从事海产养殖与旅游业。旅游区最大的卖点为海上度假屋、品尝味美海鲜佳肴、参观红树林与海上养殖场，以及地方特产如峇拉煎 (belacan)、虾仔脍 (cencaluk) 等，成为国内外游客休闲的



小笨珍街景

放眼世界，马来西亚是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四地以外，唯一拥有小学、中学及大专院校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堪称是项奇迹。而奇迹背后，有其坚持，悲壮与忧患，斑斑血泪，书不胜书。

胜地。而丹绒比艾 (Tanjung Piai) 是亚洲大陆最南端的最大红树林湿地，也是名闻海内外的旅游景点。

19世纪值柔佛港主制度推行之时，北干那那郊区曾零星散布着数个华人拓殖的聚落。20世纪交替的最初20年间，柔佛港主从事的甘蜜业没落，代之而兴的是橡胶业和黄梨种植。早期北干那那以黄梨种植闻名遐迩，使笨珍成为全马最大的黄梨种植与生产地，是国内外著名的“黄梨之乡”。1980年代，北干那那的黄梨种植业因各种人为与环境因素而步入夕阳，惟昔日兴旺景象依然叫人怀想万端。

20世纪初期，大笨珍和小笨珍开始发展起来。大笨珍早年原比小笨珍繁荣，然而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作为交通枢纽的小笨珍，东南接新山 (Johor Bahru)，北连峇株巴辖 (Batu Pahat)，取代了开埠更早的龟咯与大笨珍，成为商业与行政中心。

小笨珍市区有许多颇有名的美食，

旅居异国他乡的笨珍人，总不会忘怀伴他们成长的特色云吞面，以及辣沙、肉骨茶及西刀鱼丸面等。笨珍亦拥有鱼虾之乡的美誉，许多新加坡人总爱在周末到笨珍巴刹选购大鱼大虾，逢年过节，斗底鲷与大虾更是他们的最爱。

追本溯源，华人在这片祖国南方的土地扎根之后，为了让子孙后代接受母语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千秋大业而兴办了一所又一所的华文学校。华文教育的种子便在这块土地上萌芽，抗拒着法令与人为的压制而茁壮成长。从1921至1952年，笨珍各地前后兴办的华校有乐育 (包括6间分校)、培群 (一间中学、另两间小学)、大同、耕文、启蒙、修文、培侨、中华、启智、建华、黎明、培华、民众、乐山、侨民、南马、育民 (总校、分校)。

在这些华文小学中，唯独培群，一步一脚印，历尽沧桑，而于1951年发展成为笨珍岛内唯一兼有中学和小学的华文学府。

培群，九十载默默耕耘

培群独立中学的历史，可以远溯至1922年，先贤余英伟在笨珍张江水街所创办的培群学校。

1951年，培群学校增办中学部，称“培群中小学校”。作为当时笨珍最高的华文学府，培群这一文化教育摇篮孕育了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他们在国内外的政经文教界，皆有不俗的表现。

1961年，企图扼杀华文教育的《1961年教育法令》规定：自1962年起，马来亚只有两种中学，即完全津贴中学 (以巫语教学的国民中学及以英语教学的国民型中学) 和私立中学 (放弃一切政府津贴)。而国民型中学教授华文的时间也被缩减为三分之一。

当时，马来半岛原有的七十所华文中学，其中有54所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其他16所则选择放弃政府津贴而成为民办之华文中学。稍后，一些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由董事部另设独立班 (或称为“独立中学”)。面对改制的冲击，华文中等教育濒临灭顶的死亡边缘，陷入全面的低潮。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华文教育遭逢如此厄难，培群中小学校自然无法幸免。经过激烈争论，培群接受了改制，改制后的培群分为：培群一小、培群二小、培群国民型中学与培群独立中学。

1962年，笨珍培群独中正式成立，与全国其他独中一样，成为华社私立之非营利学府，办学经费来自学杂费及各界捐款。



原址创校 洪祖秋珍藏

1964年后，附设在培群国民型中学之下的培群独立中学面临各种法令与环境滋扰，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学生锐减，惨淡经营，濒于沦亡。

1969年，培群独中迁校至大笨珍现址。1970年代，培群独中在获得社会人士的热烈支持下，掀起了连串波澜壮阔的筹款热潮。从1980年代开始，培群独中逐步取得稳健发展，校园约有20依吉之大。反观接受改制的培群国民型中学却走入历史，在笨珍人的记忆中悄然消失。

回顾历史，从开始的培群学校，到今天的培群一校、二校及培群独立中学，培群校史上的每个时代，均涌现了一批为教育、为族群作出牺牲和贡献的华教工作者，可谓居功厥伟。



1950年改建新校址

抚今追昔，悠悠九十春秋，培群中、小学校始终为发扬民族文化教育与栽培人才而默默耕耘，无怨无悔，坚守本分，永不言懈。

奇迹，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育

放眼世界，马来西亚是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四地以外，唯一拥有小学、中学及大专院校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堪称是项奇迹。而奇迹背后，有其坚持，悲壮与忧患，斑斑血泪，书不胜数。

19世纪初，华文教育以私塾的形式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出现至今，虽历尽艰辛，却从未中断过。不论是在英殖民时期、日治的三年八个月，还是独立前后受尽法令、政策和人为制约，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愈挫愈勇，依然完好。诚如前文提及的《1961年教育法令》，华文中学在改制浪潮冲击的严峻考验下，依然站稳维护民族教育的立场，秉持“津贴金可以被剥夺，华文中学不能不办”的信念，遂有今日之华文独中。

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华文独中教育在逆境之中茁壮成长，独中生的表现亦蜚声国际，他们在政经文教及影艺界的卓越表现，印证了华教办学的正确与优越。例如：台湾电影界大导演蔡明亮、全球首个随身碟研发者台湾群

联电子董事长潘健成、台湾知名表演团体“优人神鼓”的艺术指导黄志群、生物细胞研究科学家纪家葵博士，作家李永平、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欧阳林医师、出版界名人沈云骢，以及娱乐圈的戴佩妮、张栋梁及李佳薇等。各行各业里独中源流的人才不胜枚举，他

们皆能立足本土，放眼国际。

在一个保守、僵化及落伍的单元化教育系统下，独中统考文凭一直不被承认。其实，独中生已能通过高中统考文凭而直接被录取进入世界各大学深造，当中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等知名学府。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育自创办以来便是自力更生。迄英殖民时代至独立后，常有法令强调国家教育单元化，作为国民一分子的华人，从不间断地争取在宪法规定下自主学习

和使用本族语文的平等权利。事实证明，华文独中在维护与发扬中华文化，造就人才，为国家和社会进步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随着华文教育取得丰硕成果，独中生人数亦逐年增加。据董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的简称，是马来西亚维护与发展华文教育的全国领导机构）统计，2011年全国独中生达6万6千多名，同时约6千余名学子望独中之门而兴叹；2012年，全马独中学生人数突破7万人，创下历史新高；2013年新学年，西马各独中从南到北都“全线爆满”，因学额不足而被拒于校门外的学生超过1万人！许多独中因课室与设备不足而割爱报读者，一些则为学子们的前途而采取大班制招收学生。按目前趋势，马国必须增建至少10所独中（每所1千名生设计），才能满足莘莘学子升学之路。

就是在此情形下，笨珍培群今年突破性创下1千4百余名学生的历史新高。华社要求增建、复办或设立分校的诉求无着落，只好倾全力发展现有独中，此乃各校董事之当前急务。

启航，落实《培群独中校园整体规划发展大蓝图》

早在数年前，培群独中新届董事部便意识到发展学校已是刻不容缓，毅然提出扩建校舍，并将培群独中发展成为一所卓越华文学府的宏愿。2011年4月，《培群独中校园整体规划发展大蓝图》出炉。此蓝图有三大目标：

1. 满足未来10至20年内笨珍人民对独中的教育需求。
2. 提供优质的现代化校园环境是广大社会大众应负起的时代使命。
3. 凝聚群众的智慧与力量，培养明天华教工作接班人。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再过十年，培群将迈入百岁，《培群独中校园整体规划发展大蓝图》的提出，有其前瞻性与发展需要。这是一项完善而宏大的发展计划，筹款目标预定为1千500万令吉，从2011至2015年全面规划及落实培群独中校园整体的发展。第一期发展计划是先建一栋四层楼的现代化教学楼，预计经费800万令吉。待新教学楼落成，再逐步落实大蓝图中的图书楼与多用途讲堂等。

计划既定，筹募活动便全面展开，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报章，宣传册子等向华社发布培群独中的发展计划，两年以来先后举办了多场大型的募款活动：

- 2011年7月17日，由皇帽啤酒集团赞助，《南洋商报》和《中国报》联办的“十大义演”，在笨珍培群独中吴如思礼堂圆满落幕，本场演出吸引了逾千热心华教的人士共赴其盛，也为培群独中筹获230万令吉的建校基金。

- 2011年8月28日，柔佛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林连玉基金新山区联委会、新山歌乐协会及培群独中建校工委，假新山宽柔中学古来分校礼堂，成功举办“春雷动地”史诗歌舞剧，为培群独中筹募百万元建校基金。

- 2011年10月23日，士姑来凤凰友好联谊会在欢庆成立五周年之余，也借此良机举办“华教之夜”，协助培群独中筹募建校基金，是夜共筹获约90万令吉，成绩令人鼓舞！

- 2011年12月31日，柔佛州老友联谊会举办“巨浪之夜”，为培群独中筹得65万令吉建校基金。

- 2012年7月6日，由新山78个华团联办，8单位协办之“薪传培群华教之夜”，在士姑来五福城宴开600席，为培群独中筹获320万建校基金。当天，前任董事长匡时杰医生与林青赋董事长携手点燃

火炬，交由学生队伍，以接力方式，将薪火从学校一路传至新山，展开长达54公里的火炬传薪运动。当火炬传递到盛会现场，全场唱响《传灯》，掌声与欢呼声响彻云霄，久久不息，现场气氛澎湃，场面激动人心。

除了上述大型筹款活动外，笨珍与新山的社团、神庙、庆中元理事会，以及热爱华教的各阶层人士也热烈支持培群独中的建校计划。此外，一些政党领袖也予以拨款支持。而今建校工委会已筹得近1千2百万令吉。

当此六年扩建计划完成后，培群独中可容纳2千5百名学生，势将惠及众多渴望接受独中教育的学子们。

征程，第二期建校工程有待各方共襄义举

2011年9月25日，笨珍培群独中举行了第一期建校工程动土仪式，为落实《培群独中校园整体规划发展大蓝图》打下振奋人心的坚实基础。盛典当日，现场嘉宾与师生共同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培群独中董事长林青赋、建校工委会主席罗烈贤、林连玉基金主席拿督杜乾焕及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相继在仪式上致词。

2012年11月11日，培群中小学90周年校庆万人宴，在培群独中吴如思礼堂盛大举行，宴开522席，场面气氛欢腾热闹。柔佛州务大臣阿都干尼伉俪受邀为拔地而起的新教学楼主持亮灯仪式。新

教学楼预计在2013年4月建竣，待内部装潢与整修完毕，全体学生即可迁入新校舍上课，享有更良好的学习环境。

巍峨之新教学楼即将竣工，大蓝图的第二期工程接着展开，逐一落实图书楼与多用途讲堂等工程，二者的建设与发展势将与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同步进行，图书楼与多用途讲堂提升软体建设的重大工程，其所发挥的作用乃是潜移默化的，像春雨润物无声，让学子们身心获得全面发展。

然而在建材与工资飙升的环境下，原定1千5百万的建校预算惟恐不敷，建校工委会亟需各方发挥爱护华文教育之精神以筹募更多款项，为广大学子创办一所深具特色的华文学府。笨珍各界人士祈望，一个满载培群董事、师生、校友及华社热心人士期盼的现代化校园能早日落实。

教育之路，与时俱进，不休不止。笨珍社稷矢志将培群独中发展成为一所卓越、有特色之华文学府，以满足国家社会未来的教育需求，也为国家民族做出更卓越的贡献。路漫漫其修远兮，培群迈向变革的步履是如斯坚定！语文是民族的灵魂，文化是民族的根本，期盼培群独中的学子们，继续扎根本土，迈向国际；祝愿培群独中能深深植根于传统与现代的沃土之中，历久弥新。

作者为马来西亚文教工作者



培群独中新教学楼蓝图



Sarawak

沙巴领土争议的历史背景

Kuching



文：陈伟玉



马来西亚与菲律宾一直为沙巴 (Sabah) 领土主权起争议，到底沙巴的主权属于谁？沙巴这个地名是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以后，才开始被采用，取代北婆罗洲 (North Borneo)。沙巴这词源自当地的香蕉名称，即沙峇蕉 (马来名称Pisang Saba)。

文莱苏丹把北婆罗洲领土送给苏禄苏丹

沙巴位于婆罗洲东北部，16世纪时是文莱属地。后来文莱发生叛乱，苏禄苏丹出兵协助平定叛乱。文莱苏丹为了答谢他，将北婆罗洲金马士湾 (Kimans Bay) 以东的土地赠送给他。18世纪中叶，苏禄被西班牙占领，苏禄苏丹成为西班牙的阶下囚。1756年英国人达伦普 (Alexander

Dalrymple) 将苏禄苏丹释放，为报答救命之恩，苏禄苏丹把巴兰班甘岛 (Balambangan) 和北婆罗洲北端领土相赠。后来达伦普将北婆罗洲转售给英国东印度公司。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巴兰班甘岛设立商站。然而，由于海盗猖獗，得不偿失，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该岛撤出。

北婆罗洲辗转落入英国手中

19世纪，帝国主义来到北婆罗洲，改写了它的历史。1847年英国与文莱苏丹签订一项通商友好关系条约，以“促进英国臣民和东海各王国的臣民间贸易，并消灭以往阻碍商务发展的海盗劫掠”。美国仿效英国与文莱签订条

约，且派遣领事去经营北婆罗洲。1865年8月11日，美国领事毛希（Claude Lee Moses）与文莱苏丹亚都慕明（Abdul Mumin）签署租约，支付8,500元租金租下北婆罗洲。毛希无心经营北婆罗洲，志在赚钱，于是将它卖给陶瑞（Joseph W. Torrey）和哈瑞斯（Thomas B. Harris）。文莱苏丹封陶瑞为安邦与马如笃王者（Rajah of Ambong and Merudu）。陶瑞原本计划在北婆罗洲开设美国贸易公司，开发这片土地，结果资金不足，只好转售出去。

奥地利驻香港总领事奥维伯克男爵（Baron Von Overbeck）对北婆罗洲深感兴趣，得到孟盖斯伯爵（Count Montgelas）和宓福特（Mitford）的支持。奥维伯克男爵决定以婆币15,000元收购陶瑞的领土。文莱苏丹要求奥维伯克男爵先缴清陶瑞先前所欠下的租金，才能转让这片领土。然而，孟盖斯伯爵和宓福特不愿一次支付庞大的经费，奥维伯克男爵只好向英国企业家登特（Alfred Dent）求助。登特答应出资，支付一万英镑，条件是开发北婆罗洲的权利由他主导。1877年12月29日，文莱苏丹与奥维伯克男爵、登特签订割让领土条约，以婆币15,000元的年费，换得北婆罗洲以东所有土地的主权。成交以后，奥维伯克男爵成为北婆罗洲东海岸最高统治者。

名誉上，北婆罗洲仍属苏禄苏丹。为了要能名副其实占有领土，奥维伯克男爵去拜会苏禄苏丹，答应他，与登特支付苏禄苏丹及其后嗣每年婆币5,000元作为补偿。双方同意，一旦苏丹及其继承人与奥维伯克男爵发生领土争议时，交由英王驻婆罗洲总领事裁决。1878年1月22日苏禄苏丹与奥维伯克男爵签

订割让领土条约，同时任命奥维伯克男爵为最高统治者。登特取得北婆罗洲的主导权后，亲自到北婆罗洲勘察地形研究开发事宜。登特写了一份报告有关割让北婆罗洲领土的经过，并向英国政府申请特许状（Charter）。1880年12月英国女王终于答应颁发特许状给登特。

翌年3月，登特组织英属北婆罗洲临时协会（British North Borneo Provisional Association），同时规划成立北婆罗洲公司。1882年11月1日英国政府颁发一张特许状给北婆罗洲公司。自此北婆罗洲由北婆罗洲公司统治，直到1941年，长达60年。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随即占领北婆罗洲，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澳洲第九步兵团在北婆罗洲负责救济和维持治安秩序等工作。英属婆罗洲公共事务组（British Borneo Civil Affairs Unit）担任临时政府，1946年3月将政权归还北婆罗洲公司。由于战争浩劫，北婆罗洲公司无力肩负重建工作，遂将北婆罗洲割让给英国政府，于1946年7月15日生效。自此以后，北婆罗洲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

东姑阿都拉曼抛出大马来西亚计划的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独立运动不断涌现，旧的殖民地时代告一个段落。东南亚各地纷纷兴起独立的浪潮，争取脱离殖民地统治。菲律宾于1946年7月4日独立。1948年1月4日缅甸宣布正式成为缅甸联邦独立共和国。1955年南越共和国成立。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脱离英国殖民地统治。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以后，英国了解到北婆三邦迟早也要求结束殖民

地统治。英国拟议将北婆三邦建立婆罗洲联邦，但是文莱苏丹反对，不愿砂拉越和北婆罗洲分享其国家资源，因此婆罗洲联邦计划失败。

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在新加坡的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俱乐部午餐会上，发表一篇演说，抛出“大马来西亚计划”的概念，主张马来亚、新加坡、北婆罗洲、文莱和砂拉越五邦应加紧政治与经济的合作关系。东姑阿都拉曼的此项提议，犹如引爆一枚计时炸弹，造成极大回响，北婆罗洲、文莱和砂拉越更是闻之震撼。大马来西亚计划不仅是新马两地的合并，同时包括北婆罗洲、文莱和砂拉越。

东姑阿都拉曼不愿马来亚和新加坡合并，但在英国的压力和面对新加坡可能落入敌对的左翼势力的担忧下，东姑阿都拉曼不得不接受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东姑阿都拉曼透过联合北婆罗洲、文莱和砂拉越，以解决华巫人口比率问题，目的是要维持马来人的优势。东姑阿都拉曼在英国的支持之下握有大马来西亚计划的主导权。大马来西亚计划就像一桩政治婚姻，东姑阿都拉曼和李光耀积极游说北婆罗洲、文莱和砂拉越领袖接受大马来西亚计划。首先，东姑阿都拉曼扩大土著的定义，使北婆三邦的土著也能与马来人一样享有特权。东姑阿都拉曼声称砂拉越和北婆罗洲透过大马来西亚计划可以脱离英国殖民地统治。东姑阿都拉曼在游说过程中全力拉拢砂拉越和北婆罗洲的土著领袖支持大马来西亚计划。可见砂拉越和北婆罗洲表面上扮演着配角，实际上却扮演促进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的关键。在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员会当

从历史上而言，苏禄苏丹对北婆罗洲的领土主权显然是有名无实。至于1878年签订的条约是用阿拉伯字母拼音之马来语写成，分别有康克林(Dr. Harold Conklin)、沙利白(Saleeby)、马克斯韦尔(S.G. Maxwell)和吉普逊(W.S. Gibson)译本，他们译为租借(lease)、割让(Cede)、让与(Grant)，内容中表示权利的关键词为Padjak，菲律宾对此字解读为租借，而英国解读为割让。

中，新加坡和马来亚领袖苦口婆心地说服北婆罗洲、文莱和砂拉越领袖对大马来西亚计划的疑虑。

菲律宾索取北婆罗洲领土

1962年6月，菲律宾断然向英国索取北婆罗洲领土。马嘉柏皋总统于1962年6月22日向英国索取北婆罗洲领土主权。23日菲律宾署理外长通知英国驻菲使馆，要求和平解决北婆罗洲领土问题。菲律宾通牒致英国政府，要求双边谈判，但英国拒绝，坚持英国购得北婆罗洲领土的权利。东姑对于菲律宾索取北婆领土一事，拒绝发表意见，表示此事是菲律宾与英国之间的问题。北婆罗洲华人社团领袖对于菲律宾索取领土一事，表示震惊，谴责菲律宾欲扩张殖民地违反联合国宪章，并表示支持英政府的立场。反之，印度尼西亚却支持菲律宾索取北婆领土的要求。

11月24日菲律宾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波查大使，请求联合国协助，解决北婆罗洲领土之纠纷。¹ 菲律宾强调保留索取北婆领土的权利，认为该领土对于菲律宾的安全相当重要。英国驻联合国代表狄恩于1962年12月25日否认菲律宾对北婆罗洲之主权。他指出，1946年的菲律宾宪法，以及1961年菲律宾国会有关领海的议决案，制定了菲律宾国界，并未包括北婆罗洲在内。尽管如此，菲

律宾政府还是坚持，认为北婆罗洲是于1881年，从苏禄苏丹手中租借给北婆罗洲公司，并非割让。

马来亚对菲律宾继续索取北婆罗洲主权要求深表不满。东姑拒绝出席东南亚协会外长会议，会期不断展延，直到1963年1月12日至17日才举行。经泰国外交部长乃他那(Thanat Khoman)的调解，终于化解了东南亚协会的危机，并于1963年4月2日至4日在马尼拉召开菲律宾、马来亚联合邦、泰国三国外长会议。菲律宾副总统兼外长白莱斯与东姑商议后，决定在东南亚协会外交会议以后，与印度尼西亚举行高峰会议。同年6月7日，马印菲三国外长会议在马尼拉举行，旨在减少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为高峰会议铺路。1963年7月30日至8月5日苏卡诺、东姑和马嘉柏皋三国首长在马尼拉举行极峰会议商讨马来西亚问题。高峰会议接受三国外长会议的建议，吁请联合国秘书长宇丹鉴定北婆罗洲和砂拉越人民愿望，以确定民主自决。三国首长东姑阿都拉曼、苏卡诺和马卡巴加尔签《马尼拉宣言》，发表联合公报(Joint Statement)。

沙巴并入马来西亚

联合国调查团的调查时间原订为1963年8月22日至31日，但由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观察员人数争议，无法实时抵达北婆罗洲和砂拉越，导致联合国调查团工作展延8月26日至9月2

日。因此马来西亚无法于1963年8月31日成立，而延后两个星期于9月16日成立。经联合国调查团的裁决，北婆罗洲只有少部份人民反对马来西亚，内陆地区人民持保留态度。联合国秘书长宇丹裁决北婆罗洲和砂拉越大多数人民支持马来西亚。1963年9月16日东姑阿都拉曼发表《马来西亚宣言》，宣布马来西亚成立，砂拉越和北婆罗洲便成为第十二、十三州。

从历史上而言，苏禄苏丹对北婆罗洲的领土主权显然是有名无实。至于1878年签订的条约是用阿拉伯字母拼音之马来语写成，分别有康克林(Dr. Harold Conklin)、沙利白(Saleeby)、马克斯韦尔(S.G. Maxwell)和吉普逊(W.S. Gibson)译本，他们译为租借(lease)、割让(Cede)、让与(Grant)，内容中表示权利的关键词为Padjak，菲律宾对此字解读为租借，而英国解读为割让。但根据英国政府持有协议的约本，苏禄苏丹言明“永久给予英二人及其继承人的所有权利与权力”。也就是将这项管辖权利给予奥维伯克男爵。后来北婆罗洲公司又将北婆罗洲的统治权转到英国政府手中，而英国政府在马来西亚成立以后，又将北婆罗洲的统治权转让给马来西亚政府。毋庸置疑，北婆罗洲的主权是属于马来西亚的。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¹ 《神山日报》，1962年11月26日。

2008年9月14日那天傍晚，在纽约曼哈顿第七大道的雷曼兄弟总公司大门前的街道，如往常般人流熙攘。不同的是大门口这一刻站了许多记者和好奇的路人，时不时就有几个手抱纸箱或拖着旅行袋的雷曼员工匆匆走上街头寻找计程车。有位好奇的路人开玩笑地问道“难道雷曼兄弟真的要关门大吉了吗？”。

是的，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就在隔天（2008年9月15日）宣布破产。这家拥有一百多年辉煌历史、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连本地一些精明投资家都投下巨资的银行，就这样突然结束营业，怎么可能呢？美国政府为何袖手旁观，甘冒着让全世界人对美国金融制度失去信心的风险呢？世界各地的人们心里都在问这个问题。

雷曼倒闭触动了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大海啸。全球股市从纽约、东京、香港、上海、新加坡……排山倒海似的狂泻不止。全球金融体系也因此事件而引起大混乱，各国政府及中央银行纷纷出手救市，为接踵而来的一连串大小金融危机埋下祸根。不少人认为：美国布什政府在其转换政权的前三个月，让雷曼兄弟自行倒闭的决定，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原因是：

一、雷曼兄弟本来是有希望渡过危机的。在它宣布倒闭之前，英国的巴克莱银行原本要收购雷曼兄弟。但因美国政府拒绝为雷曼的资产作担保，因而促使巴克莱银行退出收购雷曼的计划。之后，美国自己的银行美国银行也想收购雷曼，但美联储局却因与美国银行政治派系不同而不愿提供资金扶持它收购雷曼的建议。美国政府当初若能支持巴克莱银行或美国银行，雷曼兄弟就不会跨台了。雷曼兄弟在破产前的资产共有6390亿美元，相对其债务总额6130亿美元，虽然情况十分严峻，但只要美国政府肯做出担保承诺，雷曼的债务信贷级就不至于降为垃圾级了。国际社会对美国或西方银行体系也不会没有信心了。

二、美国纽约是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而这次金融大海啸的罪魁祸首有两个：一是次级贷款鱼目混珠的参杂在其他投资产品中，因

而引起投资者的恐慌。二是美国政府过度盲目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而让投资银行大量创造高风险的衍生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任由投资银行自行倒闭，那么除了美国外，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手上所持的债券与票据都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如新加坡星展银行的HN5就是这个例子。“信心”是银行与金融业的灵魂，无论情况有多么糟，美国政府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先安定人民与投资者的信心。然而，美国政府任由雷曼兄弟跨台的做法，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可是，在让雷曼兄弟跨台之后，美国政府又要建议动用万亿美元来救市，以及把AIG收归国有。这不是亡羊补牢吗？

雷曼兄弟的倒闭引起美国人民的极度恐慌。因此，在2008年9月15日同一天，美国最大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的存款被提取了

回顾

167亿美元，造成它没有足够的现金来偿还债务和业务开支。这家拥有3070亿美元资产和1880亿存款的美国最大储蓄银行终于在2008年9月25日也被美国政府接管了。

有人曾经问美国投资家索罗斯“让雷曼破产是否是政策错误？”，他回答说：“这是个很严重的错误。我绝没想到美国政府会让这样大的投行破产，雷曼兄弟倒闭引爆了震撼全球的次贷危机”。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什么是次级抵押贷款这回事？

次级抵押贷款其实指的是美国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并提供下列优惠条件：

- 不用付首期
- 不用入息证明



文：戴文雪



雷曼兄弟

美国政府见死不救？

• 也不计较抵押单位的质素等

次级房屋信贷经过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及华尔街用财务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组合、包装，就以票据或证券产品形式，在抵押二级市场上出卖，并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购买，从而赚取丰厚的回报。

美国房地产市场次贷危机已经导致全球损失了 7.7 万亿美元，并且使危机扩大到全球其他领域，创造了金融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个金融危机。

其实，美国当年所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发病根源来自八十年代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即把美国人民或美国公司

变成一个“负储蓄的经济单位”。当时美国人民都在花未来钱。曾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哈佛大学经济教授保罗·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 指出：“美国公司总裁的天价薪酬已破坏了企业的监察系统。总裁不真实的公布企业盈利，但事发后却还能财富满载而归……”，这些话道出了美国当年的企业与金融架构已出现巨大的结构型缺陷。

次贷危机虽然早已过去了五年多，但我依稀还记得那段期间的一些令人悲痛景象：

• 你手中的股票只剩下60%-70%的市场价值？

• 你的投资基金的价值只剩下25%-30%？

• 你的银行朋友被裁了？
• 你的生意突然一落千丈？……

重提雷曼兄弟事件，是希望提醒曾为密你债卷风波拖累的国人，以及所有遭受那次危机洗礼的国人，不好忘记从中吸取到的珍贵人生经验。在这诡异的商海中，贪婪是失败之母。就像华尔街那些贪婪的银行家们，他们至今只做对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告诉了世人，没有道德的人所造成的灾害是何其的大啊！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马绍尔与他的红色中国之行

在“默迪卡”口号响彻狮城上空的1950/60年代，新加坡本土居民的反殖民、求独立的群情不断高涨。在这场人民要求当家作主人的国民政治觉醒的运动中，大卫马绍尔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位新加坡独立建国以前在英国殖民政府里的首任首席部长，是一位决不妥协的反殖民建制的民族主义英雄。

对于今日新加坡的硬体建设，马绍尔的功劳也许乏善可陈，但是他的精神遗产在后殖民时代的新加坡还是泽被后人的：这不光体现在业已被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四大民族官方语言在国会通行无阻这一事实上，也存在于被国人再熟悉也不过的国会议员与选区居民的日常会见活动的惯例里。即使是近年来为我国国会带来多党色彩的新加坡工人党，也是在1957年，由马绍尔在脱离劳工阵线后亲手创立的；尽管，后来他离开了工人党，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工人党也有了脱胎换骨式的成长，此为后话。

／ 文：章良我

可以说，大卫马绍尔已经是新加坡历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是一位充满热情、坦率耿直、随时准备为自己信念而不惜投入舌战的斗士，他是一个维护法律体系、重视司法独立完整、捍卫民主价值和保卫人性尊严的人道主义战士。

卸任首席部长，遍游新中国

1956年6月，马绍尔从首席部长一职离任不久，就接到了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出的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参观访问的正式邀请。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于1949年12月15日，与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它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倡导建立的，周恩来在生前一直担任该学会的名誉会长。自1964年起，它的另一位名誉会长是时任中国政府副总理、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是新中国第一个研究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并从事人民外交的组织机构与社会团体。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学会简章里，清楚地阐明了其宗旨：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进行国际交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

时值世界各地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运动风起云涌、亚非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的形势如火如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从新加坡殖民政府的首席部长一职甫卸任的马绍尔前往红色中国进行访问，自然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1955年4月，在由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宗主国参与的情况下，讨论了亚非人民自己的切身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周恩来的率领下，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与各与会国代表展开了充分的协商。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项内容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其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

马绍尔：“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确信，西方对中国的排斥，无疑是在割断自己的咽喉。”

更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会议的圆满成功引来了新老殖民宗主国的格外关注。

鉴于当时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国际形势，接待外国贵宾越来越成为外交学会的中心工作。“外宾”多为各地政界上层人士，包括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内阁成员和与新中国尚未建交国的领导人、朝野政党领袖、金融、工商、学术等各界人士。在此情况下，马绍尔成为被邀请的对象，就一点也不意外了。

凑巧的是，当时一个正在筹组的新加坡及马来亚联邦工商业贸易考察团，应中华全国工商联会的邀请，准备前往中国作商务考察。考察团拟邀请马绍尔作为领队，出于政治敏感性，马绍尔提出还是做考察团的顾问比较妥当。尽管如此，马绍尔及新马工商考察团欲出访红色中国的计划，还是在尚处于殖民统治的新加坡和已经实行自治的马来亚掀起了不小的政治波澜。

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东南亚地区革命及马来亚共产党的支持者；许多在新马一带生活的华人也还视中国为自己的祖国。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新马两地奔往中国的都是一些受爱国及理想主义影响的左翼人士，他们的出行都是单程的。对他们向往的理想来说，那是一种回归；而对他们的南洋家乡父老来说，那却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

马绍尔之乐于接受红色中国的访问邀请，自然不会赢来英国殖民地当局及反共的马来亚自治政府的欢心，

同时也引起其他西方政府的疑虑。美国领事馆人员就曾劝告马绍尔改变初衷，提议安排他前往受美国影响的台湾，作一次“文化与身心”之旅。但是，这位立场鲜明的反共职业律师、不屈不挠的反殖主义斗士，还是坚决地开始了他北上的行程。

“排斥中国，无疑割断自己喉咙”

从1956年8月14日自香港九龙进入中国境内，于17日到达北京，一直到10月13日离开北京取道广州离境，在前后两个月的时间里，马绍尔先后访问了北京、沈阳、长春、西安、兰州、乌鲁木齐、重庆、昆明、武汉、上海及杭州等城市及农村，访问了大学、工厂，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其间，马绍尔于8月28日到北京火车站迎接来访的新加坡及马来亚联邦工商业考察团，于10月4日在北京见证了贸易联合公报的签署，并送别考察团离京；前后参与考察团活动的实际时日只有一个星期。

在8月31日启程前往沈阳开始他的长途旅行之前，马绍尔在北京逗留访问期间，先后受到了陈毅和周恩来的接见，并互相作了实质性的会谈。马绍尔用坦诚布公的方式，与总理周恩来就两国政府对华侨在东南亚居留这一事实的态度进行了交流。在这一个关键而敏感的有关历史和现实政治的问题上，马绍尔勇敢而果断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为新加坡社会的稳定作了打点。

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周年，马绍尔出席了以周恩来名义举行的国庆招待宴会，毛泽东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卡诺也出席了宴会。10月1日，在天安门

城楼上观赏国庆焰火大汇演时，马绍尔又碰见毛泽东，并互相作了短暂交谈。

结束中国之行前，马绍尔于10月12日在北京电台录制了英文演讲，演讲全文于13日他一离开中国后就全文播出了。演讲开头道：“4个月以前我表达了造访印度、中国和日本这三个亚洲伟大的国度的意愿，以期对他们的政治及经济发展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但是基于我人尽皆知的反共立场，我不确定中国会给我颁发签证。出乎意料的是，不久我收到了信息，中国不仅给了我签证，而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我去中国作客，让我在中国可以尽兴逗留，并允诺帮助我研究这里的情况。这份充满礼貌与自信的邀请让我心为之所动。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在演讲结尾，马绍尔呼吁：“作为人类的一份子以及一个热心的议会民主人士，我对西方社会对中国所采取的隔离政策深表遗憾。西方社会的这一态度剥夺了自身对中国发展作出影响的机会，压迫了中国在国际间寻求友谊的空间。我最良好的愿望是西方社会不久能解除对中国的敌意，为世界和平缔造必要的真正友谊。”

马绍尔在1956年9月1日从中国写给他弟弟麦耶的信中曾经写道：“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确信，西方对中国的排斥，无疑是在割断自己的咽喉”。在半个世纪之后东西方冷战已经烟消云散的今天，这番话听来是多么具有前瞻性的洞见与超越性的智慧呀。

作者为工程师



广州鲁迅

: 如何男女



文：朱崇科

1 1927年1月16日，鲁迅乘搭“苏州”轮从厦门驶往广州，17日经停香港，18日下午抵达黄埔港口，晚上就迫不及待前去高第街晤见许广平了，彼时他和许广平已经两地分隔四个多月。鲁迅在广州初期，再见爱人许广平自是欢喜异常，但他们又不能真正身心结合（许家彼时并不支持许鲁的爱情），所以让利比多（libido）出口走向美食和游玩也可理解。从精神思考和物质享用的双重角度考量，鲁迅是真正活在广州的。当然毋庸讳言，广州的

美食环境也是得天独厚。而且加上是革命策源地，民风相对开放，工商业发达，人流如织，自有其别样风情。

本文此处更多考察他有关男女的层面。学者们和鲁迅的友人们一再指出，鲁迅和许广平同居是在1927年10月的上海，包括许广平本人也是如此看待。尽管如此，在这样定格的背后，我们不能忽略广州时期的作用。虽然遵循旧有的说法比较安全而且省事。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此话题的重提，并非是窥淫癖发作或无聊至极，而是想借此再现并关联、解释许多貌似无关的事件，呈现彼时鲁迅的复杂心态。

1. 大钟楼时期(1月19日-3月28日)。这时的鲁迅和许广平暂时告别了厦门的煎熬而可以朝夕相对，但限于当时的流言以及社会环境，他们无法同居，在鲁迅游玩广州的时候，本来可以二人世界秘密缱绻的场合，统统都邀了孙伏园。

考察鲁迅日记，大钟楼时期的鲁迅因为是全国名人，作为革命圣地的广州青年们苦闷而又活跃，所以鲁迅往往被逼/主动参加了很多次各类活动，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这一时段中，作为助理的许广平也是一个常客，“广平来”成为日记中的关键词之一。由于大钟楼地处当时的中山大学核心地段，鲁迅又是各阶层和党派拉拢、求告和利用的对象，自然居住其上的鲁迅也倍觉困扰，因为他实在缺乏一个工作和生活各自为政的私人空间，所以，才有了3月29日移居白云楼的举动。

毫无疑问，鲁迅在大钟楼时期既是忙碌的，也是兴奋的，所以，无论游玩、吃饭、演讲，他大多乐在其中，而许广平很细心的照料人生地不熟的鲁迅和许寿裳(2月份接受鲁迅邀请前来中山大学执教)，同时她对鲁迅的照料更为体贴。鲁迅觉得广州菜淡而无味，而且往往烧不熟，因此不喜欢吃。许广平便不断从家里送来精美的食品和土鲮鱼等。

2. 白云楼时期。1927年3月底，鲁迅、许广平、许寿裳三人移居白云楼。白云楼的房子也是三人同住，鲁迅、许寿裳、许广平每人一间。许广平作为鲁迅在广州的得力助手，或协助工作，或兼做翻译，或做向导，或不时下厨为鲁迅做几道可口的粤菜，甚至还让小妹许月平前来打理北新书屋的业务，真可谓不遗余力。

移居白云楼上不久，广州发生了著名的“四·一五”政治事变。鲁迅着力主张拯救被捕学生，无效。加上他所憎恶的顾颉刚也被邀请到中大来教书，鲁迅借此辞去教授位置，许广平、许寿裳也同时辞职。在6月5日，许寿裳离开广州，奔赴上海。

6月份以后的鲁迅和许广平感情日益加深，我们从鲁迅日记也可窥得一斑。许广平在鲁迅日记中出现的次数分别是，1月(从18开始)9次，2月14次，3月12次，4月7次。所以，4月份以前常见的“广平来”字眼日益减少，从6月

份开始，“托广平”变成了替代词，而且频率开始减少，6月1次，7月4次，8月4次，9月3次。

广平字眼次数的减少并不意味着鲁迅对许广平热度的降低，这恰恰可以从侧面证明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日益稳定，在鲁迅的潜意识里面，许广平已经成为一家人，反倒不需要过分记录和强调。

同样，考察鲁迅此时段清洁身体的次数，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在6-8月的沐浴、理发等操作次数频繁。不必多说，这当然可能跟广州气候相关，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女为悦己者容”，这些对身体的清洁倒同样可视为这是鲁迅对和爱人许广平朝夕相处身体的重视，也是对许广平的尊敬。我们固然不能捕风捉影，说濯足和沐浴皆是性关系的表示，但我们也很难排除沐浴、更衣的仪式性和身体亲密接触的关联。恰恰在此基础上，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的同居才显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从此角度说，我们不能断言广州是鲁迅和许广平的身体结合地，但毫无疑问，温暖的广州至少是他们二人爱情疯狂成长并成熟的酝酿地，尽管表面上看来，这种关系含有较多的暧昧空间。虽然彼时的社会环境对于鲁迅来说仍然不乏危机，但他们的二人世界却是坚固的、温润的。

作者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

从精神思考和物质享用的双重角度考量，鲁迅是真正活在广州的。当然毋庸讳言，广州的美食环境也是得天独厚。而且加上是革命策源地，民风相对开放，工商业发达，人流如织，自有其别样风情。

旅行了500年的 哥伦布



文：邹文学



在塞维利亚大教堂里，四个国王抬着哥伦布的石棺。

最 近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Seville)，在号称世界第三大的教堂里，我看到了哥伦布的灵柩。

在一个高约一米的平台上，四个穿着古代服装、有真人高的石雕像正跨出步伐，抬着一副石棺向我们走来。

导游说，他们抬的是伟大航海家哥伦布的灵柩，石棺里躺着哥伦布的遗骸，抬棺的是16世纪初西班牙四个王国的国王。

四次迁葬

哥伦布生于1451年，活了55岁，曾经四次出海远行，在海外度过的时光少说也有10年。不过，他死后看来也一样喜欢旅行。他是在1506年55岁时，病死于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城，可是，此后直到1898年，他的遗体都在长途跋涉。

他先是葬在当时已有400年历史的塞维利亚大教堂。1537年，哥伦布的儿子蒂戈去世葬

在南美多米尼加的圣多明各大教堂，蒂戈的遗孀竟要求把家翁的遗体飘洋过海迁去合葬。

1795年，法国占领圣多明各，西班牙人便挖起哥伦布遗体改葬在古巴的哈瓦那。1898年，美国占领古巴，西班牙人再次挖出遗体，不过，这回索性运回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大教堂。

我们现在看到的哥伦布棺木不曾入土，而是改由四个俊美的年轻国王抬着，似乎还在选择最后的下葬地点。据说，哥伦布遗书写着：“不要把我葬在西班牙。”

开棺验正身

哥伦布的遗体搬来搬去至今500年，2003年还再次开棺验明正身，据说里头的哥伦布只剩160克，差不多等于一个大苹果的重量。开棺难道是要查究死因，哥伦布曾遭什么人下了毒？

原来，哥伦布遗骸是否已迁回塞维利亚，100多年来在学界还是争论不休。事因1877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492年8月3日,41岁的哥伦布凭着地圆说的信念,带领了87名水手,驾驶着3艘帆船,离开了西班牙的巴罗斯港,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横渡大西洋的壮举。哥伦布的目的地是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黄金遍地,香料盈野”,还有茶叶和瓷器。

船队在海上行驶了2个月零6天,始终不见陆地的踪影。哥伦布答应与准备造反的船员妥协,3天后还看不见陆

地,船队就返航。就在第三天晚上,一名水手看到了前面有隐约火光。隔天他们终于登上了久违的陆地——美洲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不过,哥伦布还以为那是印度。1493年3月15日,哥伦布回到西班牙。之后他又三次西行,登上了美洲许多海岸。可是直到1506年逝世,他一直认为他到得地方是印度!后来,一个叫做亚美利加的意大利学者,确定哥伦布到达的不是印度,而是一

年,有建筑工人在圣多明各大教堂更换石子路面时,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盒子,盒子上写着:“杰出男士哥伦布”,里面装有41块碎骨头,还有一颗子弹。据说,哥伦布年轻时受过枪伤。于是一些考古学家推测,可能发生了“调包事件”。他们指出:“哥伦布和儿子蒂戈葬在一起,位置十分接近,很有可能搬错了遗体。”

为了解决这桩百多年来争执不休的疑案,两国同意化验哥伦布和家人遗骸的基因。2002年9月,他们挖出哥伦布儿子蒂戈的尸骨;2003年6月,再取出哥伦布和他二儿子埃尔南多的遗骸,然后,再从圣多明各大教堂取出哥伦布遗骨。2003年9月,科学家根据线粒体的基因作了对比。

哥伦布推动时代巨轮

其实,基因的鉴别仍存在很多困难。科学家解释,一旦尸骨存放时间超过60年,鉴定效果就不是那么可靠。研究小组虽然证实了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大教堂找到的遗骨是哥伦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葬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的哥伦布墓地的遗体就一定不是哥伦布的。

另一方面,不只哪里是哥伦布的安息地引起争论,是不是他首先发现新大陆也常成为话题。

我还是乐意接受北京大学历史系何顺果教授的说法,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的远航开辟了大西洋贸易。资本主义以前只在西欧发展,他开辟的大西洋时代,便使得资本主义第一次超越了欧洲的范围,促进了世界范围的大资本主义体

系。因此,何教授说:“尽管谁是第一个美洲发现者争论复杂,但都无法掩盖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重要性,没有人可以取代哥伦布。”

我在巴塞罗那的海港闲逛时,虽然哥伦布已站在几十米高的石碑上遥指着出海的方向,我仍旧乐意几次抬起头瞻仰他的丰采。是哥伦布坚定的意志,文明才提前登上南北美洲。

作者在特约撰稿人

块不为人知的新大陆,就已自己名字把这块大陆叫为亚美利加洲!

谁最先发现美洲,时有争论,但都不能改变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性意义。哥伦布的远航是大航海时代的开端,它使海外贸易的路线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也使西方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成就海上霸业。

我在巴塞罗那的海港闲逛时,虽然哥伦布已站在几十米高的石碑上遥指着出海的方向,我仍旧乐意几次抬起头瞻仰他的丰采。是哥伦布坚定的意志,文明才提前登上南北美洲。

作者在特约撰稿人



屹立在巴塞罗那石碑上的哥伦布。

七 小时空中飞行后，四月三日上午，我辗转到了故乡，轻装简行，只一小拉杆箱。走进小区，居然有点心慌。这次回家探亲，并没有告诉父母。今年一月时，拿到了工作计划，发现四月初两周假期恰好遇到了父亲的农历生日，顿觉责无旁贷地安排了。之后每周例常的电话里，忍住了没说。近乡情怯，说得就是此刻的乍惊乍喜吗？来到熟悉的那幢楼前，没有想到，父亲竟在楼下。他专注地看着三楼的阳台，两个工人模样的年轻人似乎在安装花架？楼前的花园里，三三五五的老人趁着刚刚露头的春日暖阳或打着太极，或闲庭信步。清明将至，父亲却依然穿得厚实。我紧迈了两步，“爸……”，我轻声叫道。

父亲转头，口里下意识地应着，目光落在我的脸上，全然没有我预想中的惊喜。

“您，知道我回来？”我不禁诧异。

“哦，不知道，不知道啊，你怎么回来了？”看着我，老人似乎在问自己。

其实不远

晚上简单的生日家宴上，父亲一副刚刚回过神来的开怀和欣

慰。今天啊，比过年还开心。嗯，三十晚上也没有这么高兴。他一遍又一遍地说，脸上笑开了花。母亲亦是，见我后反倒话少了，没有了电话里反复地叮咛，脸上藏不住的笑意，给我布菜，装饭，早早铺好被子，把电热毯开到低档，说既温着又不上火。

父母确实没有惊喜。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我的出现。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后，他们更多表现的是由衷地喜悦。还有感激。是的，一周之后，送我离开时，父亲说谢谢你安排时间，搭这么久的飞机回来，就是给我过个生日；母亲说谢谢你回来我们都很高兴，尤其是你爸爸，自去年生病后很少看他如此尽兴；等等。我应着，心里却是不安的。

十二年来，虽然每年都能回国探亲一两次，却因为家庭和工作，无法在春节或者父母生日等特别的日子回家。春节假期短，想着机

票贵，家乡又天寒地冻的，懒得跑；其他的假期，又贪恋与幼子周边小岛上度假的惬意；父母生日、母亲节或者父亲节，往往便在电话里安排一下，告诉老人在某行账户里取出某数，权当孝敬了。虽说偶有内疚，总觉得父母是理解的，回去就好嘛，何必拘泥于一定要在哪些个特别的时日呢。却从未曾想到，我这次怀着些许小虚荣、暗中期待小惊喜的安排，带给父母这样满心满怀的幸福。

不由想到了曾前不久看过的一本书《五种爱的语言》，作者坦然，当你读懂了配偶爱的语言，婚姻的经营与维系并非难事。这样的书——关于爱情，关于婚姻，甚至关于孩子、青少年和职场的，书店里琳琅满目，很是不少，且整年畅销，全无市场之虞。然而，又有哪些书，反其道而行之，教导子女去读懂父母的爱的语言，去琢磨父母的心思，去理解父母的情绪？正如情人节的热与母亲节的冷一样。这边厢，早在情人节前一个月，节目预报就花样翻新，各式礼物和巧克力的柜台边人头攒动，大批年轻人甚至青少年的投入指标爆棚；那边厢，母亲节近在眼前了，卖力嘶喊几下的，无非是些想借借东风的商家，还有些养儿知了父母恩的中年人罢了。

家翁自年轻就耳聋，帮我们照顾小孩儿时，说话声音的大小不好掌握，总怕自己声大吓到孙子。我当然也怕，偶有几次，碍于情面没有说，心里是闷闷的。直到去年一日，孩子爸爸躺在床上阅读，突然感慨到，眼睛越来越花了，才知这无奈与不便，想老父一辈子戴助听器，该是多么的不方便啊。听罢不禁自忖，父母对子女的理解，往往是真实、体悟和提炼过的，因为有了经历。而子女对父母的理解，更多的是揣摩和想当然，只有经历了时光的浸濡，才忽而一醒，或顿悟或感念，却往往有为时已晚的隐忧。

七个小时的飞行距离，其实不远。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我们可以抵达的物理意义上的距离，都不算远，哪怕海天相隔。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文：苏 笛

陈嘉庚精神的时代意义



文：何奕恺

2013年3月5日，集美陈嘉庚馆馆长陈呈在怡和轩俱乐部发表专题演讲，阐述陈嘉庚精神的时代意义，以下是陈馆长讲话摘录。

“人可以逝，但精神流传下来仍然是有用的，尤其像“陈嘉庚精神”这样的财富，更是如此。可惜目前中国对嘉庚先生的认识远不及东南亚，因此我们在厦门的陈嘉庚纪念馆一直在努力推广。

先生主要有两大贡献：一是倾资办学，二是团结抗战。其实之于后者，南洋华侨的牺牲和贡献是巨大的，但中国对此了解还远远不够。对先生的评价，则只要略举三例，便可见一斑了：

■ 心力强毅而锐敏，不苟言笑，利害烛于几先，计划定于俄顷；临事不惊，功成不居；严于处物，而宽于处人……君之散财，非为名高，非为情感，盖卓然有主旨如此。

——黄炎培，1919年

■ 于此可见陈君不独是一大实业家也，亦是一大商业家也。陈君资产既如此富，才能又如是之大，而其勤劳治事，又非常人可比。……陈君为人如此，可钦可羨，实世上之难得者也！

——〈德〉Dr Bleom著，林选青译
《中国之‘司丁列思’(stinnes)——名闻海外之陈君嘉庚》

■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毛泽东，1945年11月18日

其中毛主席一语，字虽不多，但已可见对嘉庚先生的充分肯定了。

至于先生事迹，其实多见，这里就以两件事概括吧：

1. 先生出殡的场面，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执紼，能如此得到开国文武大臣的肯定，至今再无人能享有这份荣誉了，海外归侨更是不可能了。

2. 在新加坡的哀悼会上，其挽联为：“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横批：“流芳百世”。可见先生同样受到新加坡社会的高度肯定。

2007年厦门大学易中天、陈毅明两位老师在“百家讲坛”录制的《我心目中的陈嘉庚》，播出后影响很大，单光盘我们自己已制作了几千份！其实这在“百家讲坛”是个特例，因多是讲古代的题材，我们这次可谓开了先河，也可见央视的重视！主要因央视领导随刘云山同志参观鳌园时大为惊叹，遂决议促成！

我个人则认为“嘉庚精神”可归纳为以下六点：

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爱乡精神。一般人动荡之时各自危，他却总想着如何付出助人！

2. “重义轻利，公而忘私”的精神，主要之于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是当今商会、企业家联合会等社团应着重探讨的问题。

3. “诚实守信，嫉恶好善”的重德精神。

4. “刚坚果毅，坚韧不拔”的自强精神，更多体现在为人出世上。

5. “坚苦朴素，勤勉节俭”的清廉精神。先生虽然很富有，但生活极其节俭，

有句名言：“该花的钱，千千万万也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中国今倡廉崇俭，嘉庚先生这方面就值得借鉴。

6. 以时学行，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先生尽管所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但很是开明，很能接受新事物，在南洋见到的新奇东西，都会带回中国，而且很重视科学的发展。

另外，嘉庚先生的遗教二十条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大多通俗易解，就是希望后人能更容易接受、吸收。其中第一、二、六、八、十七等更值得一提：第一条，“我居新二十年，未犯过英政府一次罪”；第二条，“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作马牛”，也确是身体力行，财富都给了社会，未留任何给后代。第六条，“饮水思源，不可忘本”；第八条，“服务社会，是吾人之天职”；第十七条，“凡做社会公益，应由近及远，不必务远好高”。这些都是用朴实的语言说出的实在的道理，是嘉庚先生遗留下来给我们难能可贵的精神。

综而观之，其实“嘉庚精神”可以浓缩、概括为“诚毅”二字。这也是集美学校的校训，是先生1917年向他在集美办师范学院的弟弟陈敬贤先生提出的要求。这两个字的涵盖面很广，今天社会也到处强调诚信，而陈嘉庚先生当年就已经抓住了！

作者为特约撰稿人

南侨机工纪念雕塑正式揭幕

／文：李秉萱

由中华总商会、怡和轩、陈嘉庚基金、宗乡联合总会共同发起和出资设立的南侨机工纪念雕塑已安置在晚晴园，并于今年3月4日由外交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次长陈振泉揭幕。陈振泉在致词时说：“雕塑的完成并不是这个项目的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他希望通过雕塑，让更多人了解当年南洋华人社群如何积极参加中国的抗战和建设的历史，也希望晚晴园肩负起历史教育的重任，让学生认识早期先贤的努力与奋斗，教育年青一代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安逸生活。

中华总商会会长张松声致词时说：

“这座雕塑，既是为了永远纪念南洋华侨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先辈们勇于献身、无私奉献的精神。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世界各地的华侨纷纷团结起来，支持抗日战争。1939年，在著名侨领、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下，3200多人不惜放下一切，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长途跋涉，

历经艰难奔赴中国抗日前线，自愿到滇缅公路负责运送物资。据史料统计，近三分之一奋战在滇缅公路上的机工，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这是华侨史上的一次壮举，南侨机工的历史值得珍惜和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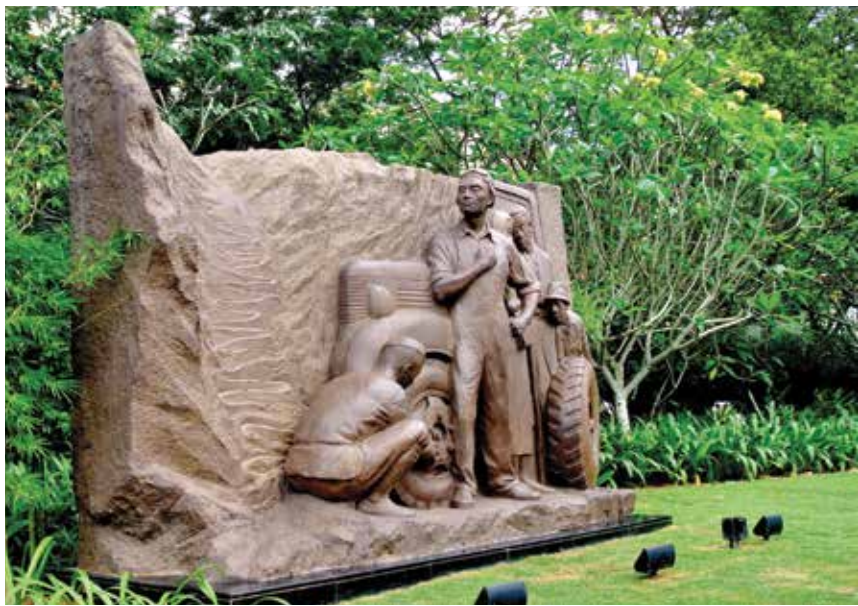
2012年2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怡和轩俱乐部、陈嘉庚基金会及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发起成立“南侨机工纪念标志筹建小组”，决定在晚晴园竖立“南侨机工纪念雕塑”，纪念当年的南侨机工，弘扬他们的奉献精神。

经过一年的努力，在华社四方携手合作下，由新加坡雕塑家陈连山先生精心设计并制作的纪念雕塑，今天终于竖立在晚晴园，供国人和海内外的访客追思和缅怀，让后人深刻了解这段历史。

我衷心希望，晚晴园继续发挥国民教育的作用，让更多新加坡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爱国爱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

作者为怡和轩总务





怡和世纪 · 感谢有你

宴请赞助与支持《怡和世纪》的各界人士 / 文：郑钧如

2月5日晚，怡和轩文化部同仁与《怡和世纪》赞助人和惠文献智的各界文友欢聚一堂。大家在当晚轻松、温馨的气氛中分享彼此的心得。文化部主任许福吉教授致词欢迎出席的会友

和嘉宾，并简单介绍《怡和世纪》的创办路程。林清如主席代表董事部感谢所有热心会友、各界人士的奉献和支持，他更感谢负责策划、编辑、出版工作的所有编辑部同仁。多位嘉宾相继

受邀发言，语多鼓励，欢笑言谈中做了坦诚、毫无拘束的交流，不愧为一顿难得的文化盛宴。

作者为怡和轩执行编辑





新年团拜 盛况非凡

／文：郑钧如

今年2月10日农历大年初一，怡和轩循例与陈嘉庚基金，在怡和轩会所举行新春团拜。是日，会所上下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瑞狮起舞，嘉宾与会友欢聚一堂，盛况非凡。嘉宾中国驻新使领馆代办戴兵、公使衔参赞黎宝光、教育参赞周建平、经济参赞张伟成、文化参赞肖江华、参赞兼总领事刘红梅等一行人拨冗光临，为团拜无限增辉。陈嘉庚基金主席潘国驹教授、怡和轩主席林清如、戴兵代办相继致词，向嘉宾与会友致上新春最美好的祝福。

回顾过去一年，林清如主席在致词中提到怡和轩会务时强调：我们要有更

好的规划，多元化的会务活动，才能适合会员不同的追求与兴趣，才能增强会员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他说：“作为一个社交的平台，我们肯定也有吃吃喝喝的时候，但是我们做的得体，做得温馨，不损尊严。另一方面，我们以自己的定位，根据自己的能力与方向，去参与社会，特别是在文化、历史的传承方面。”他感谢所有董事的合作和会友的支持。

作者为怡和轩执行编辑



欢迎新会员



陈亚树



林理明



李正大



谢楚明



许耀元

怡和世纪 欢迎各界

投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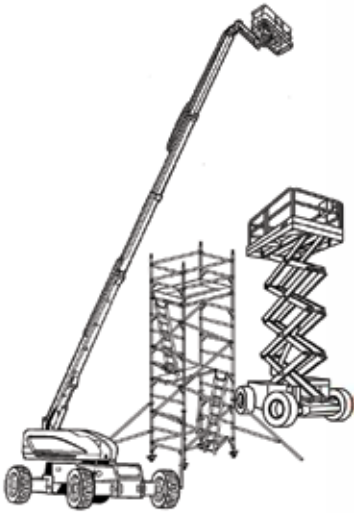
有关时事、财经、历史、文化、人物或地方介绍、人文建设的课题。文章以1200字或2000—2500字为宜。对任何被采用的文稿，编委会保留删减、编辑权力。

批评:

若对本刊任何文章有意见，请以短文提供不同看法，篇幅以500字为宜。

惠赐广告:

本刊发行量已达4,500本，在会员与富影响力社群广为流传，在本刊刊登广告，商业效力可观。



高明



Galmon

As the pioneer of Mobile Elevated Work Platforms since 1982, Galmon continues to grow and develop deeper expertise by remaining true to its founding principles – Trust, Teamwork and Safety.

With a 100% safety record for 30 years facilitated by continuous emphasis on training for its customers and its own employees,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oducts, services and equipment, Galmon has succeeded in maintaining its leader in its field. And it's not by chance. Through championing teamwork and creating work environment, excellence has become second nature.

This has been achieved by constantly striving anticipate and meet future market demands. Like offering the first ever on-site equipment training to customers, maintaining a consistent upgrading programme, and regular in-house checks. Working hand-in-hand with clients, it is innovative ideas like this that pay testament total commitment towards maintaining the highest standards for aerial lift systems and solutions.

Galmon (S) Pte Ltd

50 Tuas Ave 1, Jurong Industrial Estate, Singapore 639527
 T: 6862 2277 F: 6862 0520 E: info@galmon.com W: www.galmon.com





明義汽車私人有限公司

MIN GHEE AUTO PTE LTD

8, Jalan Lembah Kallang, #01-01 Min Ghee Building, Singapore 339564.

Tel: (65) 6298 3888 / (65) 6296 0808 Fax: (65) 6297 0863

Website: <http://www.minghee.com> Email: info@minghee.com

IMPORTERS

AUTHORISED STOCKIST

EXPORTERS

GENUINE AUTO PARTS CENTRE



Mercedes-Benz



MITSUBISHI
MOTORS



HONDA



KIA MOTORS



HYUNDAI



MIN GHEE BUILDING

BMW



TOYOTA



HDK





永福五金私營有限公司 WENG HOCK HARDWARE PTE LTD

Since 1969

Telephone: (65) 6295 2811 Facsimile: (65) 6295 4848

Email: wenghock@singnet.com.sg

LEADING DISTRIBUTOR & STOCKIST
Hoses & Fittings, Marine Fire Fighting Equipments, Lifting Hoists



Hoses & Fittings

ALFAGOMMA

HANKIL

TAKARA

BRIDGESTONE

TOGAWA

FLEXAUST

BAND-IT®

MIKALOR

Parker

DIXON

EVER-TITE

WAKATSUKI

Snap-tite

LUDECKE

Marine Fire Fighting Equipments

Snap-tite

UNIFIRE

AWG



Lifting Hoist

SAN-EI

VITAL®

WINTEC

BUDGIT

ELEPHANT

ENDO

Yale®

Others

- Ductings
- Rubber Expansion Joint
- Web Slings
- Foot Valves
- Flow Meters
- Safety Relief Valves

- Pressure Regulating Valve
- Fire Extinguisher
- Whipcheck Safety Cable
- Marine Fenders
- Wire Rope Cutter
- Hydraulic

- Ball Valves
- Oil Nozzles
- Hand Pumps
- Hose Reels

BESTKARA®

Designed & Engineered By **TEOHENG** Singapore



\$999

超级热卖

BESTKARA SERIES 5000 卡拉OK系统

• LA-5000数码扩音器 • SA-5000扬声器 • NK-5000麦克风 (2只)



三大最
巨声最
\$999
每套

\$999

经典之作



BESTKARA SERIES CLASSIC 8 卡拉OK系统

• LA-5000数码扩音器 • CLASSIC-8扬声器 • NK-5000麦克风 (2只)

\$999

不可思议



BESTKARA SERIES BIG 5 卡拉OK系统

• LA-5000数码扩音器 • BIG-5扬声器 • NK-5000麦克风 (2只)

BESTKARA SERIES 5566 卡拉OK系统

• LA-5566数码扩音器
• SA-7000扬声器
• NK-5000麦克风 (2只)

\$1988

实力十足

送

价值\$599
BESTKARA
PRO-SM20(12吋)
重低音扬声器



歌之王 诚意 ENCORE

teoheng.com

All Karaoke Systems
come with
Safety Approval By



PSB Singapore



王中王之2 绝对震撼

\$12,888



BMB + BESTKARA SERIES 2000 卡拉OK系统

• BMB DAR-800 II 数码扩音器 • BMB CSD-2000 (SE) 扬声器 (2对)
• BMB CSD-880 (SE) 扬声器 (2对) • BESTKARA C-550 功率放大器 Power Amp
• BESTKARA KM-222 卡拉OK Max1mizer • BESTKARA ACT-200 无线麦克风系统 + 充电器

价值\$1198
BESTKARA PRO-SM20(12吋)
重低音扬声器 (1对)

气势非凡



\$3,199

送

BMB SERIES 1000 卡拉OK系统
• BMB DAX-1000 (SE) II 数码扩音器
• BMB CSX-1000 (SE) 扬声器
• BMB NKN-300 麦克风 (2只)

价值\$599
BESTKARA PRO-SM20(12吋)
重低音扬声器

人气最旺



\$2,699

送

BMB SERIES 850 卡拉OK系统
• BMB DAX-850 (SE) II 数码扩音器
• BMB CSX-850 (SE) 扬声器
• BMB NKN-300 麦克风 (2只)

价值\$599
BESTKARA PRO-SM20(12吋)
重低音扬声器

TEOHENG
KTV STUDIO
ktvteoheng.com

Together Time
3 Hours Package from \$18.00

KTVSTUDIO SSC
NTU ALLURANI CLUB
Tel: 6484 4383
11 Elm Electronics Rise
#B1-21 Sembawang Shopping Centre
604 Sembawang Road, Singapore 758459

KTVSTUDIO EAST
Tel: 6345 6513 / 6440 2794
865 Mountbatten Road #01-75-82/83-82
Kallang Shopping Centre Singapore 437844



BMB Official Distributor

TEOHENG 张兴贸易

Your Leading Karaoke Specialist since 1989

Teo Heng Trading Pte Ltd

BMB Service Centre

865 Mountbatten Road #02-13/14/15/55/56 Katong Shopping Centre
Singapore 437844 Fax: (65) 6346 5865 Email: sales@teoheng.com

Tel: 6344 4383

马来西亚 张兴科技(马)有限公司 Teo Heng Technology (M) Sdn Bhd
印尼 张兴科技(印尼) PT. Teo Heng Technology (Indonesia)
中国 广东张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Guangdong Teo Heng Technology Co., Ltd
香港 张兴(香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eo Heng (Hong Kong) Technology Company



HONMA

Prestige ★★★★★



Honma flagship store is located at 501 Orchard Road, #03-03A Wheelock Place, Singapore 238880 Tel: +65 6338 2380. Also available at PAN-WEST 59 Jalan Pemimpin • PAN-WEST Paragon • PAN-WEST Far East • PAN-WEST Isetan Scotts • PAN-WEST Takashimaya Department Store • PAN-WEST Singapore Island Country Club (Island)

PAN-WEST is the exclusive distributor in Singapore. For any enquiry email to golf@pan-west.com or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pan-west.com



Look out for this PAN-WEST label of authenticity.



[facebook.com/HonmaGolfSingapore](https://www.facebook.com/HonmaGolfSingapore)

We serve you GOLF, all round



集永成機構有限公司
CHIP ENG SENG CORPORATION LTD

本集团专业于建筑及房地产发展业



Park Hotel @ Alexandra



100 Pasir Panjang



Fulcrum



Tower Melbourne

集永成機構有限公司

Chip Eng Seng Corporation Ltd, 69 Ubi Crescent, #06-01, Singapore 408561
Tel 6848 0848 Fax 6848 0838 Email enquiry@chipengseng.com.sg Website www.chipengseng.com.sg



为您的跨国银行需求服务

大华银行根植亚洲，具备独一无二的优势并时刻准备就绪，协助您在亚洲推进贵公司的扩展策略。我们拥有超过77年的业务经验和知识，跨越19个国家和地区设有超过500间分行及办事处，并获评为全球顶尖银行之一。我们的行业专家和金融专家组成的核心团队，根据贵公司的业务策略和目标，提供量身定制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协助您在区域和全球扩展业务。

若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致电到 +65 6539 1236 联系我们的全球业务专家，或发送电邮到 GlobalBusiness@uobgroup.com。

亚洲货币

2012年新加坡最佳整体跨境
(本地)现金管理服务(由大企业评选)

现金管理

2012年新加坡最佳本地现金管理银行
(由小型企业评选)

现金管理-交易银行

2012年为CVC Asia Pacific
提供最佳杠杆融资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

2012东盟走进中国十大成功企业

www.uobgroup.com

